

玉器考古文献汇编（2013年6月—12月）

原载《玉器考古通讯》总第三期

卢亚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一 考古发现

1. 新石器时代

黑龙江友谊凤林城址中 F33 居住面上发现有磨制光滑的红色玛瑙石等。¹

吉林抚松新安遗址第二期文化遗存中出土玛瑙管 1 件（T0202②：3）（图三七，11）。第三期文化遗存出土玛瑙管 1 件（T0205①b:3）、玛瑙珠 2 件。²

吉林白城双塔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出土有玉石环 1 件（III405②：6），灰绿色软玉（图二〇，12）。第二期文化遗存中有玉兽面纹佩 1 件（IIM7:1）、玉环 1 件（IIM9:5）。发掘期间，白城博物馆工作人员从当地村民手中征集玉饰 2 件，其中玉双联璧 1 件（馆藏号：白 3236），玉坠饰 1 件（馆藏号：白 3237），从玉器制作风格当属于双塔二期。³

沈阳市千秋园遗址是沈阳地区首次发掘的新乐上层文化环境聚落，出土玛瑙镞 3 件，均琢制，多数为三角形，少量呈柳叶形。⁴

陕西石峁遗址外城北部的一座城门遗址（称为“东门址”）于 2012 年 5—11 月，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对其进行发掘，发现城门为一基本可闭合的石砌城址，由城门、墩台、角楼、疑似“马面”等附属建筑。通过此次发掘首次从地层关系上确认了石峁城址的修筑年代，当修建于龙山中期或略晚，夏时期毁弃。此次发掘在东门址外瓮城北端东侧石墙内发现玉铲（图五、图六、图七）。⁵

四川汉源县龙王庙新石器时代晚期居住遗存发现玉管状饰 1 件，即 T3749⑦:7（图一九，8）。⁶

江苏邳州梁王城遗址位于江苏省邳州市戴庄镇李圩村西。该遗址比较完整地揭露了大汶口文化晚期的一处史前聚落，为了解大汶口文化晚期聚落形态、埋葬制度、社会性质以及与其他邻近地区

1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友谊凤林城址 2000 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3 年第 4 期，539—575 页。

2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抚松新安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3 年第 3 期，347—390 页。

3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白城双塔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学报》2013 年第 4 期，501—538 页。

4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沈阳市千秋园遗址 2010 年发掘简报》，《考古》2013 年第 9 期，3—22 页。

5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孙周勇、邵晶、邵安定、康宁武、屈凤鸣）：《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考古》2013 年第 7 期，15—24 页。

6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雅安市文物管理所、汉源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汉源县龙王庙遗址 2008 年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3 年第 5 期，14—30 页。

同时期文化的关系提供了资料。139座墓葬中共出土器物1148件（包括葬具），其中玉器27件，包括玉环、玉佩、玉坠、玉蝉、玉管、玉珠等。M110为二层台竖穴土坑墓，随葬有玉环1件

（M110:1）、玉锥1件（M110:13）。M125为二层台竖穴土坑墓，随葬有玉环1件（M125:11）。M7为陶棺葬，随葬有玉管2件（M7:4）。⁷

江苏泗洪县顺山集遗址的新石器遗存分为三期，据碳十四测年数据初步可知距今8500年至7000年，在遗址内发现大型环壕聚落、墓葬、房址等，出土的玉器有玉管、绿松石饰件、玉铍。玉管H3:2，为第一期文化遗存，一侧残，双面管钻，内壁留有台痕，器表打磨光滑。直径2.9—3.1、孔径2—2.2、高5.6—5.8厘米（图九）。绿松石饰件，为第二期文化遗存。玉铍，为第三期文化遗存，扁条形，通体抛光。⁸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小青龙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城南街道石珠村。2011年9月至2012年9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桐庐博物馆联合对遗址进行发掘。小青龙遗址的年代相当于良渚文化早期偏晚至晚期偏早阶段。玉器器形主要有有孔玉珠（数量较多）、无孔玉珠（出土时位于玉钺秘部，疑为镶嵌于玉钺秘上的饰件）、玉管、锥形器、钺、璧2件、玉镯1件（M15:3）、玉琮1件（M13:1）等，均出于墓中。⁹

2. 商周时期

山东省沂水县纪王崮春秋墓M1为一春秋晚期带墓道的岩坑竖穴木椁墓，墓室与车马坑共凿建于一个长方形斜壁内收的岩坑之中，北部为车马坑（K1），南部是墓室（M1），墓室由外椁室、内椁室、二重棺、两个器物箱、三个殉人坑组成。因下层岩石较难开凿，棺椁下的腰坑仅为象征性，没有明确的边界，坑内殉犬1只。在棺室和器物箱内出土大量玉器、青铜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和石编磬。墓葬规格较高，应是诸侯或是其夫人之墓。玉器出土于棺室和北器物箱内。棺室内出土玉人1件（M1:162）、玉琮2件（M1:158、M1:190）、玉戈2件（M1:163、M1:164）、虎形玉佩2件（M1:193）、玉料1件（M1:315）、玉玦7件（M1:168、M1:494）、玉璜5件（M1:8:1、M1:9:1、M1:178）、鸟形玉饰1件（M1:172）、觿5件（M1:183、M1:180）、柱形玉饰2件（M1:165）、牛首形饰1件（M1:514）。棺内出土的两件玉戈是比较典型的商代器物。¹⁰北器物箱内出土玉兽1件（M1:63）、玉戈1件（M1:54）、玉牌饰1件（M1:49）。¹¹

陕西凤翔孙家南头春秋秦墓的上限年代为春秋早期晚段至春秋中期，其下限年代当在春秋末

7 南京博物院、徐州博物馆、邳州博物馆：《江苏邳州梁王城遗址大汶口文化遗存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3年第4期，21—41页。

8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泗洪县博物馆（林留根、甘恢元、闫龙、江枫）：《江苏泗洪县顺山集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13年第7期，3—14页。

9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庐博物馆：《浙江桐庐小青龙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11期，4—15页。

10 孙庆伟：《西周用玉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6页。

11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沂市文物考古队、沂水县博物馆（郝导华、许姗、张子晓、尹纪亮、厉建梅）：《山东沂水县纪王崮春秋墓》，《考古》2013年第7期，33—48页。

期。M191 为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随葬有玉管 1 件（M191:30）、玉饰 5 件（M191:32、M191:37、M191:41、M191:44、M191:43）、玉璧 1 件（M191:49）。M126 为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随葬有玉环 1 件（M126:8）。M160 为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随葬有玉觚 2 组（M160:29、M160:27）、玉璧 1 件（M160:52）、玉片 1 件（M160:54）。M161、M83、M81 均为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其中 M161 出土玉环 1 件（M161:18），M138 随葬有玉饰 2 件（M138:19、M138:24）。CMK3 为陪葬三号车马坑，位于主墓 M191 的东南方向，随葬有玉环 1 件（CMK3-3:2），玉璜 1 件（CMK3-3:3）。¹²

陕西凤翔雷家台秦墓位于凤翔县城南，北邻南关村，南邻豆腐村小庄，西距雍城城墙约 500 米。2011 年进行考古发掘，发掘的 5 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除 M3 为南北向，其余 4 座皆为东西向，初步定为战国时期，具有雍城典型秦墓的一般特征。共出土玉器 6 件（组），其中玉环 2 件（M2:16、M1:11）、玉料块 4 件（M1:8、M2:31）。¹³

甘肃张家川县马家塬战国 M4 墓主头胸部的串饰和腰带饰等装饰有绿松石、肉红石髓珠等¹⁴。

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于 2013 年 3 月 26 日至 7 月 26 日，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第二次发掘。共发掘 77 座墓葬和 6 座车马坑。出土铜、陶、原始瓷、玉、骨等质地的文物约 1300 余件。玉器主要出自于棺内，大多为组玉佩饰。器类主要有璧、环、柄形器、簪、璜及各种动物形玉佩。¹⁵其中叶家山 M28 位于叶家山西周墓地的中部，是墓地中规模较大的墓葬之一。在 2013 年第二次发掘中，该墓出土铜、陶、玉、原始瓷、漆木等质地的器物约 600 余件，其中随葬玉器 32 件。器类主要有柄形器 3 件（M28:1、M28:183、M28:63）、玉璧 4 件（包括大型璧 2 件，即 M28:56、M28:70；小型璧 2 件 M28:74-A）、玉琮 1 件（M28:67）、玉璜 1 件（M28:65）、玉觚 1 件（M28:55）、戈 4 件（大玉戈 1 件 M28:62，小玉戈 3 件）、玉笄 1 件（M28:66）、玉鱼 7 件（璜形鱼 4 件，条形鱼 4 件）、玉龙 2 件、玉蝉 2 件、玉鸟 2 件、玉鹿 2 件。¹⁶

湖北襄阳沈岗墓地 M1022 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椁墓，此墓的下葬年代应为春秋中期中段，其上限定为公元前 678 年，墓主人身份应为楚国下大夫阶层。该墓出土铜器、玉石器、漆木器共 628 件。其中随葬玉器 10 件，有玉璧 1 件（M1022:20）、玉环 1 件（M1022:22）、玉玦 2 件（M1022:23、

1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凤翔县博物馆：《陕西凤翔孙家南头春秋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3 年第 4 期，3—34 页。

13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陕西凤翔雷家台墓地发掘简报》，《文博》2013 年第 5 期，15—21、28 页。

14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甘肃张家川县马家塬战国墓地 M4 木棺实验室考古简报》，《考古》2013 年第 8 期，25—35 页。

1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第二次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江汉考古》2013 年第 3 期，3—6 页。

1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 M28 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13 年第 4 期，3—57 页。

M1022:24)、玉管 1 件 (M1022:21)、玉琿 1 件 (M1022:26)、碎玉 4 颗 (M1022:25)。¹⁷

安徽繁昌板子矶遗址的时代大致可以定位西周晚期至春秋早中期,出土玉块 1 件 (T603③:1)。

18

安徽钟离君柏墓即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于 2006 年 12 月至 2008 年 8 月发掘,位于安徽蚌埠双墩村境内,钟离君柏墓是一座大型封土堆竖穴土坑墓。此墓较为特殊者在距墓口深 2 米的填土层中形成一个复杂的构筑过程,精心构筑放射线、土丘与土偶、土偶墙三层不同的遗迹。随葬玉器 13 件,其中 12 件为墓主人随身佩戴的装饰品,另一件(玉鞞)出自南椁室器物箱中,器类有珪 3 件、牙形佩 6、珠 1 件、环 1 件、佩 1 件、鞞 1 件。¹⁹

3. 秦汉至三国

陕西西安南郊曲江羊头镇西汉墓于 2012 年 8 月至 2013 年 1 月由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发掘。汉代墓葬 35 座,其中编号 M3、M20 和 M68 三座墓葬规模较大、等级较高,出土器物丰富,是研究汉代物质文化的重要资料。其中 M20、M28 均在墓室内出土玉器。M20 为斜坡墓道竖穴土圻积沙双室墓,年代为西汉中晚期。M68 为斜坡墓道竖穴土圻砖室墓,年代为西汉中晚期或西汉晚期。M20 和 M68 随葬玉器 33 件。口琿 1 件 (M20:13)、鼻塞 1 件 (M20:17)、肛塞 2 件 (M20:18、M68:1)、玉璧 6 件 (2 件完整, M20:14-1、M20:14-2、M20:14-3、M20:14-4、M20:14-5、M20:14-6)、玉圭 2 件 (M20:16)、玉衣片 15 件。²⁰

陕西省蓝田县华胥镇支家沟汉墓为依山而建平地起陵的甲字形竖穴土坑墓,全墓由陵园、封土、墓道、壁龛、前室、封门、主墓室等几部分组成。发掘报告初步推测墓主人与西汉皇室有着密切的关系,身份高贵而特殊,级别应不低于列侯一级。该墓的时代应在武帝元狩五年(前 118 年)至昭帝之间。²¹段毅进一步研究认为是昭帝时期的鄂邑长公主之墓。²²在主墓室内出土玉石器 36 件,其中 29 件为磨制很薄的青玉片,形状有三角形、方形、不规则形等。其中 10 件刻有文字,大都由天干加数字组成,如“寅六”、“戊十五”、“申二”字样。经初步分析,这些玉片当为镶玉漆棺的残留。其余 7 件,4 件残存较甚,3 件制作精美。制作精美的三件分别为标本 S2:8 为玉铜组装而成的仪仗顶饰,标本 S2:5 为玉鱼形饰,标本 S2:44 为白玉云龙纹饰。²³

陕西宝鸡凉泉汉墓位于陕西宝鸡市区以南的马营镇凉泉村东、渭河南岸。这批墓葬均为长斜坡

17 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襄阳沈岗墓地 M1022 发掘简报》,《文物》2013 年第 7 期,4—19 页。

18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繁昌县文物管理局:《安徽繁昌板子矶周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3 年第 10 期,11—22 页。

19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春秋钟离君柏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3 年第 2 期,239—282 页。

20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曲江羊头镇西汉墓发掘简报》,《文博》2013 年第 6 期,3—17 页。

2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蓝田支家沟汉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3 年第 5 期,3—30、100 页。

22 段毅:《蓝田支家沟汉墓墓主身份蠡测》,《考古与文物》2013 年第 6 期,74—76、85 页。

23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蓝田支家沟汉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3 年第 5 期,3—30、100 页。

式墓道与土洞墓室结构。M2 随葬有玉人俑 1 件 (M2:13)、玉片 1 件 (M2:15)。²⁴M2 出土玉人俑最为特殊,同类器物见于西安、甘肃礼县等地,多为一男一女成对出现。这些玉人俑被认为是秦国祭祀器,象征祭天人牲人殉的“偶人”。²⁵田亚岐、许卫红推断 M2 出土玉人俑应为一件传世品,应该是一件用于皇家祭天的旧器,作为随葬品再次使用。²⁶

河南禹州新峰墓地东汉画像石墓 M127 为斜坡墓道砖室墓,出土有制玉残料,共 50 件,大小形状各不相同。²⁷

江苏南京六合李岗汉墓 M1 位于南京市六合区雄州镇李岗村西部,冶浦路和峨眉路交界偏南处,峨眉河与滁河交汇处北面的高台地上。M1 为竖穴土坑墓,代定在西汉中期至新莽时期。随葬有玉器 2 件,鱼形饰件 1 件 (M1:32)、六棱柱体饰件 1 件 (M1:33)。²⁸

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一号墓和东区陪葬坑于 2009—2012 年间,由南京博物院对其发掘,其中西汉江都王陵一号墓墓主人初步判定为第一代江都王刘非。江都王陵一号墓(M1)为竖穴岩坑墓,平面呈“中”字形,墓室结构为黄肠题凑。虽被盗扰,但仍出土铜器、铁器、金器、银器、玉器、石器、陶器、漆器等遗物 7092 件(组),其中玉器 113 件(组),主要出自前室和内椁盗洞内。器类有玉棺 1 件、片饰 15 块、金缕玉衣 1 套(仅在盗洞内残存玉衣片 121 片)、圭 5 件、璧 25 件、佩 18 件、环 7 件、璜 6 件、塞 4 件、鱼 1 件、贝带 2 套、带钩 9 件、牌饰 1 件、钩饰 2 件、玉戈 2 件、剑珌 1 件、剑首 1 件、琴轸 4 件、琴柱 19 件、琴柄 4 件。²⁹江都王陵东区陪葬坑中的 M16、M17 为竖穴土坑墓, M17 墓主人为江都国高等级官员, M16 墓主人为其夫人。两墓的下葬年代初步判断在公元前 153 至公元前 127 年之间的中间时段。其中 M16 出土玉器 2 件,即玉环 (M16:27) 和双人立兽饰件 (M16:26),均出自棺内。M17 出土玉器 4 件,器类有玉环 1 件 (M17:51)、玉璜 1 件 (M17:48)、玉珌 1 件 (M17:47)、玉印 1 件 (M17:50)。³⁰

广西贵港市孔屋岭汉墓 2009 年共清理墓葬 3 座, M1 为砖室墓,年代属于东汉前期, M2a、

24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陕西宝鸡凉泉汉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3 年第 6 期,3—19 页。

25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2004 年甘肃礼县鸾亭山遗址发掘主要收获》,《中国历史文物》2005 年第 5 期。王长启:《从古代玉礼器的发展与衰落看西安市北郊出土的秦国玉器》,杨伯达编:《出土有玉器鉴定与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 年。师小群、王蔚华《秦代祭祀玉人》,《文博》2006 年第 3 期。梁云:《对鸾亭山祭祀遗址的出土认识》,《中国历史文物》2005 年第 5 期。刘云辉:《陕西出土东周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众志美术出版社,2006 年。

26 田亚岐、许卫红:《宝鸡凉泉汉墓出土玉人分析》,《考古与文物》2013 年第 6 期,77—81 页。

2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许昌市文物工作队、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河南禹州新峰墓地东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3 年第 3 期,10—22 页。

28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六合区文化局:《南京六合李岗汉墓 (M1) 发掘简报》,《文物》2013 年第 11 期,16—27 页。

29 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一号墓》,《考古》2013 年第 10 期,3—68 页。

30 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东区陪葬坑》,《考古》2013 年第 10 期,69—81 页。

M2b 为同坟异穴合葬的竖穴土坑墓，年代在西汉晚期。M3 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椁墓，年代在东汉前期。共出土玉器 7 件，玉佩 1 件（M1:47）、玉带钩 1 件（M1:46）、玉管 3 件（M3:41）、玉璧 1 件（M2a:15）、玛瑙耳铛 1 件（M3:30）。³¹

襄樊樊城菜越三国墓编号为樊城菜越 M1，墓道为土坑竖穴砖墓，封门墙、石门、甬道、前室、过道、后室组成。此墓虽出土有永初二年（108 年）的纪年铜盘，但从墓葬结构、形制和随葬的其他器物分析，却明显具有东汉末年或三国早期的特征。随葬有玉器 2 件，器类有玉瑗 1 件（M1:61）、玉猪 1 件（M1:72）。³²

4. 隋唐及以后

陕西咸阳隋鹿善夫妇墓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北社镇边方村东北 1100 米处。该墓系斜坡墓道多天井带围沟的双室土洞墓，随葬有珠玉器共 3 件，器类有玛瑙珠 1 枚（M301:19）、料珠（M301:27）、琥珀饰（M301:88）。³³

陕西西安唐代李倕墓出土的冠饰上镶嵌有各种宝石，包括绿松石、玉髓、紫晶等。³⁴

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 M1，由大同市考古研究所于 2011 年 4 月抢救性发掘，M1 为素面沟纹砖砌的单室砖墓，随葬玉串饰 2 件。一件呈半月形，青白色，弧背中间穿孔。宽 2.1、厚 0.4 厘米。另一件呈圆珠形，浅褐色，中心穿孔，直径 0.6 厘米。³⁵

江西南昌市江联小区明墓于 2012 年 6 月，由南昌市博物馆对其进行发掘清理，该墓为夫妻合葬墓，年代是明万历年间或不早于万历时期的明代中晚期墓葬。墓主人的随葬品与明藩王墓出土器物基本一致，初步推测其身份有可能为镇国将军以上的藩王后裔。南棺出土遗物 15 件（套），在墓主人头部发现圭形玉片 2 片、玉饰片 1 套（10 片）。北棺出土遗物共 7 件（套），其中在墓主人腰部出土龙纹玉带板 1 套（20 块）。³⁶

二 研究文章

1. 研究与探索

杨建芳在《深化玉器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首先对古玉研究的历程作一简单回顾，强调夏鼐和苏秉琦先生对于古玉研究方法的贡献。进而在已有研究历程回顾的基础之上就如何深化玉器研究

31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贵港市博物馆：《广西贵港市孔屋岭汉墓 2009 年发掘简报》，《考古》2013 年第 9 期，40—67 页。

32 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襄樊樊城菜越三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3 年第 3 期，391—430 页。

33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咸阳隋鹿善夫妇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3 年第 4 期，35—44 页。

34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德国美茵兹罗马-日耳曼中央博物馆：《西安市唐代李倕墓冠饰的室内清理与复原》，《考古》2013 年第 8 期，36—45 页。

35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 年第 10 期，43—51 页。

36 江西南昌市博物馆：《江西南昌市江联小区明墓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13 年第 4 期，36—39 页。

提出 6 点看法，即重视考古学研究方法的运用，注意形制和纹饰的微观研究，强调玉器研究与历史的结合，开展中外文化交流对玉雕影响的研究，慎审利用和鉴别传世玉器，积极引进自然科学方法等。³⁷

杨伯达《中国史前玉神器探微》一文围绕“巫的身份和地位”、“我国北方巫玉和俄罗斯贝加尔湖巫玉的差异”、“玉巫教古国、方国玉神器的异同”三个方面进行论述，认为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墓葬出土的大量的珍贵玉器与“巫以玉事神”有关系。玉神器则是我国土生土长原始宗教的典型器物。³⁸

牟永抗《也谈红山文化 C 形玉龙的工艺》通过对 C 形玉龙柔性线割工艺的重新探讨，认为其采用的是弧曲型横向线切割模式。³⁹

徐峰《三位一体：凌家滩玉鹰的文化阐释》一文将凌家滩玉鹰中的八角星纹释读成跪，凌家滩玉鹰则有鸟、猪、龟三种元素组成，其依托则是史前东方沿海地区深厚的文化背景作为依托。其中八角星纹是龟的象征，代表阴性，是下层宇宙观的体现；鹰代表阳性，反映了上层宇宙观，猪与人类生活最为密切，是人间世界。三者均有避邪、护佑、趋吉的功能。创作出三种动物“三位一体”的玉鹰牌饰，凌家滩先民“集优心理”，将史前东方沿海地区最重要的三种动物崇拜，利用兼体的艺术设计，在同一件器物上得到反映，从而起到利益、优势最大化的效果。⁴⁰

方向明《史前琢玉的切割工艺》一文通过对史前文化出土玉器制作工艺（线切割和片切割）的考察后发现一定深度的片切割技术有着地域的分布，如红山文化、石家河文化、齐家文化、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良渚文化时期则主要以线切割技艺制作玉璧等大体量玉器，凌家滩文化线切割和片切割各占一定数量。良渚文化中利用线切割雕琢纹样（如镂孔），而片切割开料主要用于管、锥形器等长边的玉器、玉璧的成形和扁榫的制作。⁴¹

陈小三在《试论镶嵌绿松石牌饰的起源》一文从“镶嵌绿松石牌饰的纹饰”和“哈密地区与四川盆地所见牌饰之间的联系”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认为镶嵌绿松石牌饰上的兽面纹与新石器时代（良渚、石家河、龙山文化）玉器上的神面纹以及商周青铜器上的兽面纹之间差异很大，四川盆地牌饰的产生和新疆哈密地区的牌饰有密切联系。文章最后部分对二里头遗址镶嵌绿松石牌饰起源提出一假说：从牌饰纹样、穿系方式和整体形态来看，将绿松石的起源地假定在河西走廊地区，与环首刀、花边罐同为来自西北地区的文化因素。⁴²

雷雨《浅议商代玉器主要形制及装饰手段》一文围绕“商代玉器的起源与发展”、“商代玉器的

37 杨建芳：《深化玉器研究的几个问题》，《文物》2013年第10期，55—60页。

38 杨伯达：《中国史前玉神器探微》，《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6期，6—12页。

39 牟永抗：《也谈红山文化 C 形玉龙的工艺》，《东南文化》2013年第6期，66—71页。

40 徐峰：《三位一体：凌家滩玉鹰的文化阐释》，《四川文物》2013年第6期，22—27页。

41 方向明：《史前琢玉的切割工艺》，《南方文物》2013年第4期，57—61、70页。

42 陈小三：《试论镶嵌绿松石牌饰的起源》，《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5期，91—100页。

种类与特点”、“商代玉器美的体现”三方面来展开。⁴³

张伟《梁代村芮国墓地出土玉器几点认识》一文通过对梁代村芮国墓地出土的大量玉器的系统整理,将该墓地发现的玉器概括出以下四个特点:第一是种类功能齐全、器类多,从器物功用上讲,有礼仪用器、丧葬用器和装饰用器等;第二是年代跨度大,墓地出土的玉器时代有红山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夏代晚期、商代晚期、西周中晚期和春秋早期;第三是改制器多,将已经做好的或已经使用的原始器物,依据当下时代特征进行纹饰或形制上的改造,从而成为该时代流行或典型器物;第四随葬普遍,在梁代村芮国墓地中,所有大型、中型墓葬均随葬玉器,且因墓主人身份地位不同,随葬规模有明显差别。⁴⁴

张亮《汉代“舞人”玉雕探析》一文探讨两汉墓葬中出土“玉舞人”的社会历史背景,认为玉舞人的随葬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尚舞风气”,同时也与汉代乐舞艺术的发展、汉代丧葬观念和明器制度密切相关。⁴⁵

王自力《西安西郊出土唐玉带图像考》一文对1990年12月,西安西郊关庙小学出土的唐代玉带图像进行考释,对原简报⁴⁶解读之误予以更正。具体更正如下,如将原简报误作“吹竖笛纹”重新考释为“胡人吹箎篥图方跨”,“弹琵琶纹”重新考释为“胡人播鞞牢击鸡娄鼓图方跨”,认为玉带上的胡人形象应为于阗遗风。同时玉带采用了唐代所特有的在平面上斜刻剔地时所表现的形象隐起的雕刻技法。⁴⁷

刘思哲《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九环玉带制作时代考》一文首先对1970年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白玉九环蹀躞带的详细结构和特点进行分析,将其与1998年咸阳底张湾北周若干云墓出土的八环蹀躞玉带进行比较,认为二者在玉带形制、结构及制作工艺基本相同,并结合文献中有关北朝时期相关带具的具体分析,认为何家村唐代窖藏白玉九环蹀躞带是北周时期正九命官员(如太师、太傅、太保、上柱国、柱国大将军、上大将军等)所拥有,作为传世品而为唐代中央政府所收藏。⁴⁸

董洁《唐代玉梳背考略》一文在对唐墓中出土玉梳背梳理的基础上,认为玉梳背主要出土于唐京畿地区,而其他地区少见。就其用途而言,更多地可能是一种装饰品发饰。插梳习俗魏晋以后逐渐兴起,到唐代成为一种时尚妆饰。在文章最后,又对唐代发梳的材质、装饰图案、雕琢技艺和插戴方式作了相关论述。⁴⁹

2. 学术史

殷晓超《劳佛与美国菲尔德博物馆的中国玉器收藏》一文讲述了美国东方学家和汉学家劳佛

43 雷雨:《浅议商代玉器主要形制及装饰手段》,《文物世界》2013年第6期,15—17页。

44 张伟:《梁代村芮国墓地出土玉器几点认识》,《文博》2013年第6期,27—32页。

45 张亮:《汉代“舞人”玉雕探析》,《南方文物》2013年第4期,191—193、196页。

46 王自力、张全民:《西安西郊出土的唐代玉带》,《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5期。

47 王自力:《西安西郊出土唐玉带图像考》,《文物》2013年第8期,59—65、69页。

48 刘思哲:《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九环玉带制作时代考》,《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4期,95—99页。

49 董洁:《唐代玉梳背考略》,《文物世界》2013年第5期,68—73页。

(Berthod Laufer,1874—1934年)在中国玉器搜集、研究中所取得的成绩和美国菲尔德博物馆在中国玉器收藏和展示方面所作的工作。殷氏一文讲述了劳佛的学术背景和参与由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组织的远东探险活动,接着介绍劳佛在东方民族、语言、文学、宗教、信仰、文化交流、文物制度、考察报告和历史文物等方面的学术贡献。通过介绍《玉器-中国考古学和宗教研究》一书和《两件中国皇帝玉器》(Two Chinese Imperial Jades, 载 The Fine Arts, Vol.XXX II, Chicago, June,1915年)一文强调劳佛关于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重要贡献方面的开拓性研究。文章最后对菲尔德博物馆的一些代表性古玉加以介绍。⁵⁰

曲石《我的古玉情缘》一文回忆其恩师胡厚宣教授如何引导自己走向古玉研究之路,文中深情地叙述向先师求学,与胡氏交往点滴,尽表缅怀之情。⁵¹

3. 鉴赏类

殷志强《中国历代玉器鉴定通则》一文首先叙述了中国古玉的发展史,进而论及了历代玉器鉴定的通则。⁵²其《新石器时代玉器鉴定之玉器类型(上)》⁵³和新石器时代玉器鉴定之玉器类型(下)》⁵⁴两篇文章介绍中国新石器时代重要原始文化的主要玉器类型,正如殷氏所说为的是提供“咋鉴定新石器时代玉器时有一个全局观念”。

于明《玉器拍卖不能突破底线——2013年春季玉器拍卖观感》一文针对2013年春季玉器拍卖中拍卖行拍卖用现代开采的玉料做成的古玉,已经突破了古玉拍卖的底线这一现象进行评述,认为拍卖行应把好玉料关。⁵⁵于氏另有《平静的石头 平静的玉——2013年中共国际珠宝展印记》一文。⁵⁶

方林《宋代玉鱼的文化认识》一文就宋代玉鱼涉及的品种、宋代玉鱼的玉料、宋代玉鱼的纹饰与工艺三个方面来叙述,宋代鱼形以鳊鱼为主则是方氏一文的主要认识,而以往学界曾认为“玉雕鳊鱼作品流行于元代。在造型和纹饰特点上也已约定俗成,成为一种相对固定的磨石,其实这一模式的萌芽始自宋,从现有的资料看,宋代的鱼形较杂,尚未形成倾向性品类,而其中就有形似鳊鱼的作品”。⁵⁷

李宏坤《芳草桥边花满溪——国家博物馆藏宋代花形玉佩浅谈》一文选取国家博物馆所藏的八件宋金时期的花形佩,探讨了花形佩的主要品种,宋代花形佩的纹饰特点和花形佩盛行的社会背景等三方面的内容。⁵⁸

50 殷晓超:《劳佛与美国菲尔德博物馆的中国玉器收藏》,《文物天地》2013年第12期,90—96页。

51 曲石:《我的古玉情缘》,《文物天地》2013年第9期,100—101页。

52 殷志强:《中国历代玉器鉴定通则》,《文物天地》2013年第7期,92—97页。

53 殷志强:《新石器时代玉器鉴定之玉器类型(上)》,《文物天地》2013年第8期,104—109页。

54 殷志强:《新石器时代玉器鉴定之玉器类型(下)》,《文物天地》2013年第9期,94—98页。

55 于明:《玉器拍卖不能突破底线-2013年春季玉器拍卖观感》,《文物天地》2013年第8期,22—25页。

56 于明:《平静的石头 平静的玉-2013年中共国际珠宝展印记》,《文物天地》2013年第12期,118—119页。

57 《上海出土唐宋元明清玉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69页,方林:《宋代玉鱼的文化认识》,《文物世界》2013年第5期,3—5页。

58 李宏坤:《芳草桥边花满溪-国家博物馆藏宋代花形玉佩浅谈》,《文物世界》2013年第6期,3—9页。

鉴赏类的文章另有李郁《汉玉的巅峰-南越王墓的玉器》⁵⁹和叶丹洋《难得一见的丝缕玉衣》⁶⁰两文。

三 2013年下半年期刊所载玉器资料索引（以汉语拼音序）

1. 田野考古材料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春秋钟离君柏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3年第2期，239—282页。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繁昌县文物管理局：《安徽繁昌板子矾周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10期，11—22页。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10期，43—51页。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甘肃张家川县马家塬战国墓地M4木棺实验室考古简报》，《考古》2013年第8期，25—35页。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贵港市博物馆：《广西贵港市孔屋岭汉墓2009年发掘简报》，《考古》2013年第9期，40—67页。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许昌市文物工作队、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河南禹州新峰墓地东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3年第3期，10—22页。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友谊凤林城址2000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3年第4期，539—575页。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第二次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江汉考古》2013年第3期，3—6页。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M28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13年第4期，3—57页。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白城双塔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学报》2013年第4期，501—538页。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抚松新安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3年第3期，347—390页。

江西南昌市博物馆：《江西南昌市江联小区明墓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13年第4期，36—39页。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六合区文化局：《南京六合李岗汉墓（M1）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11期，16—27页。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泗洪县博物馆（林留根、甘恢元、闫龙、江枫）：《江苏泗洪县顺山集新石

59 李郁：《汉玉的巅峰-南越王墓的玉器》，《文物天地》2013年第12期，31—35页。

60 叶丹洋：《难得一见的丝缕玉衣》，《文物天地》2013年第12期，36—38页。

- 器时代遗址》，《考古》2013年第7期，3—14页。
- 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一号墓》，《考古》2013年第10期，3—68页。
- 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东区陪葬坑》，《考古》2013年第10期，69—81页。
- 南京博物院、徐州博物馆、邳州博物馆：《江苏邳州梁王城遗址大汶口文化遗存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3年第4期，21—41页。
-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沂市文物考古队、沂水县博物馆（郝导华、许姗、张子晓、尹纪亮、厉建梅）：《山东沂水县纪王崮春秋墓》，《考古》2013年第7期，33—48页。
-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蓝田支家沟汉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5期，3—30、100页。
-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凤翔县博物馆：《陕西凤翔孙家南头春秋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4期，3—34页。
-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陕西宝鸡凉泉汉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6期，3—19页。
-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陕西凤翔雷家台墓地发掘简报》，《文博》2013年第5期，15—21、28页。
-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德国美茵兹罗马-日耳曼中央博物馆：《西安市唐代李倕墓冠饰的室内清理与复原》，《考古》2013年第8期，36—45页。
-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咸阳隋鹿善夫妇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4期，35—44页。
-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孙周勇、邵晶、邵安定、康宁武、屈凤鸣）：《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考古》2013年第7期，15—24页。
-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沈阳市千秋园遗址2010年发掘简报》，《考古》2013年第9期，3—22页。
-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雅安市文物管理所、汉源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汉源县龙王庙遗址2008年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3年第5期，14—30页。
-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曲江羊头镇西汉墓发掘简报》，《文博》2013年第6期，3—17页。
- 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襄樊樊城菜越三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3年第3期，391—430页。
- 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襄阳沈岗墓地M1022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7期，4—19页。
-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庐博物馆：《浙江桐庐小青龙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3

年第 11 期, 4—15 页。

2. 研究著述

陈小三:《试论镶嵌绿松石牌饰的起源》,《考古与文物》2013 年第 5 期, 91—100 页。

董洁:《唐代玉梳背考略》,《文物世界》2013 年第 5 期, 68—73 页。

方林:《宋代玉鱼的文化认识》,《文物世界》2013 年第 5 期, 3—5 页。

方向明:《史前琢玉的切割工艺》,《南方文物》2013 年第 4 期, 57—61、70 页。

雷雨:《浅议商代玉器主要形制及装饰手段》,《文物世界》2013 年第 6 期, 15—17 页。

李宏坤:《芳草桥边花满溪-国家博物馆藏宋代花形玉佩浅谈》,《文物世界》2013 年第 6 期, 3—9 页。

李郁:《汉玉的巅峰-南越王墓的玉器》,《文物天地》2013 年第 12 期, 31—35 页。

刘思哲:《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九环玉带制作时代考》,《考古与文物》2013 年第 4 期, 95—99 页。

牟永抗:《也谈红山文化 C 形玉龙的工艺》,《东南文化》2013 年第 6 期, 66—71 页。

曲石:《我的古玉情缘》,《文物天地》2013 年第 9 期, 100—101 页。

田亚岐、许卫红:《宝鸡凉泉汉墓出土玉人分析》,《考古与文物》2013 年第 6 期, 77—81 页。

王自力:《西安西郊出土唐玉带图像考》,《文物》2013 年第 8 期, 59—65、69 页。

徐峰:《三位一体:凌家滩玉鹰的文化阐释》,《四川文物》2013 年第 6 期, 22—27 页

杨伯达:《中国史前玉神器探微》,《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 年第 6 期, 6—12 页。

杨建芳:《深化玉器研究的几个问题》,《文物》2013 年第 10 期, 55—60 页。

叶丹洋:《难得一见的丝缕玉衣》,《文物天地》2013 年第 12 期, 36—38 页。

殷晓超:《劳佛与美国菲尔德博物馆的中国玉器收藏》,《文物天地》2013 年第 12 期, 90—96 页。

殷志强:《中国历代玉器鉴定通则》,《文物天地》2013 年第 7 期, 92—97 页。

殷志强:《新石器时代玉器鉴定之玉器类型(上)》,《文物天地》2013 年第 8 期, 104—109 页。

殷志强:《新石器时代玉器鉴定之玉器类型(下)》,《文物天地》2013 年第 9 期, 94—98 页

于明:《玉器拍卖不能突破底线-2013 年春季玉器拍卖观感》,《文物天地》2013 年第 8 期, 22—25 页。

于明:《平静的石头 平静的玉-2013 年中共国际珠宝展印记》,《文物天地》2013 年第 12 期, 118—119 页。

张亮:《汉代“舞人”玉雕探析》,《南方文物》2013 年第 4 期, 191—193、196 页。

张伟:《梁代村芮国墓地出土玉器几点认识》,《文博》2013 年第 6 期, 27—32 页。

玉器考古文献汇编（2014年1月—6月）

原载《玉器考古通讯》总第四期

卢亚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一 考古发现

1. 新石器时代

赤峰市巴林左旗隆昌镇友好村墓地年代，发掘者定为红山时期。M1为双人合葬墓，南侧人骨为侧身直肢葬。平面呈近长方形。M1出土的玉器有玉环、玉簪、玉管、玉佩饰等。玉环，M1:1，平面呈圆形，出土时已残断，加工精致，为巴林红花彩石质地。外径7.2、内径4.5、厚0.4厘米。玉簪，M1:2，平面呈梯形，刃部略斜，浅绿色，质地为岫岩玉。长5、宽3.1厘米。玉佩饰，5件，器形较小，平面均圆形，磨制而成。均为巴林冻石。M1:4，直径1.4厘米；M1:5，直径2.1厘米；M1:6，直径1.8厘米。M3为单人葬，具体情况不明，出土有玉管。玉管，M3:1，柱状中空，孔为对钻而成。浅灰色，磨制精致，长6.3厘米⁶¹。

济南市平阴县洪范池镇周河村遗址 M4 为竖穴土坑墓，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年代是大汶口文化中后期偏晚。玉器4件，其中玉环出土于头部和大腿骨与盆骨之间，玉三联璧位于后脑部位，玉牙璧位于大腿和小腿交接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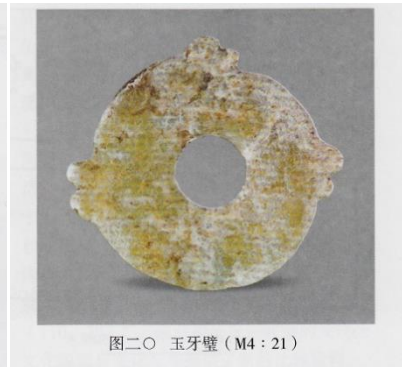
三联璧1件，M4:17，灰色，磨制，体较薄。长圆形，表面有三个小圆孔，三孔周围琢制出较薄的边缘，再管钻成孔。两长边各有两个亚腰形缺口，凹槽有压磨痕。素面。长5.5、宽2.6、厚0.2厘米（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三

环2件，白色，磨光，圆形，断面略呈核形，中钻一孔。M4:16，管钻。外径5、内径2.4、厚0.3

⁶¹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巴林左旗友好村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草原文物》2014年第1期，28—31页。

厘米(图二)。M4:20, 棒钻, 单面钻孔, 孔壁斜直。一面孔径大, 另一面孔径小。孔径 3.7、内径 1.6-1.8、厚 0.3 厘米。

牙璧 1 件, M4:21, 青色, 磨制, 有雕刻痕迹。形近环, 外周有三个凸出呈牙状的“扉棱”, 中间管钻 1 孔, 中间较厚, 外边较薄。外径 3.6、内径 1、厚 0.3-0.4 厘米(图三)。

M11 为竖穴土坑墓, 平面近长方形。墓主为男性。人骨左臂左侧上端出土玉钺 1 件(M11:1), 已断为两截。钺上端和下端反向交错搁置。玉钺呈灰绿色, 蛇纹岩, 通体磨光, 梯形, 体扁平。中间厚, 两端薄, 双面刃, 刃部不见崩疤。中心稍偏上对钻一孔, 孔一面管钻, 一面锥钻。长 20.8、宽 7.9-10.4、厚 1.9 厘米⁶²(图四)。



图二五 玉钺(M11:1)

图四

安徽怀宁孙家城遗址位于安徽省怀宁县西北的马庙镇栗岗村孙家城和费屋两个村民组内。此遗址于 20 世纪 80 年代被发现, 周边围有城垣, 现存城垣面积约 25 万平方米。孙家城一期文化的相对年代相当于本地的黄鳝嘴类型或太湖流域的崧泽文化早期, 发现少量玉环残件、残玉斧。玉斧 1 件, T3⑥:3, 墨绿色偏深, 杂青泛黄色斑, 表面光滑。仅剩刃部一角, 体稍厚, 弧刃光滑但不锋利。残长 7.3、最厚 1.2 厘米。孙家城二期文化的相对年代相当于崧泽文化早期偏晚, 发现环 1 件, T3⑦:5。墨绿色, 似玉但不光滑, 两端均残。残长 2.3 厘米⁶³。

山西原平市辛章遗址位于山西省原平市中阳乡辛章村东和村北的广阔区域, 年代为龙山晚期。2012 年 4-6 月进行发掘。出土玉凿 1 件(G1③B:2), 上部残断, 残存刃部。通体磨制精细。器形微小。横断面呈长方形。平面呈长方形。直刃, 偏锋, 残长 1.7、刃宽 0.9、厚 0.7 厘米⁶⁴。

2. 商周

福建省晋江市庵山遗址位于福建省晋江市深沪镇坑边村颜厝东北, 2007 年和 2009 年对其进行发掘, 年代大体在距今 3400-2700 年, 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中晚期至西周时期。出土玉环 2 件、玉璜 1 件。玉环 2 件, 标本 TS15W4⑥:4, 淡绿色, 磨制精细, 器表光滑。面平整, 内外缘较圆钝。外径 4.6、内径 3、厚 0.8 厘米。玉璜 1 件, 编号 TS13W8⑦A:5, 浅黄色间淡灰色, 磨制精细, 器表光滑。面平整, 外缘较圆钝。外径 2.7、内径 1.1、厚 0.2 厘米⁶⁵。

河南三门峡李家窑西周墓 M34 和 M37 均为单棺单椁, 墓主应为元士一级的贵族。李家窑遗址已被确认为虢国上阳城的所在地⁶⁶, M34 和 M37 位于虢国上阳城宫殿区附近, 且墓葬开口于虢国文化层下,

⁶² 平阴周河遗址考古队:《山东平阴县周河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的发掘》,《考古》2014 年第 3 期, 3-12 页。

⁶³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怀宁县文物管理所:《安徽怀宁孙家城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4 年第 5 期, 4-1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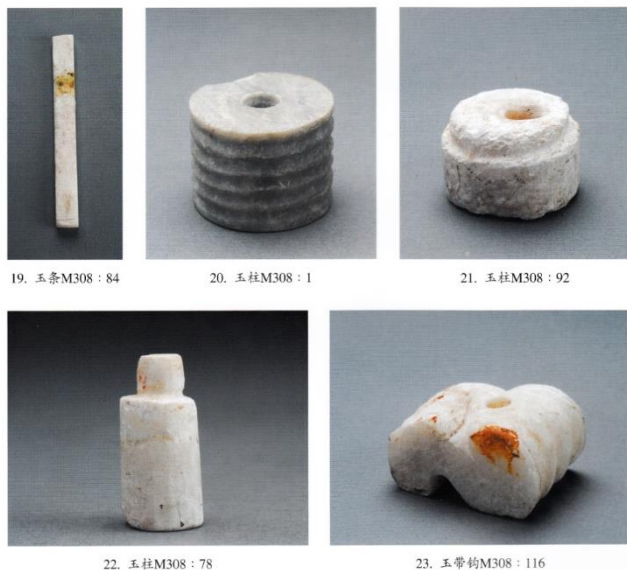
⁶⁴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山西原平市辛章遗址 2012 年发掘简报》,《考古》2014 年第 5 期, 3-16 页。

⁶⁵ 福建博物院、晋江市博物馆:《福建晋江庵山青铜时代沙丘遗址 2009 年发掘简报》,《文物》2014 年第 2 期, 4-16 页。

⁶⁶ 李家窑遗址考古发掘队:《三门峡发现虢都上阳城》,《中国文物报》2001 年 1 月 10 日。

表面这两座墓葬年代明显较早，据此推断这两座墓葬有可能是早于虢国的焦人的墓葬。M34 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 107 件随葬器物，玉玦和玉珪放置在棺内。玉玦 2 件。形制大小及玉质相同，当取材自同一块玉料。青玉，玉质细腻，半透明。圆形扁平体。标本 M34:72，外径 33、孔径 1.1、厚 0.2 厘米。玉珪 1 件（M34:73），青玉，玉质细腻，微透明。体扁平，呈半月形，两端各有一个单面钻的圆穿，长 3.4、宽 1.7、厚 0.3 厘米。M37 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 71 件随葬器物。玉器 4 件，有玉管、蚕和环，放置在棺内。玉管 1 件，M37:35，青玉，玉质细腻，微透明。短圆管状，表面刻有 S 形和圆角方形图案，高 1.4、外径 1、孔径 0.4-0.5 厘米。玉蝉 2 件，均为青玉，质地较细，微透明。体上饰五周凹弦纹。M37:34，形体较粗短，长 2.1 厘米。M37:36，形体细长，长 2.9 厘米。玉环 1 件，M37:33。青玉，玉质细腻，半透明。圆形扁平体，断面呈长方形，外径 1.2、内径 0.6、厚 0.3 厘米

M308 墓口南北长 6.5 米，东西宽 6 米，墓底南北长 4.7 米，东西宽 4.4 米，深 11.5 米，为铁岭墓地唯一的双椁墓，内外椁均为亚字形，年代初步定在战国早期。



图五 铁岭墓地 M308 出土器物

墓室北部被扰至生土，扰土中发现有玉珩、玉佩、玛瑙环、铺首等。南挡板间放置小件器物，自东向西有车𦍋、马镫、马衔、铜铃、玉珩、矛、玉柱、玉条、戈、杆帽等。发掘过程中发现，墓室北部的扰土及内、外椁之间的泥土里，散布着大量的玛瑙珠、骨珠、骨管、骨贝、海贝、铜珠等，无规律可言。墓底也见到一些金箔片。棺内随葬器物有腰部的铜剑、铜带钩和头部的玉笄、玉佩、项链、玉璧、玉瑗等。

玉器多为生活用玉，共 56 件（2 件失）。其中玉条 10 件，玉珠 7 件，玉笄 2 件，玉带钩 2 件，玉珩 19 件，玉瑗 2 件，玛瑙环

2 件，玉龙佩 1 件，龙形玉佩坯料 2 件，方形玉饰 1 件，玉虎佩 4 件，项链 1 件⁶⁷（图五一图七）。

凤翔西关新区西周墓葬共出土玉石器共 11 件（组），其中玉石圭 2 件（组），玉石片 9 件（组）。

玉石圭，共 2 件（组），多数一端残损。M13:4，柄端弧形，边沿平整，锋端残缺。残长 6.9、宽 2.8-2.4、厚 0.35-0.2 厘米。另一件（组）为 M1:3、M1:4、M1:5 一组为石圭。

玉石片共 9 件（组），成组出现，多为长方形，白色或墨绿色，部分阴刻有细线。M5:5，长条薄片

⁶⁷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三门峡李家窑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 年第 3 期，4—17 页。

⁶⁸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办公室：《新郑铁岭墓地 M308 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4 年第 2 期，4—17 页。图片来源于网络彩版 2。

状，长方形，象牙白，部分玉片染有少量红色粉末，玉片两端有横向阴刻线纹，长 2.7、宽 0.75、厚 0.2 厘米。另一件（组）为 M1:7⁶⁹。



图六 铁岭墓地 M308 出土器物

山东枣庄徐楼东周墓位于枣庄市峄城区政府驻地以西，东距徐楼村和 206 国道约 1500 米，西邻锅其山，2 座墓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其中 M2 为一棺一槨，墓主骨骼腐朽严重，附近随葬有料珠、玉佩、玉管、骨器等。M2 共出土有铜器、陶器、玉器、骨器、石器 155 件。其中玉佩 1 件，编

⁶⁹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凤翔县博物馆：《凤翔西关新区西周墓葬考古发掘简报》，《文博》2014 年第 2 期，3—9 页。

号 M2:87, 青白玉。近长方形, 一面略鼓, 一面较平, 中间有一长方形孔。两面均雕刻有相向双虎纹, 长 3.2、宽 2.9、厚 0.5 厘米 (图七)。玉管 1 件, 编号 M2:89, 青玉, 圆管状, 素面, 长 1.4、直径 0.6 厘米⁷⁰。



图三二 玉佩(M2:87)



图三三 玉佩(M2:87)

图七 山东枣庄徐楼 M2 出土玉器

3. 秦汉至南北朝

马川墓地位于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城西南约 21 公里的盛湾镇西北, 发现两汉时期的墓葬近 200 座, 其中积炭墓 16 座。墓葬的墓坑填土内均未发现积炭, 只在墓坑的四壁及墓底有堆积。其中 M7、M156 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M7 随葬有琉璃耳塞 1 件, 编号为 M7:14, 蓝色, 表面布满砂眼, 锥形, 一端有圆帽, 残长 3、帽径 1.3 厘米。玛瑙环 1 件 (M7:15), 五彩, 圆形, 中间厚, 边缘薄, 中间有圆孔, 直径 4.3、孔径 2.1 厘米。M156 随葬有琉璃珠 19 枚, M 156:23-1, 蓝色, 扁圆体, 中间有一小圆孔, 高 0.3、直径 0.6 厘米⁷¹。

海曲墓地位于日照市西郊十里堡村西南约 1.5 公里, 其西北约 1 公里为城址尚存的汉代海曲县城。2002 年 3-6 月,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墓地进行发掘。M218 为西汉中期木椁墓, 葬具为一棺一椁, 出土玉器 2 件, 有口琖和鼻塞⁷²。鼻塞 1 件, M218:17, 圆柱状, 直径 0.8-1、长 2.4 厘米。琖 1 件, M218:16, 蝉形, 一面平, 另一面起脊, 长 5.1、宽 2.6 厘米。

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北区陪葬墓 M6 和 M14 均为江都王陵陵园内的陪葬墓, 推测墓主人为第一代江都王刘非的妃嫔。均为竖穴土坑墓, 出土有玉器。M14 在棺内南部出土 1 件饰件 (M14:19), 已经碎成小碎片, 无法复原。其出土破碎形态应为入葬时状态⁷³。M6 出土玉带钩、玉琖各 1 件。玉带钩 M6:24, 凤鸟形, 钩首位简化鸟首, 素面, 长 2.6、宽 0.6、高 2.3 厘米 (图八)。玉琖 1 件 (M6:25), 蝉形, 背面纹饰明显, 刀法简练, 制作简洁, 长 2.7、宽 1.1、高 1 厘米 (图八)⁷⁴。

⁷⁰ 枣庄市博物馆、枣庄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枣庄市峄城区文广新局:《山东枣庄徐楼东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 年第 1 期, 4—27 页。图片来源于网络于 14 页, 图三二、三三。

⁷¹ 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驻马店市文物考古管理所:《河南淅川马川墓地汉代积石积炭墓的发掘》,《考古学报》2014 年第 2 期, 271—292 页。

⁷²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日照市海曲 2 号墩式封土墓》,《考古》2014 年第 1 期, 53—71 页。

⁷³ 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北区陪葬墓》,《考古》2014 年第 3 期, 51 页。

⁷⁴ 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北区陪葬墓》,《考古》2014 年第 3 期, 24—57 页。图片来源于网络于 30 页。



图八 大云山 M6 出土玉器

安徽寿县寿春镇计生服务站东汉墓于 2009 年 6 月遭到破坏，随葬遗物遭哄抢而流失。2010 年 4 月份由寿县公安部门立案追剿，9 月部分遗物移交到寿县博物馆收藏，推测该墓墓主人为汉光武帝之子，东汉阜陵质王刘延。移交的遗物有金器、玉石器、漆器扣件、铜器和铁器。玉器有玉佩 4 件、玉衣片 15 片、青金石和绿松石微雕瑞兽串饰 3 件、绿松石珠串饰 5 件、水晶饰件 3 件⁷⁵（图九）。



图九 安徽寿县东汉墓追缴玉器

马山墓群第 49 号墩汉墓位于浙江省西北部的安吉县良朋镇上马山墓群，北面为高禹镇五福墓群，东面为笔架山墓群，东南约 3.5 公里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吉古城遗址。2008 年进行发掘，共有 6 座竖穴土坑木椁墓。玉器共 8 件（组），有玉璧、玉口晗、鼻塞、耳塞，集中出土在 M6。M1 出土玉璧 1 件。M6 为带墓道的竖穴土坑木椁墓，由封土、墓道、墓坑和外藏椁等四部分组成，出土随葬器物 56 件，从棺钉及出土两组玉口晗、耳塞、鼻塞可知该墓为双棺，可能为夫妻同穴合葬。

玉璧 2 件（M1:1、M6:1），灰白色，残，受沁严重，单面饰谷纹。M1:1，外径 12.2、内径 4 厘米。口晗 2 件（M6:4、M6:53），白玉，整体扁平，略呈蝉形。通体莹润光滑。M6:53，长 4.6、宽 2.4、厚 0.9 厘米（图一〇:9）。鼻塞 2 组 4 件（M6:3、M6:54），白玉质，圆柱状，通体莹润光滑。M6:54-1，长 2.2、直径 0.6-0.8 厘米（图一〇:7）。M6:54-2，长 2.1、直径 0.6-0.7 厘米（图一〇: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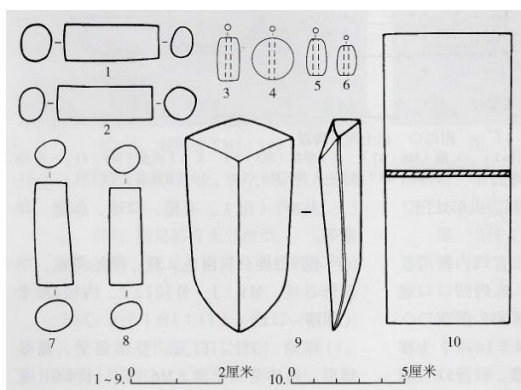
耳塞 2 组 4 件（M6:2、M6:55）。白玉质，圆柱状，通体莹润光滑。M6:55-1，长 2.1、直径 0.7-

⁷⁵ 许建强、邱雪峰：《安徽寿县寿春镇计生服务站东汉墓遗物及相关问题》，《东南文化》2014 年第 3 期，46—52 页。图片来源于网络版一、二。

0.8 厘米（图一〇:1）。M6:55-2，长 2.1、直径 0.6-0.7 厘米（图一〇:2）。⁷⁶

南京雨花台石子岗南朝砖印壁画墓 M5 位于石子岗雨花软件园 A1 地块东面北侧的一座山坡的西麓。该墓为拼镶砖印壁画墓，推测墓主人为南朝中晚期宗室中级别较高的人物。砖室平面为凸字形，墓室平面呈长方形，通长 8.4、宽 2.64 米，由封门墙、甬道、墓室组成。墓葬早年即被破坏，清理出土 60 件器物。随葬器物多集中在棺床前部。其中玉环 1 件，M5:55，白色，有土沁，残。残长 3、断面径 0.4 厘米⁷⁷。

福建省南安市丰州镇桃源村皇冠山南坡 M22 为刀形墓，年代为南朝，长 5.67、宽 2.16、残高 2.2 米。长方形甬道位于墓葬前部右侧。M22、M28、M33 各随葬一料珠串，绳已腐烂。料珠大致呈圆形或扁圆形，大小不一，其中只有 M22:10 有详细描述⁷⁸（图一一）。



图一〇 马山墓群第 49 号墩 M1、M6 出土器物



图一一 皇冠山 M22 出土器物

4. 元代

西安东郊皇子坡村元代武敬墓(编号 M42)平面略呈凸字形，葬于 1313 年，坐北朝南，方向 173°。由墓道、封门、墓室及壁龛组成。出土玉石器有玉件、绿松石、水晶珠等饰品。

镂空佩饰 2 件，M42:11 和 M42:12，黄玉，形制大小相似。标本 M42:12，透雕。高约 3.1、宽约 1.9、厚 0.6 厘米(图一二)。

串珠 8 件，包括 M42:10、M42:13-15、M42:17-19。均出自于 M42 木棺北侧，外表不规则，色彩各异，主要有绿、蓝、黑等色。可辨的材质如 M42:14，水晶较为透亮，中有穿孔，直径 0.9 厘米。M42:18，绿松石，表面不规则，略呈球形，中间有穿孔，直径 1.3 厘米⁷⁹。

5. 年代待定者

⁷⁶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县上马山第 49 号墩汉墓》，《考古》2014 年第 1 期，14—36 页。图片来源于网络于 32 页。

⁷⁷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雨花台区文化局：《南京雨花台石子岗南朝砖印壁画墓（M5）发掘简报》，《文物》2014 年第 5 期，20—38 页。

⁷⁸ 福建博物院、泉州市博物馆、南安市博物馆：《福建南安市皇冠山六朝墓群的发掘》，《考古》2014 年第 5 期，37—63 页。图片来源于网络于 57 页，图四三。

⁷⁹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东郊皇子坡村元代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4 年第 3 期，21—34、102 页。图片来源于网络于 30 页，图一九。

阿拉沟墓地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鱼儿沟火车站西南 2.2 公里处，地理坐标为东经 87° 52′ 28.3″，北纬 42° 48′ 59.6″。M3 墓坑为圆角长方形竖穴墓，墓坑内有一座石室，用扁平卵石、山石紧贴坑壁平砌而成，平面呈长方形，长 2.5、残宽 1.5、高 1.2 米。多人葬，初步统计有 5 个个体，其中 2 为成年男性、2 为成年女性，1 为未成年人。石室西部近头端出土绿松石珠 2 件、红玛瑙珠、红玛瑙金耳环各 1 件。绿松石珠 6 件。M3:4，圆台形，中间有一对钻孔，顶径 0.35、底径 0.75、高 0.6 厘米⁸⁰。

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锡尼镇顶盖敖包墓地位于杭锦旗锡尼镇（原属胜利乡，扎尔庙嘎查）顶盖敖包村东北 1 公里，墓葬以西约 1 公里为扎尔庙汉代古城。2010 年 9-10 月，进行了勘探，共发掘墓葬 7 座，编号 M1-M7。其中 M6 出土玛瑙饰件 1 件，M7 早期被盗，出土器物仅见盖弓帽、玉琮各 1 件。玛瑙饰件 1 件。M6:6，整体呈鱼形，切面为椭圆形，上下端有孔对穿，中部有黑白相间纹饰两周（图一三）。玉琮 1 件，M7:1，蝉形，雕刻线条流畅，造型逼真，前端琢出双目和吻部线纹，身体有双翼、腹和尾尖，有残损处⁸¹（图一三）。



图一九 镂空玉佩饰 (M42:12)



1. 玉琮 (M7:1)



2. 玛瑙饰件 (M6:6)

图一二 武敬墓出土玉器

图一三 顶盖敖包墓地出土器物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长源村西南的麦地巷遗址，2009 年 9-12 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与深圳市南山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玉器 3 件，为玉玦。形制相同，呈环形。同出，推测受扰动的 M37 随葬品，保存完整。

T2②: 2 略呈椭圆形，近缺口处略宽，环中部微凸，外径 3.8、内径 1.0、宽 1.1-1.3、厚 0.6 厘米，缺口宽 0.3 厘米。磨制精细。乳白色，石质润泽光滑，通透性略差。素面，器表有白色斑迹和划痕若干。

T2②: 3 略呈椭圆形，近缺口处加厚加宽，环中部微凸，外径 3.7、内径 1.6、宽 1.0、厚 0.6 厘米，缺口宽 0.4 厘米。磨制精细。乳黄色（黄玉？），玉质润泽光滑，但通透性略差，素面，表面有白色斑点和裂纹。

T2②: 4 环状，截面略呈等腰三角形，外径 3.7、内径 2.0、宽 0.8、厚 0.9 厘米，缺口宽 0.4 厘米。水晶材质，半透明，内夹大量白色线状纹理和絮状物，通透性较差。磨制精细，素面，有裂痕

⁸⁰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乌鲁木齐市鱼儿沟遗址与阿拉沟墓地》，《考古》2014 年第 4 期，19—35 页。

⁸¹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顶盖敖包墓葬》，《草原文物》2014 年第 1 期，32—44 页。图片来源于网络。

二 研究文章

1. 研究类

曲艳丽、刘景文《吉林省出土玉器概述》一文将吉林省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出土的玉器资料进行搜集和整理,分为“新石器时代的早期玉器”、“青铜时代玉器”、“战国晚期至魏晋时期玉器”、“鞞鞞和渤海时代的玉器”、“辽金时代的玉器”、“元明清时期的玉器”等 6 个部分⁸³。

庞小霞《中国出土新石器时代绿松石器研究》一文在全面搜集中国新石器时代出土绿松石器的基础上,按照器物的性质特征和功能来分别进行讨论,就其功能来讲主要作为人体或器物的装饰,不能排除个别绿松石为葬玉或体现身份等级的可能。后又对绿松石器的形制特征及演变、时空分布特征、绿松石器的出土环境及背景、产地来源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得出如“绿松石发现较多的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现的玉器却较少”、“从明确提及出土位置的墓葬材料看,绿松石器多发现于颈部、下颌骨和胸前,也有极少数见于腰部和手部”、“龙山文化时期绿松石已被少数人较为严格的控制和使用,成为少数人的专享物品”等有意义的结论⁸⁴。

郭明建《良渚文化宏观聚落研究》一文在其硕士论文的基础上,通过对良渚文化各地区的聚落进行分析,认为在良渚文化中,不论是早期的良渚遗址群还是晚期的寺墩,其规格之高都是建立在对玉器资源的控制之上的,正因为如此,它们才可能对其周围的整体有较大影响。良渚遗址群作为良渚文化早期的一个玉器生产中心,其控制着大量的玉器资源,这也是其有能力修建城墙和莫角山、反山之类的建筑的原因。到了良渚文化晚期,随着它的衰落,控制着新玉器资源的寺墩则变得强大起来⁸⁵。

徐峰《石峁与陶寺考古发现的初步比较》一文比较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考古文化在用玉(案:主要指墙壁内外嵌玉现象)、彩绘、暴力等文化表象层面的相似性,认为两地可能通过黄河干流上最长的一段连续峡谷晋陕峡谷进行过较为密切的远距离互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族群等多个层面⁸⁶。

岳连建《从两周诸侯国墓地发掘看周代的礼乐制度》一文通过对虢、应、晋、芮等两周时期诸侯国墓地考古资料的梳理,结合文献资料从墓葬出土青铜礼器、乐器、玉器以及舆服、棺槨、墓葬形制等方面,对墓葬所反映出的周代礼乐制度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阐述了周代礼乐制度对后世的影响⁸⁷。

张菁华《瑰丽高雅的七璜联珠组玉佩》一文对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 M2001 号虢国虢季墓中出土的七璜联珠组玉佩进行介绍,认为是虢国贵族高贵身份和西周用玉归于礼制化的表现⁸⁸。

⁸²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深圳市南山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广东深圳麦地巷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14 年第 2 期,61—75、82 页。

⁸³ 曲艳丽、刘景文:《吉林省出土玉器概述》,《北方文物》2014 年第 2 期,46—48 页。

⁸⁴ 庞小霞:《中国出土新石器时代绿松石器研究》,《考古学报》2014 年第 2 期,139—168 页。

⁸⁵ 郭明建:《良渚文化宏观聚落研究》,《考古学报》2014 年第 1 期,1—32 页。

⁸⁶ 徐峰:《石峁与陶寺考古发现的初步比较》,《文博》2014 年第 1 期,18—22、69 页。

⁸⁷ 岳连建:《从两周诸侯国墓地发掘看周代的礼乐制度》,《中原文物》2014 年第 1 期,42—47 页。

⁸⁸ 张菁华:《瑰丽高雅的七璜联珠组玉佩》,《中原文物》2014 年第 2 期,121—123 页。

王玮、王金潮《大云山汉墓金缕玉衣修复报告》一文详细地介绍了被盗的盱眙县大云山汉墓的金缕玉衣修复过程，最后对玉衣玉片的数量进行统计，即江苏省盱眙县大云山出土的这件金缕玉衣，共计 2381 块玉片，其中原有玉片 1738 块，新配玉片 643 块。并对玉片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如“发现 8 块玉片的背面有涡形纹饰，为早期玉璧残件改制而成”，“头罩环和面罩的玉片做工细腻，但玉衣其他部件的玉片材质粗糙多为玉梗所制。除头部、双脚之外，其余部件的最外侧玉片的边缘皆为毛刺，不作打磨处理”，根据这些情况，并进而推测这件玉衣的主人应该是暴毙而仓促下葬，因而工匠们赶制了这件形制随意、玉片排列不均的玉衣。玉衣以金丝串联，玉衣面罩 135 块，双眼和嘴没有单独刻制；玉衣头罩，238 块；前胸后背 255 块玉片⁸⁹。

褚馨《六朝时期的玉容器》一文可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围绕刘弘墓中出土的玉容器“樽”和“卮”进行细致分析及系统考证，得出二者的区别；第二部分则对六朝时期墓葬中出土的深腹杯、耳杯、玉盏进行讨论⁹⁰。

元代张天师“阳平治都功印”印材青白玉质，洁白莹润（图一四）。印体通高 6.4、边长 12.3 厘米，重 972 克，熊贤礼对其功能和印面篆书阳文进行详细的解读⁹¹。



图一四 张天师“阳平治都功印”

林梅村《珠宝艺术与中外文化交流》一文围绕“西方宝石与中国玉石”、“印度和西域宝石”、“阿拉伯和波斯宝石”展开叙述，涉及翡翠、猫眼石、蓝宝石、祖母绿、绿松石等，最后对湖北钟祥梁庄王墓出土的“番国宝物”进行考察。在已有论述的基础上，认为西方宝石在中国流行实乃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经历了东汉末年佛教传入、蒙元帝国时期、明初朝贡贸易三个主要阶段⁹²。

扬之水《“文”“物”相映之二——明代首饰中的“万寿”、“摩利支天”、“毛女”》一文对明代首饰中的释道题材进行考证，如对蕲春王宣明墓中“摩利支天像金挑心”、“毛女图金簪”的考证，并结合相应的历史背景和文本资料对定陵出土的金镶玉首饰进行展开描述⁹³。

李毅君《“元统三年”铭碑形玉祭牌》一文结合历史文献和背景，对元成宗之女、鲁王之妻普纳制

⁸⁹ 王玮、王金潮：《大云山汉墓金缕玉衣修复报告》，《江汉考古》2014 年第 1 期，113—118 页。

⁹⁰ 褚馨：《六朝时期的玉容器》，《华夏考古》2014 年第 2 期，95—101 页。

⁹¹ 熊贤礼：《白玉天成 阳平印记：元代张天师白玉法印解析》，《南方文物》2014 年第 2 期，190—191 页。图片来源于网络。

⁹² 林梅村：《珠宝艺术与中外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2014 年第 1 期，76—88 页。

⁹³ 扬之水：《“文”“物”相映之二——明代首饰中的“万寿”、“摩利支天”、“毛女”》，《南方文物》2014 年第 1 期，162—164 页。

作的玉祭碑进行详细地介绍。玉祭碑作为全宁路三皇庙中的祭祀用品，反映鲁王家族推行汉法，尊道崇儒的态度。“元统三年”铭碑形玉祭牌作为十分罕见的元代皇家玉器，采用规格较高的碑形还是首次发现⁹⁴。

2.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玉器相关学位论文

曹芳芳《龙山时代玉器与用玉传统的嬗变——以黄河流域为中心》一文通过对黄河流域龙山时代玉器的细致梳理，重点考察不同地区的用玉传统，进而探讨龙山时代用玉传统的嬗变和玉器所反映的龙山时代社会。正如文中所说从龙山时代早期至龙山时代晚期，玉器不仅完成了空间上的转移——由沿海到中原，而且完成了功能上的转换——由神权到王权。中原地区也经历了由龙山时代早期玉器的“接受者”到龙山时代晚期玉器的“输出者”的转变，应当与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和夏王朝的诞生有关⁹⁵。

吴正龙《东周楚系玉器风格研究》一文在对楚地、楚系玉器概念重新界定的基础上，透过对质料、形制与纹饰三方面的解构、分析，认为东周楚地玉器形制特征以璜珩的交替、独立式与组合式两种造型配置的共存、造形轮廓转化以及造型结构多样性最为突出，而纹饰则仅有稳定的四类组件，以组合与替换的方式配置独立式与组合式两类纹样，并使用连续与对称两种排布方式，用于纹饰系统的构建。并对东周楚地治玉风格进行概括：“省工省料”原则下，秉承“因材施工”造形理念，以强调造型为纹饰设置初衷，利用镂空等工艺实现形纹平衡、理想原则与设计制作的具有繁缛多变、奇诡华丽、强烈浪漫主义色彩的制玉模式⁹⁶。

3. 科普鉴赏类

张雪《长沙市博物馆藏战国琉璃珠赏析》，《文物天地》2014年第1期，60-62页。

曲石《驱凶祛邪通灵玉》一文讲述刚卯、玉翁仲、玉司南佩三者的源流、器形等⁹⁷。

陈文彦《民国北京玉作》一文对民国时期北京制玉作坊、人才、技艺、品种作一介绍⁹⁸。

张宏明《马踏春风逐好梦——甲午说玉马》一文简介了从商周到明清有关玉马的工艺、造型等相关情况⁹⁹。

刘斌《圭璋的时代——龙山与夏代玉器》¹⁰⁰，蒋卫东《走进新时代——夏时期玉器与玉文化》¹⁰¹，方向明《精益求精——夏时期玉文化的工艺》¹⁰²三篇文章通过对玉文化自身发展的梳理，进而窥见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探寻中华文明之源。

红山文化玉卷龙，高5.9厘米，宽4.8厘米，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3期，底面彩

⁹⁴ 李毅君：《“元统三年”铭碑形玉祭牌》，《文物世界》2014年第3期，63—66页。

⁹⁵ 曹芳芳：《龙山时代玉器与用玉传统的嬗变——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6月。

⁹⁶ 吴正龙：《东周楚系玉器风格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5月。

⁹⁷ 曲石：《驱凶祛邪通灵玉》，《文物天地》2014年第1期，98—100页。

⁹⁸ 陈文彦：《民国北京玉作》，《文物天地》2014年第1期，101—105页。

⁹⁹ 张宏明：《马踏春风逐好梦——甲午说玉马》，《文物天地》2014年第2期，26—31页。

¹⁰⁰ 刘斌：《圭璋的时代——龙山与夏代玉器》，《文物天地》2014年第6期，14—16页。

¹⁰¹ 蒋卫东：《走进新时代——夏时期玉器与玉文化》，《文物天地》2014年第6期，17—22页。

¹⁰² 方向明：《精益求精——夏时期玉文化的工艺》，《文物天地》2014年第6期，23—27页。

图。

清代螭衔灵芝玉双耳洗，通高 9.8 厘米，口径 16.6 厘米；清代桃蝠玉水盂，长 9.4 厘米，宽 8.6 厘米，高 3.9 厘米，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 年第 4 期，封面、底面彩图。

良渚文化神面纹琮，高 4.7 厘米，宽 7.3 厘米。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 年第 5 期，封面彩图。

宋元时期双螭玉耳杯，长 10.8 厘米，宽 5.5 厘米；底面彩图为宋代的鸟衔花玉巾环、鱼莲玉巾环和金代的双鹅玉巾环，其中鸟衔花玉巾环长 6.8 厘米，宽 3.8 厘米；鱼莲玉巾环长 4.8 厘米，宽 4.4 厘米；双鹅玉巾环长 3.7 厘米，宽 3.2 厘米，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 年第 6 期，封面彩图。

江苏扬州隋炀帝及萧后墓葬出土的玉璋（M2:78），见《东南文化》2014 年第 1 期彩插四，5。

三 2013 年下半年期刊所载玉器资料索引（以汉语拼音序）

1. 考古材料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怀宁县文物管理所：《安徽怀宁孙家城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4 年第 5 期，4—19 页。

福建博物院、晋江市博物馆：《福建晋江庵山青铜时代沙丘遗址 2009 年发掘简报》，《文物》2014 年第 2 期，4—16 页。

福建博物院、泉州市博物馆、南安市博物馆：《福建南安市皇冠山六朝墓群的发掘》，《考古》2014 年第 5 期，37—63 页。

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驻马店市文物考古管理所：《河南淅川马川墓地汉代积石积炭墓的发掘》，《考古学报》2014 年第 2 期，271—292 页。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三门峡李家窑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 年第 3 期，4—17 页。

李家窑遗址考古发掘队：《三门峡发现虢都上阳城》，《中国文物报》2001 年 1 月 10 日。

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北区陪葬墓》，《考古》2014 年第 3 期，24—57 页。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雨花台区文化局：《南京雨花台石子岗南朝砖印壁画墓（M5）发掘简报》，《文物》2014 年第 5 期，20—38 页。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巴林左旗友好村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草原文物》2014 年第 1 期，28—31 页。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顶盖敖包墓葬》，《草原文物》2014 年第 1 期，32—44 页。

平阴周河遗址考古队：《山东平阴县周河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的发掘》，《考古》2014 年第 3 期，3—12 页。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日照市海曲 2 号墩式封土墓》，《考古》2014 年第 1 期，53—71 页。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山西原平市辛章遗址 2012 年发掘简报》，《考古》2014 年第 5 期，3—16 页。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凤翔县博物馆：《凤翔西关新区西周墓葬考古发掘简报》，《文博》2014 年第 2 期，3—9 页。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皇子坡村元代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4 年第 3 期，21—34、102 页。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乌鲁木齐市鱼儿沟遗址与阿拉沟墓地》，《考古》2014 年第 4 期，19—35 页。

许建强、邱雪峰：《安徽寿县寿春镇计生服务站东汉墓遗物及相关问题》，《东南文化》2014 年第 3 期，46—52 页。

枣庄市博物馆、枣庄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枣庄市峄城区文广新局：《山东枣庄徐楼东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 年第 1 期，4—27 页。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县上马山第 49 号墩汉墓》，《考古》2014 年第 1 期，14—36 页。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办公室：《新郑铁岭墓地 M308 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4 年第 2 期，4—17 页。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深圳市南山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广东深圳麦地巷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14 年第 2 期，61—75、82 页。

2. 研究文章

曹芳芳：《龙山时代玉器与用玉传统的嬗变——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年 6 月。

陈文彦：《民国北京玉作》，《文物天地》2014 年第 1 期，101—105 页。

褚馨：《六朝时期的玉容器》，《华夏考古》2014 年第 2 期，95—101 页。

方向明：《精益求精——夏时期玉文化的工艺》，《文物天地》2014 年第 6 期，23—27 页。

郭明建：《良渚文化宏观聚落研究》，《考古学报》2014 年第 1 期，1—32 页。

侯怡利：《金甌永固與玉燭長調》，《故宫文物月刊》第 375 期，2014 年 6 月。

蒋卫东：《走进新时代——夏时期玉器与玉文化》，《文物天地》2014 年第 6 期，17—22 页。

李毅君：《“元统三年”铭碑形玉祭牌》，《文物世界》2014 年第 3 期，63—66 页。

林梅村：《珠宝艺术与中外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2014 年第 1 期，76—88 页。

林永钦：《续活计——记院藏珍玩菁华展展件嵌玉木匣之修护》，《故宫文物月刊》第 378 期，2014 年 9 月。

刘斌：《圭璋的时代——龙山与夏代玉器》，《文物天地》2014 年第 6 期，14—16 页。

庞小霞：《中国出土新石器时代绿松石器研究》，《考古学报》2014 年第 2 期，139—168 页。

曲艳丽、刘景文：《吉林省出土玉器概述》，《北方文物》2014年第2期，46—48页。

曲石：《驱凶祛邪通灵玉》，《文物天地》2014年第1期，98—100页。

王玮、王金潮：《大云山汉墓金缕玉衣修复报告》，《江汉考古》2014年第1期，113—118页。

吴正龙：《东周楚系玉器风格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5月。

熊贤礼：《白玉天成 阳平印记：元代张天师白玉法印解析》，《南方文物》2014年第2期，190—191页。

徐峰：《石峁与陶寺考古发现的初步比较》，《文博》2014年第1期，18—22、69页。

扬之水：《“文”“物”相映之二——明代首饰中的“万寿”、“摩利支天”、“毛女”》，《南方文物》2014年第1期，162—164页。

岳连建：《从两周诸侯国墓地发掘看周代的礼乐制度》，《中原文物》2014年第1期，42—47页。

张宏明：《马踏春风逐好梦——甲午说玉马》，《文物天地》2014年第2期，26—31页。

张菁华：《瑰丽高雅的七璜联珠组玉佩》，《中原文物》2014年第2期，121—123页。

朱乃诚：《牙璋的流传与分布所反映的夏史史迹》，《故宫文物月刊》第373期，2014年4月。

3. 学术会议、讲座与展览

“东部沿海史前玉器与史前文明”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博物馆召开¹⁰³。

“敖汉玉料新发现与玉文化起源”学术座谈会在京举行¹⁰⁴。

朱乃诚于2014年7月5日在国家图书馆做“牙璋的流传分布所反映的夏史史迹”讲演，为公众介绍通过牙璋的研究反映出的夏史线索¹⁰⁵。

《呦呦鹿鸣——燕国公主眼里的霸国》展览于2014年7月29日—11月16日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由出嫁、祭祀、丧葬、宴饮四个单元组成，展示霸伯壘、铜人顶盘（灯）、“燕侯旨”卣、金璜、玉戚、漆木人俑、玉鹿鸟形盃等墓葬出土器物¹⁰⁶。

《毛利碧玉：新西兰文化艺术珍品展》由新西兰国家博物馆——蒂帕帕汤格里瓦、中国国家博物馆共同推出，中国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主办，陕西历史博物馆承办，此次展览展示216件珍贵的毛利碧玉，展览分为毛利一个现存的文化、碧玉起源、蒂怀普纳姆——碧玉水域、珍贵的石头和传世珍宝等五部分，以新西兰碧玉为窗口和载体，通过碧玉讲述新西兰毛利人传统文化艺术，使观众进一步了解认知新西兰传统历史文化和当代文化艺术。展览既讲述毛利族世代相传的碧玉起源和分类，又科学介绍碧玉的各种地质学起源和分类，并提供部分珍贵玉石让观众可以零距离接触，使观众既有科学的理性认识，又有对毛利文化的感性认知，并亲身感受新西兰独特迷人的风土人情。以此向中国观众全面介绍新西兰毛利人独特的历史和深厚的玉石文化¹⁰⁷。

《玉润东方——大汶口—龙山·良渚玉器文化展》由山东省博物馆举办，大汶口—龙山文化与良

¹⁰³ <http://www.kaogu.cn/html/cn/xueshudongtai/xueshudongtai/xueshuhuiyi/2014/0829/47362.html>

¹⁰⁴ <http://www.kaogu.cn/html/cn/xueshudongtai/xueshudongtai/xueshuhuiyi/2014/0114/44997.html>
<http://www.aohan.gov.cn/Article/Detail/60420>

¹⁰⁵ <http://www.kaogu.cn/html/cn/xueshudongtai/xueshudongtai/xueshuhuiyi/2014/0707/46766.html>

¹⁰⁶ http://www.capitalmuseum.org.cn/zlxx/content/2014-07/24/content_60865.htm

¹⁰⁷ <http://www.sxhm.com/web/bgscn.asp?ID=7945>

渚文化玉器的连袂演出，一南一北的两种文明遥相呼应，本次展览从文明双璧、东方生活、玉敛玉藏、玉的传播和未解谜团五个单元的展示诠释了大汶口—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玉器文化，是一场南北两种文明的玉器文化盛宴¹⁰⁸。

¹⁰⁸ <http://www.sdmuseum.com/show.aspx?id=7428&cid=84>

玉器考古文献汇编（2014年7月—12月）

原载《玉器考古通讯》总第五期

卢亚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一 考古发现¹⁰⁹

1. 新石器时代

江苏泗洪顺山集新石器时代遗址于2010年至2013年进行三次考古发掘，为大型环壕聚落，遗存分为三期。第一期遗存出土玉管1件（图一:1）、绿松石1件。第二期遗存出土绿松石饰件2件（图一:2），第三期遗存出土有玉簪1件、玉件1件¹¹⁰。



1 2
图一 江苏泗洪顺山集遗址出土玉器

河南淅川龙山岗遗址在2008–2009年的发掘中，发现了丰富的仰韶时代晚期、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遗存。在屈家岭文化遗存中有玉环1件，穿孔玉饰件1件，推测为玉环或玉璜残件¹¹¹。

2013年5–11月，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杭州市拱墅区祥符镇的吉如遗址进行了发掘。此次发掘发现良渚文化时期人工营建土台、房址、墓葬、沟、灰坑等，出土大量陶片，少量玉器、石器、动物骨骼等遗物。在地层中发现3件玉锥形器和1件玉坠，均为软玉¹¹²。

甘肃张掖市西城驿遗址于2010–2013年进行发掘，其年代为距今4100–3600年，遗存分为马厂晚期、西城驿二期、四坝文化三个时期，此次发掘明确了四坝文化的来源，初步建立了黑水河流域史前文化序列。西城驿二期遗存M11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在人骨颈部出土的玉器1件绿松石珠，左胸处

¹⁰⁹ 本部分亦收录2013年出版的各考古报告中所见的出土玉器资料。

¹¹⁰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泗洪县博物馆：《江苏泗洪顺山集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4年4期。

¹¹¹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省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河南淅川龙山岗遗址2008–2009年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4年4期。

¹¹²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拱墅区吉如遗址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4年6期。

有 9 块玉料（图二）。三期遗存 M13 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胸部附近有 9 块玉料¹¹³。



图二 甘肃张掖市西城驿遗址出土玉料

2009-2010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蓝田县新街遗址进行发掘，其中龙山时代遗存有陶窑、灰坑和灰沟，出土的遗物有陶器、石器、和骨器等，玉笄 1 件，墨玉，器身呈“T”字，顶端宽平，底端已残，残长 5 厘米¹¹⁴。

2. 商周

2010-2011 年，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对官庄遗址南水北调干渠占压部分进行了发掘，其中以西周晚期遗存最为丰富，主要有大型环壕、灰坑、墓葬、房址、灰沟等。西周墓葬 15 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直壁、平底，其中 M25、M20 各随葬玉块 1 件，置于墓主口中，均为白色，圆形，素面¹¹⁵。

2013 年 7-8 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新疆和静县乔恩恰克勒德克墓地 15 座墓葬进行发掘，其年代相当于察吾呼文化晚期，属于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其中 M6、M14 各出土玛瑙珠 1 件，黑色，算珠状，中部有一对钻孔。标本 M6:16，直径 1.5、厚 1、孔径 0.4 厘米¹¹⁶。

2009 年发掘的新疆伊吾县托背梁古代游牧文化墓地，属于早期铁器时代。共清理墓葬 16 座、房址 1 座、祭祀遗迹 3 处。墓葬中竖穴土坑墓 3 座，竖穴石椁墓 13 座，出土金、银、铜、铁、陶、骨、木、玉石等质地随葬品 91 件，其中玉器有玛瑙串珠 5 件，绿松石管 5 件（组）。M1 出土的金耳饰由大、小金环和红玛瑙坠三部分组成（图三）¹¹⁷。

¹¹³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甘肃张掖市西城驿遗址》，《考古》2014 年 7 期。

¹¹⁴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蓝田新街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4 年 4 期。

¹¹⁵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河南荥阳市官庄遗址西周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14 年 8 期。

¹¹⁶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和静哈布其罕萨拉墓群 2013 年发掘简报》，《文物》2014 年 12 期。

¹¹⁷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研究中心、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区文物局：《2009 年新疆伊吾县托背梁墓



图三 2009年新疆伊吾县托背梁墓地出土玛瑙金耳饰



图四 随州文峰塔 M1（曾侯與墓）、M2 出土玉器

江苏苏州高新区通安镇鸡笼山 D1 石室土墩墓位于鸡笼山西部最高峰，是石室土墩中最大的一座，其北部与真山大墓相对，初步推断为春秋时期高等级大墓。石室内地层叠压关系的发现证实石室存在“多次利用”的情况，在封土⑥层下石室铺地上共出土玉璜、玉玦、玉冲牙以及绿松石珠、绿松石片等 198 件（粒）。另外征集到玉璜 2 件、玉玦 1 件以及青铜器残件 2 件¹¹⁸。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发掘的隰县瓦窑坡墓地，年代为春秋战国时期，其中四座陶器墓未被盗扰，资料完整。M35 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随葬器物放置于椁室与棺之间的东北角，有陶罐、陶豆、骨管、石饰各 1 件，青白玉质玉片 2 件。M37 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随葬器物 7 件，有陶鼎 1 件、陶罐 1 件、陶壶 1 件、陶豆 2 件、骨器 1 件、玉片 1 件，除 1 件玉片放置于内棺骨架的盆骨处，其余则放置于椁室与棺之间的东南角¹¹⁹。

随州市东城区义地岗墓地的东南部文峰塔墓地在 2012-2013 年发掘东周墓葬 54 座和车马坑 3 座。该墓地是一处东周曾国贵族墓地，其年代上至春秋中期，下至战国中期后段。其中大型墓 M29 在棺内置有玉器。中型墓 M33 在棺内出土成组玉佩。小型墓 M34、M35 在棺内放置玉器¹²⁰。

湖北随州文峰塔墓地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进行发掘。其中 M1 在施工中被毁严重，墓圻为长方形，在现场清理出铜器、玉器、石器，据出土带有“曾侯與”铭文的编钟、铜鬲等，确定该墓为春秋晚期“曾侯與”墓，玉器有玉玦 1 件（图四：3）、玉佩 2 件（图四：5）、玉管 1 件。M2 为长方形岩坑竖穴填土积石木椁墓，由墓道、祭祀坑、墓圻填土及多层积石、主墓椁室、主棺、腰坑、陪葬棺所组成，年代稍晚于 M1，在春秋战国之际。其中出土玉器种类有单首龙形玉璜 2 件（图四：1）、双首龙形玉璜 1 件（图四：2）、扉棱玉璜 2 件、玛瑙璜（图四：4）、方形玉石片 21 件、蹄形玉片 1 件、绿松石珠 1 件¹²¹。

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4 年 4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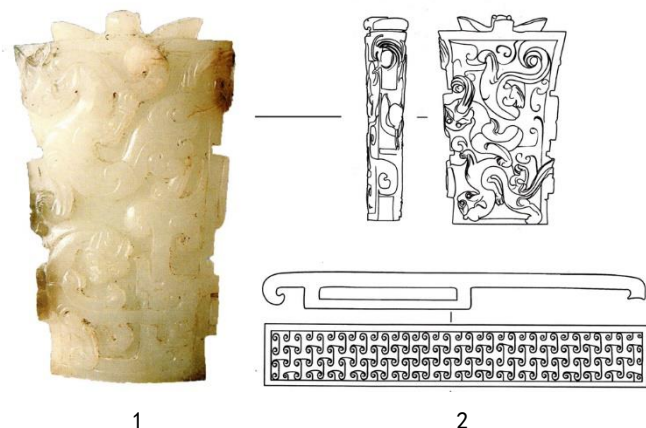
¹¹⁸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苏州高新区教育文体局：《江苏苏州高新区通安镇鸡笼山 D1 石室土墩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4 年 4 期。

¹¹⁹ 王进、陈小三：《隰县瓦窑坡墓地发现四座陶器墓》，《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 年 10 期。

¹²⁰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市文峰塔东周墓地》，《考古》2014 年 7 期。

¹²¹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文峰塔 M1（曾侯與墓）、M2 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4 年 4 期。

2004年4-12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青州市博物馆联合对西辛大墓进行了发掘。该墓是迄今山东地区发掘同类墓葬中最大的一座。墓葬平面呈“中”字形，由南北两条墓道、墓室、陪葬坑等组成。石椁以巨石垒砌，在石椁之外二层台上分布五座陪葬坑。随葬器物有陶器、铜器、玉器、金器、



图五 青州西辛战国墓出土玉剑玦、剑璏

银器、骨器、漆器及丝竹编织物等。从墓葬规模及所处地望分析，墓主的身份可能是齐国的贵族或与齐王室成员有关。该墓修筑考究，从墓室的加工规整、墓室填土方格网状的夯筑方式，到以加工规整的石块砌成的巨大石椁和以铁汁灌缝的现象等，都是同期墓葬中极为罕见的现象。这为进一步研究战国末年齐国墓葬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玉器2件，分别为剑玦、剑璏，均出土于器物箱内，无

剑，器形硕大，似非实用器。

剑玦1件(B1:8)。白玉质。玦呈上宽下窄的倒梯形，两侧各有数周对称的凹槽，正面和背面均浮雕两个卷曲的神兽，顶部浮雕一只展翅的鹰，而头部又似蝙蝠。顶宽5.1、底宽3.8、厚1.3-1.7、通高8.3厘米(图五:1)。

剑璏1件(B1:9)。黄玉质。平面为矩形，前后两端内卷，背有长方形釜。正面刻划勾连云纹。长14.9、宽2.3、厚1.4厘米(图五:2)¹²²。

2001年10-11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东大杖子墓地进行了发掘，共发掘墓葬12座，有8座封土封石墓和4座竖穴土坑墓，随葬品主要为铜器，其次为陶器和玉石器等，器类包括武器、车马器、容器、工具等，这批墓葬的年代为战国早期或略晚阶段。随葬的玉器有玉饰件2、玛瑙环1(图六:3)，绿松石61枚(图七)，另外出有不规则玉坠饰1枚和玉石残片2件¹²³。2002年9-11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东大杖子墓地再次进行了发掘，共发掘墓葬13座，其中封土封石墓10座、竖穴土坑墓3座，随葬品共238件(套)，主要为铜器，其次为陶器和少量玛瑙、玉石器等，这批墓葬的年代为战国中期前后，个别墓葬年代可能会更晚。随葬玉器有玉环3件(图六:6)、玉凿1件、玛瑙觿1件(图六:2)、绿松石串饰1套共29枚(图八)¹²⁴。辽宁建昌县东大杖子墓地M40为竖穴土坑木椁墓，两椁一棺，带墓道，平面呈“甲”字形，填土中有人骨以及大量马、牛、羊、猪、狗等动物头骨，墓内出土鼎、豆、簋、壶、盘、盥、灯等陶礼器，以及大量的滑石饰件、玛瑙器、铜器等，

¹²²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州市博物馆：《山东青州西辛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9期。

¹²³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葫芦岛市博物馆、建昌县文物管理所：《辽宁建昌县东大杖子墓地2001年发掘简报》，《考古》2014年12期。

¹²⁴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葫芦岛市博物馆、建昌县文物管理所：《辽宁建昌县东大杖子墓地2002年发掘简报》，《考古》2014年12期。

其中玛瑙环 1 件（图六:5），绿松石坠 7 件，玉料 6 块，墓葬年代为战国中晚期¹²⁵。M47 为竖穴土坑木椁墓，两椁一棺，填土中有人骨以及大量马、牛、羊、猪、狗等动物头骨，墓内出土鼎、簋、豆、匜、罐、盥、盆、牛尊等仿铜陶礼器，以及玉器、玛瑙器、铜器等，随葬龙形玉佩 1 件（图六:1）、玛瑙环 1 件（图六:4），墓葬年代为战国晚期¹²⁶。



图六 辽宁建昌县东大杖子墓地出土玉器



图七 辽宁建昌县东大杖子墓地 2001 年发掘出土玉器



图八 辽宁建昌县东大杖子墓地 2001 年发掘出土玉器

黑龙江省木兰县石河乡石头河遗址于 1997 年 4 月发现，后多次考察中采集的遗物主要有石器、陶器及少量的玉器和铜器。推测该遗址的年代为两周时期。采集到的玉器均为磨制精美的装饰品，种类有玉璧、玛瑙珠、玉饰件，其中玉璧、玉饰件质地均为蛇纹玉¹²⁷。

¹²⁵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葫芦岛市博物馆、建昌县文物管理所：《辽宁建昌县东大杖子墓地 M40 的发掘》，《考古》2014 年 12 期。

¹²⁶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葫芦岛市博物馆、建昌县文物管理所：《辽宁建昌县东大杖子墓地 M47 的发掘》，《考古》2014 年 12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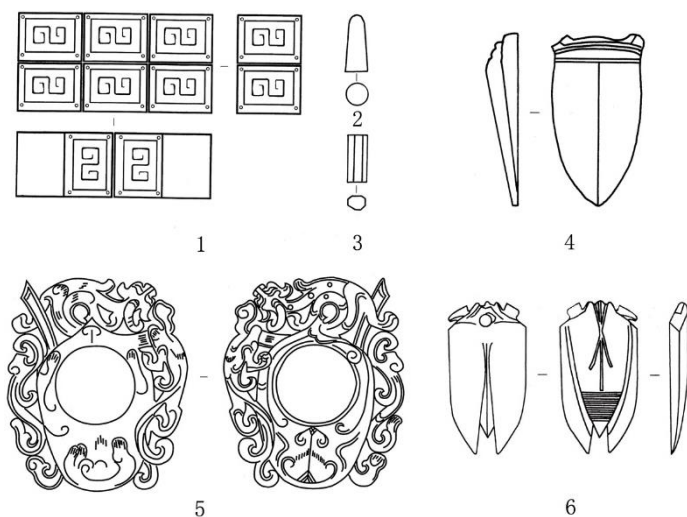
¹²⁷ 侯静波、李彦君：《黑龙江省木兰县石头河遗址调查简报》，《北方文物》2014 年 4 期。

3. 秦汉至隋唐

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 2005 年、2012 年共发掘 4 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石室墓，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墓葬年代为距今 1715-1855 年，即公元二世纪至三世纪前半，相当于中原的东汉时期，其中 M1 随葬料珠 1 组，包含浅绿色珠子 125 颗、红色珠子 9 颗，每隔 15 颗绿色珠有 1 颗红色珠，直径 0.5、高 0.3 厘米¹²⁸。

2009 年发掘的新疆巴里坤石人子沟遗址 III 区 F2 是一座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的小型石围居址。居址为四面石墙的半地穴式结构，出土的遗物有陶器、骨器、石器、料器和玛瑙料等。玛瑙料 1 件，通体红色，半透明，形体不规则，或为加工装饰品剩余的废料¹²⁹。

1992 年，为配合宜（昌）黄（石）高速公路建设，荆州博物馆在高台墓地发掘了 45 座古墓葬，其中的 44 座秦汉墓出土了大量铜器、玉器、漆木器及竹筒、木牍等珍贵文物¹³⁰。



图九 江苏徐州后山墓上层墓葬出土玉器

后山西汉墓位于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刘楼村南的后山顶部。2006 年 4 月下旬，当地村民在开山采石时发现一座墓葬（编号 M1），徐州博物馆随即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后山西汉墓为石坑竖穴结构，墓上封土已不存，墓口局部遭到破坏。竖穴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 3.6、东西宽 2.5、残深 4 米，方向为正南北向。竖穴内葬有不同时期的墓葬两层，上下两层墓葬完全重合，分属于新莽时期和西汉早期。上层墓葬出土“明音私印”

铜印，推测墓主为地方中级官吏。随葬有玉器 10 件，其中玉枕 1（图九:1）、玉琀 2（图九:4、6）、玉塞 6（图九:2、3）、玉佩饰 1（图九:5）。下层墓葬推测墓主可能为西汉早期刘氏宗室墓葬，出土 200 多片玉衣片，另有玉塞 1，玉镶件 1，玉管状器 1¹³¹。

2008 年 5 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苗圃墓地进行发掘，共发掘墓葬 21 座，其中石筑墓 19 座，砖室墓 2 座。两座砖室墓（M20、M21）位于墓地南部，东西并列，相距约 5 米。其中银戒指（M20:10）顶部为椭圆形镶嵌台，宝石脱落；两边各嵌一半球形宝石，宝石周围环绕连珠纹。玛瑙杯（M20:11）

¹²⁸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 2012 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4 年 4 期。

¹²⁹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等：《2009 年新疆巴里坤石人子沟遗址 F2 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2014 年 5 期。

¹³⁰ 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高台墓地 M46 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4 年 5 期。

¹³¹ 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后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 年 9 期。

环状，截面呈心形。外径 3.8、内径 1.8、厚 0.9 厘米¹³²。

2007 年 3 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对重庆涪陵点易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其中两座汉代墓葬（M3、M4）出土遗物丰富。两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随葬器物一百余件，有陶、铜、玉、铁及石器。结合墓中出土的釜、甑、钫、盃及釜等铜器，初步推断两墓年代为西汉早期。M3 出土的镜架和镜饰是本次发掘的重要收获。镜背之上放置的束腰多棱木杆、两件多面体束腰木杆，应分别是铜镜的附属物、镜架。这一发现对于研究汉代铜镜的具体使用方式，特别是镜架和镜饰的形态具有重要意义。M4 出土玉石器 12 件，包括玉璧 1 件，玉饰 4 件，玉剑饰 3 件，玉饼 2 件，绿松石耳珰 1 件，方形绿松石饰 1 件。M3 出土玉璧 1 件，玉璜 3 件，玉印章 1 件，龙形玉佩 1 件，玉带钩 1 件¹³³。

河南淅川泉眼沟汉代墓葬于 2010 年 10 月至 2011 年 1 月进行了勘探和抢救性发掘。共发掘清理 93 座墓葬。其中 M87 为凸字形墓室，随葬陶罐、仓、磨等 23 件，铜钱 961 枚。后室东侧棺内放置有铜钱、琉璃耳珰和一串料珠等¹³⁴。

2012-2013 年，在成都市天回镇发掘 4 座西汉土坑木椁墓，推测年代在汉景帝、武帝时期，其中最为重要的有 M1 出土的公私文书、M2 出土的玉石器有玉塞、印章等和 4 部竹木制织机模型、M3 出土的八部医书竹简及漆人体经穴俑等¹³⁵。

《穿越宜溧山地：宁杭高铁江苏段考古发掘报告》是宁杭高铁江苏段文物保护项目考古发掘成果的汇总。其中江宁湖熟曹家边汉墓 M2 为带斜坡墓道的竖穴土坑木椁墓，墓向 90°。墓葬由斜坡墓道、甬道、墓门、墓坑和木棺五部分组成，从墓葬平剖面可知，随葬有玉塞、玉眼罩，玉眼罩置南侧棺内，椭圆形，两头尖，钻两孔。玉塞 2 件，置南侧棺内，六面体柱状。宜兴百合村土墩墓 D1M1 清理随葬器物 17 件，种类有泥质陶、硬陶、原始瓷及玉器。玉器有玉片 1、玉珠 1¹³⁶。

2013 年 4 月至 8 月，考古单位对宁波市北仑区大碶街道璁珞村一批古代墓葬和窑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清理不同时期墓葬 9 座（编号 M1-M9），五代窑址 3 座（编号 Y1-Y3）、灰坑 1 个（编号 H1）。其中 M2 为竖穴木顶砖椁墓，年代为东汉早期，随葬硬陶甗、釉陶罐、泥质灰陶罐、铜钱、铁刀、银戒指等，其中蓝色琉璃质料珠 1 串¹³⁷。

《梁山薛垓墓地》中发表了汉墓 M15 的具体信息，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砖椁墓，方向 10°，在椁室南端有砖砌器物箱，椁室内在人骨西侧手臂处发现玉璧 1 件，东侧手臂发现铁剑 1 件。玉璧，和田玉，圆形，黄褐色，其上有沁斑和绉裂，装饰有规律的谷纹¹³⁸。

¹³²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辽阳苗圃墓地西汉砖室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 年 11 期。

¹³³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涪陵点易墓地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 年 10 期。

¹³⁴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美术考古研究中心、河南省文物局、南阳市文物局、淅川县文物局：《河南淅川泉眼沟汉代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4 年 3 期。

¹³⁵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荆州文物保护中心：《成都市天回镇老官山汉墓》，《考古》2014 年 7 期。

¹³⁶ 南京博物院：《穿越宜溧山地：宁杭高铁江苏段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3 年。

¹³⁷ 浙江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宁波北仑区博物馆：《浙江宁波北仑大碶璁珞东汉墓葬与五代窑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14 年 3 期。

¹³⁸ 山东省文物局、山东省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管理局：《梁山薛垓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 年，33-35 页。

余杭小横山汉、明墓地发掘汉墓 8 座，明墓 1 座。其中汉墓 M38 方向 156°，整体呈长方形，破坏严重，墓砖质量较差，墓壁为单砖错缝平砌，随葬品有陶壶、陶灶、陶井、陶甬、石器、铜镜以及铁剑，在墓室中西部发现 2 件料珠、玛瑙璜 1 枚及大量五铢钱¹³⁹。

2005-2006 年，陕西潼关税村发掘一座隋代壁画墓，推测墓主人可能是隋废太子杨勇。墓葬为一座长斜坡墓道多天井赫尔小龕的单室砖券墓，该墓随葬水晶串珠 22 枚，水晶串珠应该系玉佩构件¹⁴⁰。

江苏省扬州市曹庄隋炀帝与萧后墓于 2012 年 3-11 月进行发掘，均为砖室墓。M1 由墓道、甬道、主墓室、东耳室、西耳室五部分组成，出土隋炀帝墓志，随葬十三环蹀躞金玉带、鎏金铜铺首等。M2 由墓道、甬道、东耳室、西耳室组成，随葬白玉璋、铜编钟、铜编磬、凤冠等高等级的随葬品¹⁴¹。

2002 年 4-5 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灞桥区纺织城马家沟村东抢救性



图一〇 唐太州司马阎识微夫妇墓出土冠饰

发掘了一座唐墓(编号 M1)。墓葬为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单室土洞墓，随葬大量三彩俑、三彩动物、单彩动物、铜器、金银器等，还出土了两合墓志。据墓志可知，此墓为唐太州司马阎识微及夫人裴氏的合葬墓。夫人裴氏头部出土冠饰 1 组 (M1:114)。整个冠饰已散落成 300 余件饰件及残块，尺寸、大小不一，从长十余厘米的博鬓到长几毫米的玻璃饰件不等。饰件造型有人物、飞鸟、花卉等。这组冠饰的主体材质为铜鎏金，装饰材料涉及宝玉石、玻璃、珍珠、

羽毛等；制作工艺有焊接、鎏金、贴金、镶嵌、掐丝、珠化等(图一〇)¹⁴²。

4. 辽宋至明清

2013 年 5-6 月，朝阳市博物馆与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联合对辽宁省朝阳市龙城区七道泉子镇杜杖子村的一座辽代墓葬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墓葬为仿木结构的弧边方形单室穹窿顶砖室墓。此墓未经盗扰，出土陶、瓷、铜、铁器等随葬器物。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判断，墓葬的时代应为辽代早、中期，且墓主应有一定的身份地位，可能是地方官吏或家境殷实的士绅。随葬有玛瑙饰件 1 件(M1:27)。扁圆扣状，中间较厚，四周较薄。直径 1.5、中间厚 0.7 厘米。玛瑙杖首 1 件 (M1:20)。略呈球形，底部略平并有一圆形穿孔。直径 3.9、高 3 厘米¹⁴³。

2003 年，广西梧州蝶山区新民村白鹤山发掘古墓一座，编号 2003WBM1，年代为北宋中期，为一

¹³⁹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博物馆：《余杭小横山东晋南朝墓》，文物出版社，2013 年，388-389 页。

¹⁴⁰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著：《陕西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文物出版社，2013 年，6-10 页。

¹⁴¹ 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江苏扬州市曹庄隋炀帝墓》，《考古》2014 年 7 期。

¹⁴²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马家沟唐太州司马阎识微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 年 10 期。

¹⁴³ 朝阳市博物馆、朝阳龙城区博物馆：《辽宁朝阳杜杖子辽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14 年 11 期。

砖砌券顶并列双室墓，方向 28°。无甬道、墓道。随葬品有陶魂瓶 4 件，铁棺钉 16 枚、青白玉簪 2 件、铜钱 10 枚。玉簪 2 件，均为青白玉，形制相同，前部呈圆锥状，尾部呈正方体，末端四角折内收，长度约 6 厘米¹⁴⁴。

2007-2008 年，西夏王陵六号陵进行了考古发掘，已发表的考古报告中介绍了六号陵的角台、外城墙、阙台、碑亭、月城、陵城、献殿、陵台、地宫及其出土遗物。其中出土的带西夏文字的残碑对西夏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墓室填土和墓道填土中出土料珠 50 余枚，呈圆形，深蓝色或灰黑色，中间有一穿孔¹⁴⁵。

2000 年 5 月至 2001 年 7 月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南宋临安府治进行四次考古发掘，发现的基址的布局、规模、形制、营造等成为复原府署建筑重要依据，为研究古代衙署官式建筑及其沿革提供实物资料¹⁴⁶。其中临安府治遗址出土玉饰件 1，残，平面呈长方形，残长 8.1、宽 6.6、厚 1.1 厘米¹⁴⁷。

刘国强对 1986 年陕西旬阳南宋窖藏器物进行了介绍，出土铜象棋子一副 32 枚，铜印章 1 枚，铜货币 13 种 114 枚，打马格钱 2 枚，厌胜钱 4 枚，各种佛教遗物 16 件，骨骰子 2 枚，琉璃珠 35 枚，影青摩羯砚滴 1 件，玉兔 1 件等。其中玉兔长 3.4、高 2.1、阔 1.4 厘米，玉质呈白色，整体雕一卧兔（图一一）。兔前肢平伸，吻部抵足，作含草状。刀法简洁，形体生动。腹背之间有一圆孔，可作佩戴之用¹⁴⁸。



图一一 陕西旬阳南宋窖藏出土玉兔



图一二 南京白马村明代仇成墓出土玉带

2012 年底至 2013 年初，南京市博物馆对 1965 年发掘的仇成墓的发掘资料进行了整理，并对现存神道石刻进行了调查测绘。仇成墓位于钟山西北麓原南京电影机械厂内的小山坡上，墓葬由地面神道石刻与地下砖砌墓室两部分组成。神道石刻尚存石马与控马官、石羊、石虎各一对以及神道左侧的石武士。墓葬形制为长方形券顶砖室墓，出土器物有陶缸、瓷梅瓶、玉带、鎏金银束发冠、金冥钱、铁灶、墓志等。其中玉带 1 副（图一二），共 19 块，青白玉质，局部受沁呈现鸡骨白色斑。表面均有

¹⁴⁴ 梧州市博物馆、蒙山县文物管理所：《广西梧州近年发现的三座古墓葬》，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考古文集》第 5 辑，科学出版社，2013 年，280 页。

¹⁴⁵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西夏六号陵》，科学出版社，2013 年，395 页。

¹⁴⁶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南宋临安府治与府学遗址》，文物出版社，2013 年，95 页。

¹⁴⁷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南宋临安府治与府学遗址》，88 页。

¹⁴⁸ 刘国强：《陕西旬阳出土的南宋窖藏器物刍议》，《文博》2014 年 4 期。

边框，光素无纹。据其形制及其在革带上的位置，可分为肘之前的三台、圆桃、辅弼、尾与肘之后的排方，共5类¹⁴⁹。

2010年10-12月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抢救发掘了明通城王朱英裕的家族墓地，其中M5推测是宝乐妃之墓，在其棺床中部即腰部位置清理出16件玉饰品，根据其形状和用途可分为长方形、委角长方形、长条形、圭形、半圭形，每件玉饰品背面均有小孔，部分还残留有疑似麻线之物，确定其为腰带¹⁵⁰。

《西安南郊明墓》考古报告介绍了市广电中心秦藩朱秉橘家族4座墓葬、翠竹园二期狄普家族20座墓葬、曲江澜山秦藩上洛县主墓、曲江观邸郭涑世夫妻合葬墓等，其中西安南郊M14是明宗室辅国将军朱秉橘与夫人王氏的合葬墓，由长斜坡墓道、砖封门、砖砌门楼、竖穴土坑砖券墓组成，出土随葬品有玉带片16件，玉质皆是青玉，正背面抛光，器表光滑，内外平整。部分玉带片背面有二至四个象鼻串¹⁵¹。

湖北丹江口市配合南水北调的考古工作中发掘了均县镇黄家槽村雷陂墓地，清理晋代墓葬10座、明清时期墓葬16座、明清时期灰坑3座。明清墓葬16座，均为土坑墓，不见封堆，明墓M5出土玉饰1件，圆形圆孔，乳白色，直径0.9、厚0.15厘米¹⁵²。

宜昌博物馆曾先后两次对白马墓地进行发掘，共清理汉墓5座、宋墓3座、明清墓213座。明清墓213座，墓葬依山而建，土坑墓202座，土圜墓11座。有137座明清墓随葬205件器物，明清墓葬M18出土玉器1对（2件），出土于墓主手腕处，基本完整，圆环形，白玉¹⁵³。

近年，天津蓟县上宝塔明清墓地经过考古发掘，共发掘明清墓葬18座，水井4口，出土完整或可复原陶器、铜器、铁器、金银器、瓷器等数十件（组），以及铜钱数百枚。其中M16为双人合葬墓。墓圜平面呈不规则形，出土随葬器物7件，其中陶罐2件、铜发簪1枚、玉璧1件、板瓦3块。玉璧为白玉，玉质质密，正面中间厚边缘薄，背面为平面，素面¹⁵⁴。

天津蓟县上宝塔清代墓地共发掘清代墓葬119座，均为竖穴土坑墓，其中发现人骨的墓葬106座，夫妻合葬居多，葬具多为木棺，腐朽较严重，瓮棺仅1处。出土随葬品包括灰陶罐、带流夹砂罐、双系及四系酱油罐、瓷碗、银（铜）簪、耳环、玉佩、铜帽饰、铜扣、明、清时期钱币等。墓葬中常见头枕板瓦或胸压朱砂符咒板瓦，部分板瓦上的朱砂符咒及文字清晰可辨。其中M303出土玉坠1件，水滴状，上端有孔。M303出土黑色和红色料珠各1枚，玉佩1件，饼状，椭圆形，直径2.4-3、厚0.6厘米¹⁵⁵。

¹⁴⁹ 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白马村明代仇成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9期。

¹⁵⁰ 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明通城王朱英家族墓地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4年6期。

¹⁵¹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明墓》，三秦出版社，2013年。

¹⁵²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丹江口雷陂墓地晋、明清墓葬发掘简报》，湖北省文物局、湖北省移民局、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有限责任公司编著《湖北南水北调工程考古报告集·第II卷》，2013年，163页。

¹⁵³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奉节白马墓地》，科学出版社，2013年，299页。

¹⁵⁴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蓟县文物保管所：《蓟县上宝塔明清墓地发掘报告》，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著《天津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13年，154-156页。

¹⁵⁵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蓟县文物保管所：《蓟县上宝塔清代墓地发掘报告》，《天津考古（二）》，301-302页。

广西灵川县迪塘村发掘清代古墓一座，墓顶距地面约 0.4 米，墓室长 3.3、宽 1.5、深 1.5 米，券拱青砖室墓。清墓出土古尸 1 具，29 件纺织品，1 件玉镯。玉镯直径 7.5 厘米，镯体圆径 3.1 厘米，清亮圆润。莫志东根据墓葬形制、古尸特征和出土文物推测迪塘村清代古墓为清乾隆至嘉庆时期，墓主人极有可能是广西迪塘村李氏第 14 代传人，南明兵部左侍郎兼都御史李膺品的曾孙李粤正¹⁵⁶。

蒋廷瑜撰文介绍了 1975 年天等县龙茗镇进宁大队百禄小学清代赵焜夫妇合葬墓的发现和经过、尸体包裹和衣着、搜集的遗物、尸体保存原因、赵焜相关情况。男墓出土遗物有纸质木板印刷乾隆七年“酆都山冥途路引”1 张、帽顶饰 1 件、香囊 1 只、银箔乌龟 2 只、粗制银箔乌龟 8 只、银箔饰 2 只、银泡纽扣 30 只、镶玛瑙带钩 1 件、玛瑙纽扣 2 只¹⁵⁷。

5. 不同年代玉器皆有的考古发现

《襄阳黄家村》对襄阳市黄家村发掘的 420 座墓葬进行介绍，其中东周墓 4 座，均为竖穴土坑墓，共出土随葬器物 20 件，全部小件玉器均置于棺内头骨部分，陶器置于棺外一侧。M130 随葬玉牌、玉玦，M146 随葬玉戈、玉玦，M170 随葬玉琰 11 枚¹⁵⁸。秦墓 26 座，出土随葬器物 99 件，M343 出土玉琰 1 件，青灰色，小颗粒状¹⁵⁹。汉墓 66 座，出土随葬器物 915 件，其中 M95 随葬一串玉珠 357 颗，奶白或淡绿色，半透明，弧缘，中部有穿孔，单颗直径 0.49、厚 0.51 厘米¹⁶⁰。南朝隋唐墓葬 249 座，其中单室墓 220 座，双室墓 26 组，三室墓 3 座。随葬器物以陶瓷器为主，还有硬陶器、铜器（铜钱币）、玉石器、银器、骨器、漆器，M279:2 出土泥质灰陶墓志 1 件。M258 出土玉钗 1 件，残，整体呈“U”形，较短，后部弯折成直角状，双股较短细¹⁶¹。

2006 年，金陂墓群发掘了 79 座墓葬，东周墓 6 座、秦墓 5 座、西汉墓 5 座、唐墓 37 座、清墓 26 座。其中东周墓 M79 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随葬器物 24 件，其中陶敦、壶、盘、匱放置于墓室北端，陶鼎和鹿角放置于墓室东侧，玛瑙环、料珠、料管等放置于墓室西北部¹⁶²。清墓 M71 出土玉指环一件，乳白色羊脂玉，正圆形，截面扁壶状，直径 2.4 厘米¹⁶³。

2008 年，金陂墓群发掘了 54 座墓葬，除 M57 时代不明，余下的 53 座墓葬，按其时代分为东周、秦、西汉、明、清五个时期。汉墓 M115 出土 1 件玉璧，残，青色，素面，直径 2.4 厘米¹⁶⁴。明墓 14 座，均为长方形小型竖穴土坑墓，一般在墓主头向一端的坑壁上设有壁龛，壁龛内放置随葬器物。出土随葬器物 119 件，以铜钱、瓷器和釉陶器为主，少量陶器、石器、银器和玉器。其中玉璧 2 件，出

¹⁵⁶ 莫志东：《广西灵川县迪塘村清代古墓简报》，《广西考古文集》第 5 辑，285-298 页。

¹⁵⁷ 蒋廷瑜：《天等清代赵焜墓的发现和经过》，《广西考古文集》第 5 辑，316-317 页。

¹⁵⁸ 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阳黄家村》，科学出版社，2013 年，249-254 页。

¹⁵⁹ 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阳黄家村》，305 页。

¹⁶⁰ 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阳黄家村》，375 页。

¹⁶¹ 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阳黄家村》，499 页。

¹⁶² 荆州博物馆：《湖北省丹江口金陂墓群的发掘》，湖北省文物局、湖北省移民局、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有限责任公司编著《湖北南水北调工程考古报告集·第 I 卷》，科学出版社，2013 年，71、75 页。

¹⁶³ 荆州博物馆：《湖北省丹江口金陂墓群 2006 年清墓发掘简报》，《湖北南水北调工程考古报告集·第 I 卷》，172-173 页。

¹⁶⁴ 荆州博物馆：《湖北省丹江口金陂墓群 2008 年发掘报告》，《湖北南水北调工程考古报告集·第 I 卷》，125 页。

土于 M122 和 M163¹⁶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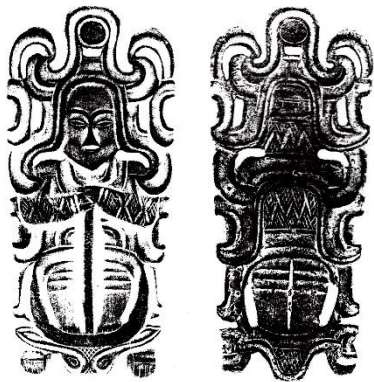
章丘女郎山墓地发掘墓葬 400 余座，其中宋墓 M92 为土坑洞室墓，方向 185°，墓室内有葬具一棺，葬式为仰身直肢葬，随葬瓷罐 1 件、玉簪 3 件、铜钗 1 件。玉簪，断面为扁圆形，簪首折成弧形，长 9.5 厘米¹⁶⁶。明墓 M46 随葬玉簪 3 件，放置于头骨顶部；瓷罐 1 件，放置于头骨左侧；铜钱 33 枚，放置于人骨下部；瓷碟 1 件，置于人骨腰部¹⁶⁷。清墓 M151 为竖穴土坑墓，随葬瓷罐、瓷碗、瓷灯各 1 件，置于墓主下肢骨外侧；铜扣 3 件、铜钱 1 枚，置于墓主胸部；铜簪 1 件、玉饰 1 件，置于墓主头骨两侧¹⁶⁸。

2006-2008 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萨恩萨伊墓地进行考古发掘，三个年度共计发掘墓葬 182 座，其中 21 座为无墓室墓葬，实际发掘墓葬 161 座，共出土陶器 70 余件，铜、石、骨各类生产生活用具及装饰品近 800 余件。通过大量的墓葬和丰富的遗物资料确定该墓地是一处上至青铜时代，下至汉唐时期，文化面貌复杂、延续时代较长的文化遗存¹⁶⁹。其中汉晋时期的墓葬 32 座，隋唐时期的墓葬 11 座，宋元时期的墓葬 17 座¹⁷⁰。出土的随葬品有陶器、铜器、骨器、石器、装饰品等，其中随葬绿松石珠 7 粒、玛瑙珠 2 粒，玉粒 5 粒，料珠 20 粒，共计 34 件¹⁷¹。

二 相关论著

1. 研究论文

巩文对仰韶文化遗址和墓葬出土的石、陶、玉、绿松石、角、牙、蚌等材质的坠饰进行考古学考察，并尝试对其功能、制作工艺及渊源做初步探讨¹⁷²。



图一三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型玉雕人兽像

针对孙守道提出的“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型玉雕人兽像是红山文化作品”的观点¹⁷³，朱乃诚从形制和主体纹饰进行考察，推定在牛河梁遗址群中没有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玉雕人兽像（图一三）同类题材的玉器及其他器物，就连玉雕人兽像上的一些主题纹饰，也不见于发掘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群中，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型玉雕人兽像应是距今 4000-3400 年间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作品，并进而推测这件玉雕人兽像所反映的人兽主题，是一位勇士使用带刃的

¹⁶⁵ 荆州博物馆：《湖北省丹江口金陂墓群 2008 年发掘报告》，134 页。

¹⁶⁶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章丘女郎山》，科学出版社，2013 年，200-201 页。

¹⁶⁷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章丘女郎山》，369-371 页。

¹⁶⁸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章丘女郎山》，522-524 页。

¹⁶⁹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萨恩萨伊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 年，5 页。

¹⁷⁰ 参考《萨恩萨伊墓地墓葬统计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萨恩萨伊墓地》，180-194 页。

¹⁷¹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萨恩萨伊墓地》，15 页。

¹⁷² 巩文：《仰韶文化坠饰述论》，《中原文物》2014 年 5 期。

¹⁷³ 孙守道：《红山文化玉祖神考》，《中国文物世界》159 期。

杖状武器搏杀一头水牛，或可能表现当时社会的某种仪式场景¹⁷⁴。

蒋卫东通过对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的 19 件斜口筒形玉器的出土地点、形制特征进行研究，认为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的斜口筒形玉器很可能是对蚕等昆虫蛹体躯壳的抽象表现，寄托了红山文化先民希望借助此类器物通过蜕壳羽化再次获取生命的期盼，它与凌家滩玉龟形器应是两类取象与功能迥然不同的动物形玉器¹⁷⁵。

张忠培对“玉魂玉魄——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展”展出的玉器所属单位的年代与其考古学文化属性进行讨论，将其分为属于龙山时代者；龙山之后、夏二里头文化之前的夏时期者；属于二里头文化之夏时期者¹⁷⁶。

张昌平对玫茵堂收藏的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爵和绿松石牌饰进行介绍，并将其与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进行比较研究¹⁷⁷。

偃师商城博物馆藏绿松石动物饰件通常被当作夏代玉器，乔梁根据已有考古出土材料认为此类饰件并未见于明确的夏商时期遗存之中，却在汉至南北朝时期十分多见，应当是作为装饰的串饰来使用的。饰件表现的题材以虎或狮以及所谓的辟邪较为常见，故称之为瑞兽可能更接近实际¹⁷⁸。

刘万军依据《浚县辛村》报告，对比研究 20 世纪三十年代在河南浚县辛村发掘的西周卫国贵族墓地出土的 38 件组玉器，多为玉佩，说明卫国贵族秉持君子无故玉不离身的传统。认为卫国西周大型墓 M1 出土的玉器绝大多数为商代遗物，与《逸周书·世俘》等历史文献中关于武王伐商缴获大量商代玉器并将这些玉器赐给各级贵族的记载是相吻合的¹⁷⁹。

徐汝聪《楚鞞》一文对商、西周、东周及楚墓中所见鞞进行梳理，就鞞的种类而言则有玉石、青铜、金、骨等多种材质，并研究鞞及鞞串饰的使用方法¹⁸⁰。

鹏宇对河南永城僖山二号汉墓出土金缕玉衣所用玉衣片进行研究，认为这些玉衣片是古代祭祀所用的玉人（偶人）改造而成。其中 6 枚玉衣片上雕刻的人面纹和网状纹分别代表玉人的面部及腰带。推测梁国国力的极其衰弱是僖山二号墓将偶人改造为金缕玉衣片的原因¹⁸¹。

姜舜源对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清代碧玉“皇帝之宝”（图一四）和“大清受命之宝”进行研究，梳理了国博所藏顺治、康熙“皇帝之宝”所用的诏诰¹⁸²。

¹⁷⁴ 朱乃诚：《故宫博物院藏大型玉雕人兽像考略》，《文物》2014 年 7 期。

¹⁷⁵ 蒋卫东：《斜口筒形玉器非龟壳说》，《文物》2014 年 8 期。

¹⁷⁶ 张忠培：《〈玉魂玉魄——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展〉引起的几点思考：在中华玉文化中心第四届年会闭幕式的讲话》，《南方文物》2014 年 3 期。

¹⁷⁷ 张昌平：《玫茵堂收藏的二里头文化青铜器》，《南方文物》2014 年 3 期。

¹⁷⁸ 乔梁：《偃师商城博物馆藏绿松石瑞兽的年代及相关问题研究》，《华夏考古》2014 年 4 期。

¹⁷⁹ 刘万军：《浚县辛村卫国墓出土玉器研究》，《文博》2014 年 5 期。

¹⁸⁰ 徐汝聪：《楚鞞》，《江汉考古》2014 年 5 期。

¹⁸¹ 鹏宇：《河南永城僖山二号汉墓人面纹玉衣片浅析》，《华夏考古》2014 年 4 期。

¹⁸² 姜舜源：《国博藏清“皇帝之宝”考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 年 9 期。



图一四 国博藏清代“皇帝之宝”

高原《浅论古代改制玉器》一文主要以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出土的改制玉器为讨论对象，分析改制器物再加工的痕迹，进而得出改制器物再加工的演变过程，引起人们对改制玉器的关注，研究改制工艺及其背后蕴含的理念¹⁸³。

2. 展览图录（以展览所在省份拼音为序）

《江淮撷珍》是安徽博物院馆藏特色展“江淮撷珍”的图录，按照金银器、玉石器、铁器、竹木牙角 5 个部分著录，展品囊括安徽博物院及巢湖、蚌埠、怀远、东至等地市博物馆、文管所收藏的 50 余件文物珍品，时代以宋元明清的器物为主。其中玉器部分有 1956 年安庆市棋盘山元代尚书右丞范文虎夫妇墓出土的虎纽玉押、心形活环玉坠、贯耳玉瓶；1970 年长丰县下塘集余氏墓出土的花生蜜枣莲子玛瑙配件；蚌埠市博物馆藏龙纹玉带扣；安徽文物商店购买的花卉凤头纹玉带钩、雁纹玉镶件；安徽文物总店藏海东青攫天鹅玉饰件¹⁸⁴。

《皖西博物馆文物撷珍》选取 198 件（组）六安皖西博物馆藏的最具地域特色的器物，涵盖从商代至近现代文物，其中青铜类 103 件（组），陶瓷类 59 件（组）、玉器类 11 件（组）、金银器类 19 件（组），近现代类 6 件。玉器部分介绍六安市双河谢郢王大岗出土的商代玉璜；舒城县河口春秋墓出土的玉玦、玛瑙瑗；六安市经济开发区汉墓 M96 出土的谷纹玉璧，汉墓 M97 出土谷纹玉环、玉珮，汉墓 M99 出土的玉璫；清代玉带钩、玉簪等¹⁸⁵。

《异世同调：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地出土文物》是配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历史博物馆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举办的“异世同调”展览所做的图录，选取陕西蓝田家族墓园出土精美的耀州窑、景德镇湖田窑、建窑和定窑瓷器，铜器，石器，瓦器，铁器等文物予以著录，这些器物有的反映吕氏在尚古观念影响下收藏的古代文物和仿古器物，反映宋朝人的丧葬观念，雅致生活的文房、香具等物品为了解宋朝人的生活提供材料。其中书中介绍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的战国神谷纹玉璧（68、69 页），北宋玉带鈔（203 页）¹⁸⁶。

《阳关·阳关博物馆文物图录》一书对阳关地区的汉晋烽燧遗址、唐寿昌城遗址、汉唐山水沟墓

¹⁸³ 高原：《浅论古代改制玉器》，《文物春秋》2014 年 6 期。

¹⁸⁴ 安徽博物院：《江淮撷珍》，文物出版社，2013 年，34-47 页。

¹⁸⁵ 皖西博物馆：《皖西博物馆文物撷珍》，文物出版社，2013 年，168-173 页。

¹⁸⁶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异世同调：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地出土文物》，中华书局，2013 年。

群等田野文物和阳关博物馆馆藏文物进行介绍。馆藏文物部分介绍了新石器时代玉戈（74页）、齐家文化玉璧（234、235、236页）、青铜时代玉钺（44页）、玉短剑（134页）等¹⁸⁷。

《百色文物珍品》精选百色古代文物、近代文物和民族文物共170多件（套），种类有石器、骨器、玉器、铜器、铁器、锡器、陶瓷器、民族文物等，以期充分地体现百色各历史时期的文明发展和文化内涵。其中玉器部分主要介绍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收藏，西林县出土的玛瑙珠串、玛瑙扣、谷纹玉玦、玛瑙环、玉管等，清代的玉器则有西林县博物馆藏的翡翠玉佩和右江民族博物馆收藏的水晶顶冠¹⁸⁸。

《黄金草原：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文物》是湖北省博物馆与内蒙古博物院举办的专题文物展览图录，选取内蒙古博物院馆藏的176件（套）文物，按“东胡与山戎”、“匈奴”、“鲜卑”、“契丹”、“蒙元时期的蒙古族”、“明清至今的蒙古族”六部分进行安排，展现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历史进程。本书介绍的玉器有内蒙古博物院藏夏家店文化的玛瑙玦、绿松石项饰¹⁸⁹，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小坝子滩窖藏出土的镶嵌绿松石兽面金戒指¹⁹⁰，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捐赠的辽代双鱼坠、玉蚌饰¹⁹¹。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净州路故城出土的元代玉帽顶¹⁹²，内蒙古博物院藏的清代浮雕青玉福寿纹如意、玛瑙鼻烟壶、红宝石顶王公暖帽等¹⁹³。

《东山撷芳：江宁博物馆暨东晋历史文化博物馆馆藏精粹》收录江宁区博物馆藏品265件（套），按石器、石刻、砖瓦、玉器、陶器、瓷器、青铜器、铁器、金银器、漆木竹器、书法绘画、纸币进行著录，以三国两晋南朝的器物居多，以全彩图片为主，辅助以器物简要说明。玉器部分著录横溪街道小丹阳窑厂出土的汉代的玉璧，东山街道上坊社区下坊村砂石岩出土的三国吴时期玉带钩；东山街道竹山南麓出土元代鎏金孔雀石腰带；江宁博物院暨东晋历史文化博物馆馆藏的明代白玉母子猴饰件、蟠螭纹玉带钩、清代白玉扳指和翡翠包金发簪；谷里街东善桥出土的清代翡翠扳指、翡翠玉镯和朝珠¹⁹⁴。

《故都神韵——南京市博物馆文物精华》选取南京市博物馆馆藏精品202件（套），依历史年代顺序，举凡化石、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瓷器、金银器、玻璃器、丝质织绣等皆一一收录，本书每件器物均有不同角度的清晰照片，并附有扼要的文字说明。其中新石器时代玉器有南京市浦口区晚期营盘山遗址出土的玉璜、龙形玉饰件；南京市江宁区陶吴咎庙遗址出土的兽面纹冠状玉饰件¹⁹⁵。1998年南京市栖霞区仙鹤观东晋太和元年（366年）高崧夫妇墓出土的玉组佩、鞞形玉佩；1998年南京市栖霞山仙鹤观M6东晋墓出土的玉组佩、鞞形玉佩、玉剑具、柿蒂纹玉柄饰等；1966年南京市下关区

¹⁸⁷ 纪永元，初世宾：《阳关·阳关博物馆文物图录》，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

¹⁸⁸ 黄霖珍主编：《百色文物珍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36-43页。

¹⁸⁹ 湖北省博物馆：《黄金草原：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文物》，文物出版社，2013年，25页。

¹⁹⁰ 湖北省博物馆：《黄金草原：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文物》，55页。

¹⁹¹ 湖北省博物馆：《黄金草原：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文物》，84-85页。

¹⁹² 湖北省博物馆：《黄金草原：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文物》，125页。

¹⁹³ 湖北省博物馆：《黄金草原：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文物》，131、132、134页。

¹⁹⁴ 江宁博物院、东晋历史文化博物馆编：《东山撷芳：江宁博物馆暨东晋历史文化博物馆馆藏精粹》，文物出版社，2013年，36-42页。

¹⁹⁵ 南京市博物馆：《故都神韵——南京市博物馆文物精华》，文物出版社，2013年，20-23页。

郭家山 M1 东晋墓出土的鞞形玉佩¹⁹⁶。1998 年南京市雨花台区花神庙 M1 南朝墓出土玉翁仲¹⁹⁷，2004 年南京市江宁区建中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 年）出土的“墨元”白玉印、牡丹纹玉梳、鹅形玉饰件、玛瑙璧、螭纹水晶璧¹⁹⁸，1988 年南京市溧水县南郊元墓出土的螭纹玉带饰¹⁹⁹，2002 年南京市江宁区上坊南宋墓 M2 出土的凤鸟纹水晶佩²⁰⁰，1974 年南京江宁区将军山明天启七年（1627 年）沐馥墓出土的秋葵花形玉碗、莲叶纹玉碗、双螭耳玉杯、渔翁戏荷琥珀杯、梅竹纹碧玉簪、乾纲独立白玉簪、嵌宝石镶玉金带板，1976 年南京市玄武区板仓村明徐达家族墓出土的嵌宝石镶玉金佩饰²⁰¹，1958 年征集的镶金座荷鹭形玉饰件²⁰²，1970 年南京市下关区张家洼明洪武四年汪兴祖墓出土的镶金托云龙纹玉带板²⁰³，1977 年南京市玄武区板仓村明正德十二年徐辅墓出土的秋葵纹玉带板²⁰⁴，1976 年南京市栖霞区唐家山明墓出土的洞石灵芝纹玉带板²⁰⁵，1959 年南京市江宁区东善桥韩家洼明墓出土的狮蛮纹玉带板等²⁰⁶。

《西夏遗珍》分为“太白猷猷”和“寻微探末”两部分，在第一部分，将刘亚谏、李肇伦、陈震三人收藏的西夏文物艺术品（现陈列在万宝博物馆）进行整理研究，种类丰富，包括纸本书画、木板彩绘、精巧铜器、金银宝器、佛陀造像、木雕艺术、玉石刻简、陶瓷器、石雕、唐卡遗珍、锦帛绘画等。将大量珍贵文物首次公之于众，如带有具体纪年及铭文的皇家密档、皇家寺院的佛塔、佛像，精美的高等级金棺、银棺、金函、金瓶；有 1.3 米长的银质经卷，2.6 米长的西夏文帛画，目前已知的现存国内最大幅木板画，目前所知唯一的纸本打铁图等等²⁰⁷。其中玉石刻简介绍西夏文青白玉牌组玉带、玉册（图一五，案：或是帝陵随葬之玉哀册）、玉腰带、碧玉棺等²⁰⁸。



¹⁹⁶ 南京市博物馆：《故都神韵—南京市博物馆文物精华》，69-73 页。

¹⁹⁷ 南京市博物馆：《故都神韵—南京市博物馆文物精华》，86 页。

¹⁹⁸ 南京市博物馆：《故都神韵—南京市博物馆文物精华》，126-131 页。

¹⁹⁹ 南京市博物馆：《故都神韵—南京市博物馆文物精华》，131 页。

²⁰⁰ 南京市博物馆：《故都神韵—南京市博物馆文物精华》，133 页。

²⁰¹ 南京市博物馆：《故都神韵—南京市博物馆文物精华》，213 页。

²⁰² 南京市博物馆：《故都神韵—南京市博物馆文物精华》，215 页。

²⁰³ 南京市博物馆：《故都神韵—南京市博物馆文物精华》，218 页。

²⁰⁴ 南京市博物馆：《故都神韵—南京市博物馆文物精华》，220 页。

²⁰⁵ 南京市博物馆：《故都神韵—南京市博物馆文物精华》，221 页。

²⁰⁶ 南京市博物馆：《故都神韵—南京市博物馆文物精华》，222-223 页。

²⁰⁷ 阎正《序》，陈震、刘亚谏、李肇伦：《西夏遗珍》，文物出版社，2013 年，1 页。

²⁰⁸ 陈震、刘亚谏、李肇伦：《西夏遗珍》，116-121 页。

图一五 万宝博物馆展出玉册

《金锡璆琳：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文物》主要介绍陕西历史博物馆征集的蓝田吕氏家族墓地出土的瓷器、青铜器、青铜镜、玉石器等文物，并附录相关学者对吕氏家族、墓地及出土器物，宋代古器物学等方面的相关研究。在图录中介绍西汉的谷纹青玉璧、北宋素面玉带铐和北宋汉白玉耳杯²⁰⁹。

《天府韶宝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60 年出土文物选粹》一书按史前时期、商周时期、秦汉至南北朝、唐宋时期、元明清时期，选择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60 年出土的部分文物加以介绍，展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工作和科研成果。其中商周部分介绍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璋、玉戈、螺旋状玉器和山东东岳庙出土遗址出土的玉矛²¹⁰。秦汉至南北朝部分则介绍 1995 年广汉二龙岗墓地出土的玉璧、玉珉²¹¹。唐宋时期对 1996 年华蓑安丙家族墓出土的童子玉坠进行描述²¹²。

《耀世奇珍：馆藏文物精品陈列》从天津博物馆馆藏书画、瓷器、玉器、青铜器以及工艺杂项类文物中精选 63 件较具代表性的精品，其中书画 15 件，瓷器 19 件，玉器 11 件，青铜器 4 件，工艺杂项 14 件，年代跨度从红山文化至明清时期²¹³。

《哈密文物精粹》一书对哈密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文物遗址和哈密博物馆的馆藏精品予以呈现，将其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汉唐时期、宋元明清时期，其中汉唐时期主要介绍了汉唐遗物、纳职县城与伊吾军城、佛教遗址群、突厥石人与征战岩画，宋元明清部分则主要围绕哈密遗宝、古道烽燧、巴里坤汉城和满城、清代庙宇、哈密王府与王陵、盖斯麻扎、巴里坤汉式民居展开。书中对文物遗址和每一件文物精品做详细描述，内容丰富，为新疆史前历史和哈密地方史研究提供重要参考资料²¹⁴。书中介绍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青铜时代绿松石、玛瑙珠项饰²¹⁵；哈密焉布拉克墓地出土的早期铁器时代玛瑙串珠²¹⁶；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东黑沟墓地出土的西汉前期玛瑙项饰、串饰²¹⁷；哈密市征集的清代碧玉手镯等²¹⁸。

3. 其它

林欢《宋代古器物学笔记材料辑录》一书对宋人笔记中有关古器物的记述，进行整理，集中归纳，分为铜篇、陶篇、泉币篇、玺印篇、玉篇、竹木篇、石刻篇、墓葬遗址篇、仿制篇、杂篇等，把分散于宋代笔记中的金石古器物发现和研究成果汇为一书²¹⁹。其中玉篇部分将《演繁露》、《续博物志》、《云烟过眼录》、《嫩真子》、《纬略》、《志雅堂杂钞》、《邵氏闻见后录》、《家世旧闻》、《游宦纪闻》、《铁围

²⁰⁹ 程旭编：《金锡璆琳：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文物》，三秦出版社，2013 年，76-82 页。

²¹⁰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天府韶宝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60 年出土文物选粹》，文物出版社，2013 年，49-53 页。

²¹¹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天府韶宝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60 年出土文物选粹》，124-125 页。

²¹²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天府韶宝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60 年出土文物选粹》，178 页。

²¹³ 天津博物馆：《耀世奇珍：馆藏文物精品陈列》，文物出版社，2013 年。

²¹⁴ 参考李秋瑾《序》，哈密博物馆：《哈密文物精粹》，科学出版社，2013 年，2 页。

²¹⁵ 哈密博物馆：《哈密文物精粹》，30-31 页。

²¹⁶ 哈密博物馆：《哈密文物精粹》，141 页。

²¹⁷ 哈密博物馆：《哈密文物精粹》，190-191 页。

²¹⁸ 哈密博物馆：《哈密文物精粹》，276 页。

²¹⁹ 王宇信《序》，林欢：《宋代古器物学笔记材料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1-4 页。

山丛谈》、《王氏谈录》、《云麓漫钞》等宋人笔记中有关玉器部分予以摘录²²⁰。

《湖湘出土玉器研究》对湖南考古出土玉器按照新石器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至清代进行介绍，研究各个时段的玉器种类、用途、来源及特点、造型与工艺。最后对湖南宁乡商代玉珪、仿玉风格的玻璃器和仿玉风格的滑石器进行讨论²²¹。

²²⁰ 林欢：《宋代古器物学笔记材料辑录》，95-101页。

²²¹ 喻燕姣：《湖湘出土玉器研究》，岳麓书社，2013年。

玉器考古文献汇编（2015年1月—6月）

原载《玉器考古通讯》总第六期

刘思源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一 考古发现

1. 新石器时代

2014年7-10月，哈民遗址进行了第四次发掘，共清理房址13座，墓葬1座、灰坑4座，出土遗物包括陶、石、玉、骨、角等150余件。玉器仅1件，出土于墓葬之中²²²。

2014年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石峁遗址的韩家圪旦地点进行发掘。发现墓葬41座、房址42座、灰坑28座，出土陶、石、骨、玉等文物约300件²²³。

东山村遗址位于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东山村北。2008年和2009年，南京博物院对遗址进行两次抢救性发掘，揭示了一处崧泽文化时期的聚落。其中，M90是大型墓中规模较大，随葬品最为丰富的一座。绝对年代大体在距今5800年前后。M90出土遗物共计65件（套），其中玉器有璜、镯、玦、玉管、管型、扭形饰和三角形饰²²⁴。

张家港东山村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以马家浜和崧泽文化为主。该遗址马家浜文化遗存的年代为马家浜文化晚期，距今6300-6000年。遗址I区马家浜文化中M68出土玉管两件，两端对钻一孔。M68:1，半透明。近椭圆形。长轴1.8、短轴0.8、孔径0.2-0.6、长2.9厘米。M68:6，青绿色，有红褐色沁斑。近圆形。直径1.7、孔径0.4-0.6、长2.35厘米。II区马家浜文化中M97随葬品中有玉器。M101随葬品中有玉璜、玦及管21件，为东山村遗址史前墓葬中出土玉器最多的一座墓葬。M97出土玉璜、玦、簪、柄形玉饰各一件及长条形玉饰两件²²⁵。

东山村遗址崧泽文化绝对年代上限为距今5900年或稍早，下限为距今5200年前后。遗址I区崧泽文化遗存中共有墓葬22座，仅有三座随葬玉器。M1出土两件长条形玉饰，上部对钻一孔。M1:1，灰白色，有墨绿色沁斑。长2、最宽1、孔径0.2-0.35、最厚0.25厘米。M1:2墨绿色。微弯弧。长2.7、最宽0.7、厚0.35、孔径0.1-0.2厘米。遗址II区中崧泽文化F1出土玉玦两件，玉管一件（F1:14）。灰白色，略透明，表面琢磨光滑。横截面近似椭圆形，纵截面呈梯形，两端实心对钻一孔。直径0.6-1.4、孔径0.2-0.3、高1.5厘米。遗址III区崧泽文化中的十五座大型墓里随葬相当数量的玉器。M85出土玉璜、环各一件。M92中出土玉璜、玉镯、钥匙形玉饰及玉管，其中6件玉管出土在一起，可能为串饰。M93中随葬有玉璜、玉镯、玉环、镯形玉饰、勾形玉饰、钥匙形玉饰以及半圆形玉

²²² 党郁：《2014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发现综述》，《草原文物》2015年1期。

²²³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调查发掘新收获》，《考古与文物》2015年2期。

²²⁴ 周润垦等：《江苏张家港市东山村遗址崧泽文化墓葬M90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3期。

²²⁵ 胡颖芳等：《张家港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5年1期。

饰。M98中共出土随葬玉器8件，主要放置在墓主头部及上方、左侧上肢骨。分别为玉璜、玉镯、三角形玉饰、带柄钺形玉饰以及玉管²²⁶。

2002年11月-2003年1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湛江市博物馆及遂溪县博物馆对鲤鱼墩遗址进行正式发掘。文化遗存可分为四期，其年代上限为距今约8000年以上，下限为距今 4660 ± 100 年。第四期出土玉钺1件(T0702②:16)。深墨绿色。梯形。下部残。残长5.1、宽3.2、厚1.2厘米²²⁷。

《舞阳贾湖(二)》中详细记述了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遗址2001年第七次发掘的资料。同时还开展了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等一系列科学研究。为距今9000-7500年间中原地区和淮河流域人类生存策略及环境背景、聚落形态、人口交流、思想文化等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了资料和研究案例。此次发掘共出土23件玉器，其中有玉璜1件。标本T44②:1，半圆形，似岫玉，经打磨抛光处理，两端均经5次穿孔，似经长期反复作佩饰使用。最大外径42.07、内径16.72、内宽12.31、内厚5.75毫米²²⁸(图一)。



图一 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玉璜

2. 商周

2014年4-12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林格尔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和内蒙古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共同对和林格尔县法院等工程建设区域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其中战国墓葬随葬品有陶罐、钵、铜镜、贝壳、玉环等。

2012年底至2013年初，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郑州市黄河路109号院工程区遗址进行了发掘，清理殷墟时期小型墓葬43座。随葬品以陶器为主。玉器出土15件，多数出自腰坑内，包括玉柄形器、圭、匕及其他残物(无法看出器形)²²⁹。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荥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于2006年7-9月对小胡村墓地进行抢救性考古勘探和发掘。其中商代晚期墓葬M22中随葬玉璜1件。标本M22:11，白色。扁平弧形，一端有穿孔。长7.8、宽3.5、厚0.3、孔径0.4厘米。重17.2克²³⁰。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泾阳太平堡墓群进行发掘。墓葬一区、二区基本为西周中晚墓葬，少量墓葬

²²⁶ 胡颖芳等：《张家港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5年1期。

²²⁷ 黎飞艳等：《广东遂溪鲤鱼墩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5年7期。

²²⁸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二)》，科学出版社，2015年。

²²⁹ 吴倩等：《郑州黄河路109号院殷代墓葬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5年3期。

²³⁰ 贾连敏等：《河南荥阳小胡村墓地商代墓葬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5年1期。

随葬陶器、玉器、铜器²³¹。

2010年10月-2011年1月，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对南水北调干渠占压部分进行了考古钻探与发掘，发现了两周、汉唐及清代多个时期遗存，其中以西周晚期遗存最为丰富。其中西周文化遗物中包含玉玦2件。标本M25:1，白色。圆形，有缺有孔。素面。直径2.8、孔径0.8、厚0.4厘米²³²。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于2014年对虫坪塬墓地北区进行发掘，清理墓葬23座。车马坑1座、灰坑（沟）遗迹5处。出土遗物有铜器、玉器、陶器、泥质明器、玛瑙等100余件（组）²³³。

范家村墓地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东部、范家村以南。2012年3-9月进行抢救性发掘。共发掘2座大型墓（M4、M5）和4座小型墓（M257、M270、M275、M670），这6座墓葬的年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除M4随葬品被盗掘外，其他5座墓葬均保存完好，出土铜器、陶器、铁器、玉器、石器。其中玉器31件（组）。器型有璧、佩、璜、人、覆面、腰带、鞋底、剑首、剑格、剑铍等。范家村墓葬中大量玉器随葬，且制作精美，为同类墓少见，为山东地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丧葬用玉制度的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²³⁴。

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州文保中心等单位对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曹门湾墓区进行了发掘，共清理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墓葬29座，规模最大的为M1，其余中、小型墓葬有序分布于M1的西侧、南侧。M1棺底清理出较多玉人（图二左）、玉虎、玉腰带饰以及玉组佩等，以小件为主，制作精美。玉饰多见凤鸟纹，玉人造型玉饰为人龙合体（图二右）。中型墓共22座，在棺内头部至胸部常随葬有玉器²³⁵。

2009年5月，襄阳市、谷城县两级公安部门破获了湖北谷城县尖角墓地被盗的系列案件，先后两次共追缴各类文物75件，其中玉、玛瑙器共13件。尖采:11，浅绿色，屈体龙形，单阴线内浅浮雕谷纹。长12、高9、厚0.7厘米（图三）。尖采:24，乳白色，半透明，剖面呈菱形。外径4.2、孔径2.8、厚0.8厘米²³⁶。



图二 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M1出土的玉人和玉饰



图三 谷城县尖角墓地出土玉器

广东省增城市白湖村浮扶岭遗址区域中M511规格最高，墓主人下葬年代不超过战国晚期，下限

²³¹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调查发掘新收获》，《考古与文物》2015年2期。

²³² 河南省文物局：《荥阳官庄遗址》，科学出版社，2015年。

²³³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调查发掘新收获》，《考古与文物》2015年2期。

²³⁴ 李东江等：《山东临淄范家村墓地2012年发掘简报》，《文物》2015年4期。

²³⁵ 方勤、胡刚：《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曹门湾墓区考古主要收获》，《江汉考古》2015年3期。

²³⁶ 周婷、梁超：《湖北谷城尖角墓地出土重要文物》，《江汉考古》2015年3月。

约到西汉南越国早期。该墓后室中部出土 2 件（套）。标本 M211:2, 共 7 件相对集中出土, 应为一组, 分别编号 A-G, 佩戴形式不详²³⁷。

2011 年 9 月,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随州市文峰塔发掘了一座残墓 M4。年代为春秋晚期偏早, 应为曾侯墓葬。出土随葬品 26 件, 其中玉器共 4 件, 见有玉璧、佩饰。璧 1 件 (M4:018)。残存整器的 1/8。两面阴刻云纹, 纹饰分组。玉呈乳白色, 有浅黄斑块。复原直径 8、残长 1、孔径 3.2-3.4、厚 0.5 厘米。刀形佩 1 件 (M4:014)。长方片状, 四边各有一长条形小豁口, 中部有两个并排的单面钻小圆孔。一端有单面刃, 刃部有缺口和使用痕迹。推测此器为改制件。玉呈墨绿色, 受沁严重。长 2.2、宽 1.8、厚 0.3 厘米²³⁸。

2003 年 10 月至次年 9 月,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所、凤翔县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凤翔县长青镇孙家南头村西一带, 对占地约 70 万平方米范围内的古墓葬和古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此次发现周、秦以及汉代以后各时期墓葬和车马坑 191 座, 其中先周与西周墓葬 35 座, 春秋秦墓和车马坑 91 座, 宋元时期墓葬 9 座, 以及未被发掘的近代墓葬 56 座, 另外, 还发掘出西汉时期汧河码头大型仓储建筑遗址。在周墓和秦墓中均有玉器出土, 但数量不多²³⁹。

3. 秦汉至隋唐

2013 年 3 月 7 日至 3 月 31 日,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清理张家堡村汉代墓葬 42 座。时代自西汉早期至中晚期, 推测应为一处汉长安城内居民墓地。墓中随葬品有陶器、铜器、铁器、玉器等。其中玉器有 2 件, 分别为玉剑璫和玉璧²⁴⁰。

2005 年 4-6 月, 昭通市文物管理所对水富县张滩土坑墓群进行抢救性发掘。本次发掘墓葬 16 座, 时代约为西汉早期。其中仅 M21 和 M16 出土玉器。标本 M16:4, 玉管 1 件, 圆柱形, 中空。通高 2.4、宽 0.6、孔径 0.1 厘米²⁴¹。

2013 年洛阳市孟津县平乐镇朱仓村东发现一座东汉末期砖室墓。出土器物按质地分为陶、铜、铁、铅、玉石料器。其中玉石残料出土于该墓东棺内, 共 1 组, 3 块, 这在洛阳地区以往的考古发掘中较为罕见。发掘者认为可能与“五石”镇墓的道教习俗有关²⁴²。

2012 年 6-8 月和 2013 年 7-9 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 联合曲靖市和陆良县文物管理部分对薛官堡墓地先后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大部分墓葬为汉或汉代以前。随葬品主要有铜器、铁器、陶器、玉石器、玻璃器、漆木器等。其中 M38 出土绿松石扣 2 件、玛瑙珠 2 件、玻璃珠 5 件。M80 中出土玉玦 1 件²⁴³。

2012 年 8 月,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赫章县文物局对 M373、M374 两座汉墓进行发掘。两墓

²³⁷ 张强禄:《广东增城浮扶岭 M511 发掘简报》,《文物》2015 年 7 期。

²³⁸ 曾令斌等:《湖北随州文峰塔墓地 M4 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5 年 1 期。

²³⁹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凤翔孙家南头墓地周秦墓葬与西汉仓储建筑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5 年。

²⁴⁰ 王自力等:《西安张家堡村汉墓群》,《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 年 4 期。

²⁴¹ 刘春城等:《云南昭通水富张滩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5 年 9 期。

²⁴² 张鸿亮等:《洛阳孟津朱仓东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15 年 4 期。

²⁴³ 杨勇等:《云南陆良县薛官堡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15 年 4 期。

中均出绿松石和孔雀石珠，其中 M373 内出土数量达数千颗，主要分布于墓主的胸部位置。M373 出土玛瑙管 1 件(M373:27)，红色。圆柱状，中间有一穿孔。长 2.4、直径 1.2、孔径 0.3 厘米²⁴⁴。

1992 年 9 月至 10 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鄂尔多斯考古研究院和乌审旗文物管理所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纳林河乡郭家梁清理 4 座墓葬。这 4 座墓葬是北朝占领大夏国首都统万城后的遗存。在 M5 头下的脖子位置发现玉石珠子 2 颗，可能为项链的一部分²⁴⁵。

土城子墓地位于辽宁省朝阳县土城子村，1998 年村民发现并上报，朝阳县文物管理所赶赴现场，清理前燕时期墓葬两座（M1、M2）。共出土随葬品 26 件，其中有水晶球 1 件、绿松石坠 7 件²⁴⁶。

2014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青海省考古研究所在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哇沿水库淹没区进行考古工作。清理墓葬 25 座、房址 10 座、灰坑 14 座等遗迹。墓葬中遗物包含陶、石、木、骨、金、银、玛瑙、皮革等。墓葬主人应该是唐代吐蕃统治时期活动在该地区的吐蕃人或吐谷浑人²⁴⁷。

2012 年 8 月至 11 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上塔坡村发掘了一批汉代、隋唐以及宋元时期的墓葬，其中 48 号墓葬为唐代大理正荀曾之墓。该墓出土玉器 2 件，分别为玉猪和玉竹节²⁴⁸。

4. 辽宋至明清

2013 年 4 月，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宣化古城北的山麓下发现了一座被破坏的壁画墓。该墓葬年代为辽代晚期至金代中期。因早年被盗，仅在墓室填土中出土玉饰件 1 件。椭圆形环，一面平，另一面略鼓，似带饰。色泽纯白，玉质细腻，光泽度高。长 3、宽 2、厚 0.3 厘米，孔长 1.7、宽 0.5 厘米²⁴⁹。

2009 年 10 月，淄博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周村区文物管理所联合对周村区汇龙湖工程建设用地进行考古发掘，共发掘明代墓葬 11 座，除一座为土坑墓外，其余皆为阶梯墓道土洞墓，共出土瓷器、木器、铜镜等器物 90 余件。其中包括玉串饰 1 套 4 枚。M3:1，青色 2 枚，直径 1、厚 0.3 厘米。白色 2 枚，直径 0.9、厚 0.28 厘米²⁵⁰（图四）。



图四 周村汇龙湖明代墓地出土玉串饰

2012 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长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对位于长兴县石泉村小黄山北坡的明代

²⁴⁴ 吴小华等：《贵州赫章县可乐墓地两座汉代墓葬的发掘》，《考古》2015 年 2 期。

²⁴⁵ 李少兵等：《内蒙古乌审旗郭家梁村北朝墓葬发掘报告》，《华夏考古》2015 年 2 期。

²⁴⁶ 杜守昌等：《辽宁省朝阳县土城子两座前燕墓》，《北方文物》2015 年 2 期。

²⁴⁷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4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调查发掘新收获》，《考古与文物》2015 年 2 期。

²⁴⁸ 张小丽等：《唐代大理正荀曾墓发掘简报》，《文博》2015 年 1 期。

²⁴⁹ 刘海文等：《河北张家口宣化辽金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5 年 3 期。

²⁵⁰ 张光明等：《山东淄博周村汇龙湖明代墓地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 年 2 期。

墓进行发掘，共清理 3 座墓葬。在 M1 中出土玉锥形器 1 件（M1:1）。乳白色，略泛黄，表面光滑。一端呈圆锥形，一端呈四棱尖状。长 5.3 厘米²⁵¹。

大报恩寺遗址位于江苏省南京市主城正南门外的古长干里地区。2007 年 2 月至 2010 年底，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对遗址北区进行发掘。在地宫中出土大量供养品，其中有玉器 2 件，为玉碗和玉环²⁵²。

2013 年 4 月，贵州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新蒲村杨氏 3 座宋明时期“土司”墓葬（M1、M2、M3）进行清理。墓地位于洪江河畔的坡地上。其中于 M2 杨锵夫妇墓中出土骑马俑、香炉、铜镜残片、玉叶和料珠等，共 52 件（套）²⁵³。

二 相关论著

1. 研究论文

李新伟在《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往网的形成》中通过红山和凌家滩在玉器上的相似性以及玉筒形器、玉钺在不同地区大型墓葬中均出土，来论述公元前 3500 年中国形成了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同时作者也提出了这种交流网的两个特征²⁵⁴。

何弩在《关于崧泽文化商品经济的思考》中，通过对崧泽文化时期的玉石小商品经济、犁耕与集约化农业商品粮生产、环权以及陶筹出现等现象的分析，认为崧泽文化圈及其商品经济贸易圈为手工业和商业精英成为社会上层提供了路径，引发了社会的等级分化，使得长江流域的社会复杂化开始于崧泽文化时期，明显早于其他地区²⁵⁵。

王荣、吴在君通过对出土的玉器修复痕迹进行研判和梳理，得出中国古代玉器主要采用了常规修整、连缀修复、补配修复以及改制（型）修复等四种修复方式。在此基础上，从古代玉器修复方式的选择、美观性、稳定性等方面对修复工艺的发展过程进行论述²⁵⁶。

方向明在《聚落变迁和统一信仰的形成：从崧泽到良渚》一文中认为，在崧泽文化晚期，集群发生大规模移动，由于资源优势，最终选定良渚遗址群所在地作为发展基地。良渚文化时期琮、璧、钺和人兽面像的形成过程就是原始宗教信仰的形成过程。崧泽文化时期祭器和礼器的形式丰富多样，而良渚文化时期琢玉工艺则形成了固定和僵化的格式，作为身份地位的标识和神秘主义的表达。这些变化预示社会变革的来临，随着资源的枯竭、艺术创造力的消息甚至迷失以及外部因素的冲击，良渚文化降下了帷幕²⁵⁷。

蒋卫东认为崧泽之美主要指崧泽文化特别是崧泽文化晚期各类器物在形制、造型、装饰、工艺、色彩和创意等方面独特的物质表征和审美旨趣。其原因有二，一是生业进步使审美创作具备了物质基

²⁵¹ 郑建明等：《浙江长兴石泉明墓发掘简报》，《文物》2015 年 7 期。

²⁵² 黄秣人等：《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塔基与地宫发掘简报》，《文物》2015 年 5 期。

²⁵³ 周必素、彭万：《遵义新蒲村杨氏“土司”墓地》，《南方文物》2015 年 1 期。

²⁵⁴ 李新伟：《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文物》2015 年 4 期。

²⁵⁵ 何弩：《关于崧泽文化商品经济的思考》，《东南文化》2015 年 1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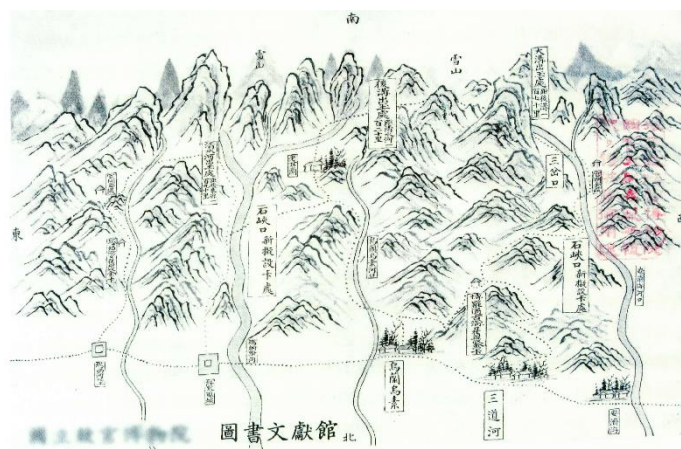
²⁵⁶ 王荣、吴在君：《中国玉器的古代修复工艺研究——以出土玉器为例》，《东南文化》2015 年 3 期。

²⁵⁷ 方向明：《聚落变迁和统一信仰的形成：从崧泽到良渚》，《东南文化》2015 年 1 期。

础和闲暇时间；二是没有强权压制的神崇拜为艺术创作提供了自由信仰和独立创意。崧泽文化神崇拜以陶器为主要载体，神的形象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直观物象；而良渚文化以琮、璧等玉器为主要载体，神的形象日益格式化和神秘化。环太湖地区龙首纹玉器的出现，是神崇拜载体材质由陶向玉转换的标志性事件，可视为划分良渚文化与崧泽文化的重要标尺和界缘²⁵⁸。

许晓东从 13-17 世纪中国及其相关伊斯兰地区历史、相互交往、玉料和工艺等方面出发，重点探讨了元、明两朝玉雕艺术与伊斯兰玉雕艺术的关系，同时涉及唐、宋两朝对伊斯兰玉器的影响²⁵⁹。

郭福祥在《乾隆宫廷玛纳斯碧玉研究》中，以文献记录、清宫档案和故宫博物院的收藏为依据，对清代新疆玛纳斯碧玉的开采进行探讨，对清代宫廷利用玛纳斯碧玉制作玉器的情况详加解析，尝试勾画出清代玛纳斯碧玉开发利用的真实图景²⁶⁰。



图五 玛纳斯出产碧玉情形并应设卡伦所处图（清乾隆时期）

张绪球在《院墙湾秦家山楚墓出土玉器研究》中，对 18 件出土于荆州院墙湾一号楚墓和秦家山二号楚墓的玉器进行了以下三个方面分析和讨论：1. 玉器的制作年代；2. 玉器的文化属性；3. 器型、纹饰的特点及演变情况。以院墙湾鹿鸟纹印玺 (M1:42) 为例（图六）。该玉器为白玉，片状，等边三角形，正面有边廓。印纹为阴刻，中间下方有一王字，顶部有一飞鸟，两侧各有一鹿，作跃起状。背面有长方形钮，钮顶面与两侧面皆有穿孔，并相互贯通²⁶¹。



图六 院墙湾鹿鸟纹印玺

²⁵⁸ 蒋卫东：《崧泽之美：物质表征下的精神实质》，《东南文化》2015 年 1 期。

²⁵⁹ 许晓东：《13-17 世纪中国玉器与伊斯兰玉雕艺术的相互影响》，《故宫博物院院刊》2015 年 1 期。

²⁶⁰ 郭福祥：《乾隆宫廷玛纳斯碧玉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15 年 2 期。

²⁶¹ 张绪球：《院墙湾秦家山楚墓出土玉器研究》，《江汉考古》2015 年 1 期。

吴中胜对中华文化中的金玉崇拜传统和《文心雕龙》中以金玉喻文的言说方式之形成进行阐述²⁶²。

叶舒宪将四重证据法的各种证据之间的互阐作用，特别是作为图像叙事内部不同材料间的互证效应，概括为“证据间性”问题，以1998年安徽巢湖湖北山头1号西汉墓出土的罕见神熊与螭龙纹饰白玉环释读为例，发挥多种图像的系统化参照效应，尝试恢复原初的升天神话想像内容，重建失落的上古天国景观，辨析以“天熊”形象为中心的附属神物系列形象，通过有效利用证据间性，诠释天神与祖灵的相互认同现象，解答楚国王族以熊为圣号的图腾信仰底蕴，说明跨学科研究方法的知识创新意义及应用前景²⁶³。

李喜娥在《玉柄形器与玉璋关系研究》中，从玉柄形器与大汶口文化出土的牙璋、金沙遗址出土的璋和玉戈的关系以及玉璋的定名方面考证，认为玉柄形器应为玉璋或玉璋的亚种²⁶⁴。

方向明在《良渚文化玉器用料探秘》一文中，分两个部分对良渚文化玉器的用料情况进行介绍，首先分析了良渚文化代表性玉器的用料。接着，对良渚玉料的原生状态以及玉料的产地进行研究²⁶⁵。

方向明在《良渚文化玉器的琢制工艺》中介绍了良渚文化玉器的琢制工艺。包括线切割、片切割减地浅浮雕、双向钻孔技术、阴线刻和微雕阴线刻等²⁶⁶。

许卫红根据出土遗迹单位的祭祀性质和玉人选材的特殊性，首先追溯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玉质人像或图案的宗教意义，而后列举了周、秦、汉祭祀属官的设置以及民间的巫覡活动，认为此类玉人代表的不是人殉和人牺，而与巫祝有关，取招引候神之意，是先秦时期暴巫、焚巫陋习的孑遗²⁶⁷。

鲍怡等在《三门峡虢国墓地 M2012 墓玉器材质研究》中对 M2012（梁姬墓）出土的 59 件（组）玉器材质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综合分析结果：59 件（组）出土玉器中 56 件（组）为软玉，1 件为蛇纹岩，1 组配饰中有绿松石、孔雀石、玛瑙²⁶⁸。

邓聪等在《二里头牙璋（VM3:4）在南中国的波及——中国早期国家政治制度起源和扩散》中对二里头牙璋进行了细部的分析。认为二里头牙璋在南中国地区的复制，是原生国家向次生国家波及的一种表现。作者相信通过二里头牙璋等实物，足以论证夏王朝政治理念的实践，也是东亚广域国家起源的关键²⁶⁹。

虞海燕在《玉带与明代政治生化》中，从等级制度、赏赐与僭越现象以及宦官政治三个方面对明代玉带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²⁷⁰。

王裕昌以齐家文化玉器为中心，将史前西北玉器与其他地区史前文化玉器作一比较，主要以史前北方玉器代表的红山文化玉器和史前南方玉器代表的良渚文化玉器以及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文化

²⁶² 吴中胜：《金玉崇拜与〈文心雕龙〉的金玉之喻》，《人文杂志》2015年9期。

²⁶³ 叶舒宪：《再论四重证据法的证据间性——从巢湖汉墓玉环天熊图像看楚族熊图腾》，《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6期。

²⁶⁴ 李喜娥：《玉柄形器与玉璋关系研究》，《四川文物》2015年1期。

²⁶⁵ 方向明：《良渚文化玉器用料探秘》，《大众考古》2015年3期。

²⁶⁶ 方向明：《良渚文化玉器的琢制工艺》，《大众考古》2015年4期。

²⁶⁷ 许卫红：《再论甘肃礼县鸾亭山等地出土玉人的功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4期。

²⁶⁸ 鲍怡等：《三门峡虢国墓地 M2012 墓玉器材质研究》，《中原文物》2015年1期。

²⁶⁹ 邓聪、王方：《二里头牙璋（VM3:4）在南中国的波及——中国早期国家政治制度起源和扩散》，《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5期。

²⁷⁰ 虞海燕：《玉带与明代政治生活》，《北京文博文丛》2015年2期。

玉器，并向下延伸至商代玉器为主要比较对象，试图找出齐家文化玉器与它们之间的关系与异同²⁷¹。

王喆与熊兆飞以楚墓出土的龙形玉器和龙纹玉佩的纹样造型为研究对象，来探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特有的玉器龙纹造型特征。并且与中原地区的龙形玉器纹样相比，更具有浪漫主义情怀²⁷²。

叶舒宪和祖晓伟认为红山文化玉器不是作为美术的装饰品而生产和使用的，而是作为宗教信仰的法器而存在。在《玉器与信仰：红山文化研究概要》一文中，评述文学人类学派对其中四种玉礼器的神话学解读尝试²⁷³。

张晶雨认为中国玉器不是纯粹的物质，而是走向一种特殊的物质文化体。旧石器晚期先祖发现并使用玉器，使其逐渐演变成礼器、祭器或图腾，使原来仅仅是一种特别性质的石头转化为权力、地位、财富、神权的象征。春秋时期玉器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体现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当时玉文化的风貌和等级森严的用玉制度²⁷⁴。

艾荫范指出红山文化代表性玉器大目龙（又称“C”字形龙）是“蜀”字的原型。“蜀”的本义为阳性生殖器，与器形非常吻合。有发达原始农业的红山文化应是炎帝神农氏传说的考古学背景。炎黄之战揭示了中国历史上游牧文化对农耕文化的最早入侵以及二者的交融²⁷⁵。

刘晓婧在《太湖地区出土的史前玉玦》中，根据现有考古资料，对太湖地区史前玉玦的器形、纹饰、工艺、材质和用途等问题进行考察。认为在马家浜文化晚期，石英玉时代向软玉时代转变，并且玉、石制作技术分化²⁷⁶。

叶舒宪对白玉崇拜及其神话历史进行研究。通过文学和历史两个层面对白玉崇拜的演变进行探讨。作者认为在三千年前的商周时期形成了白玉崇拜，随后玉文化发展为以新疆昆仑山玉和田玉为绝对主脉，“白璧无瑕”遂成为了人们心中完美无缺的价值观表达模式²⁷⁷。

干振瑜对东周的璜形玉器进行分型、分式，并对不同时期的璜形玉器加以区分，并对璜形玉器的功能及其制作工艺特征进行简单的探讨²⁷⁸。

易华对齐家文化玉礼器如璧、琮、刀、戈、璋、璜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璧琮组合源自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刀戈组合和圭璋组合始于青铜时代。大玉刀和大玉璋流行于夏代，是夏文华的标志也是齐家文化的特色。儒家文化主要礼器形制正是基于齐家文化玉器的基本造型。齐家文化玉器在东亚玉文化发展史上起了承上启下作用，应该是夏代玉器的重要组成部分²⁷⁹。

崔岩勤对兴隆洼文化玉器的种类、造型、雕琢工艺、使用功能等方面特点进行分析²⁸⁰。

2. 研究专著

²⁷¹ 王裕昌：《齐家文化玉器与其他文化玉器的比较》，《设计艺术研究》2015年3期。

²⁷² 王喆：《熊兆飞，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龙形玉器纹样造型研究》，《北京文博文丛》2015年2期。

²⁷³ 叶舒宪、祖晓伟：《玉器与信仰：红山文化研究概要》，《中外文化与文论》2015年1期。

²⁷⁴ 张晶雨：《春秋时期玉器所见制度史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1期。

²⁷⁵ 艾荫范：《大目龙象形字“蜀”之音义与炎帝文化——兼为“大目龙”正名》，《北方文物》2015年1期。

²⁷⁶ 刘晓婧：《太湖地区出土的史前玉玦》，《文物世界》2015年1期

²⁷⁷ 叶舒宪：《白玉崇拜及其神话历史初探》，《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2期。

²⁷⁸ 干振瑜：《东周璜形玉器初步研究》，《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3期。

²⁷⁹ 易华：《齐家玉器与夏文化》，《百色学院学报》，2015(02)：第9-18页。

²⁸⁰ 崔岩勤：《兴隆洼文化玉器特点简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4期。

《临朐西朱封龙山文化玉器研究》作为“中国古代玉器科学研究”项目的一个课题之成果，以山东省临朐县西朱封遗址出土的 68 件（组）龙山文化玉器（包括绿松石）为研究对象。通过观摩出土文物实物，运用有关仪器设备对文物进行矿物学观察分析，微痕观察分析，探讨西朱封玉器所蕴含的人文与科技问题；在对山东龙山文化玉器进行宏观考察的视角下，把西朱封玉器放在海岱地区文明起源、中华文明早期发展之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之层面上，进行更高层次的讨论²⁸¹。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巨型礼仪建筑群》一书共分 15 个章节，对牛河梁红山文化各个方面进行研究。运用考古学、经济学、建筑学、历史学、宗教学、人类学等方法对红山文化研究进行集成。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重新分析牛河梁遗址礼仪性建筑群的功能和研究价值，论证红山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国进入文明阶段的特殊路径，以及牛河梁遗址作为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特殊之处²⁸²。

《玉成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探源》一书可分上下两编。上编为玉石之路探索，收录相关文章 7 篇，下编为玉兵文化研究，收录相关文章 10 篇²⁸³。

3. 展览图录

“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特展”中，展出山东地区 191 件（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文物，其中玉器 114 件（组）、石器 39 件、陶器 26 件、骨牙器 12 件（组）。图录中实际采用 187 件（组）器物。展品可分为四个单元，依次是“质朴的工具”、“精致的器皿”、“时尚的饰品”、“高贵的瑞物”。向观众展示了常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凸显身份地位的各类饰物以及上流社会独享的祥瑞礼器²⁸⁴。

“凤舞九天——楚文化特展”中，约展览出 200 件（套）楚汉文化文物精品。展览共分为四个单元，分别是“尊礼崇乐”、“蕴美求奇”、“究天人之际”、“楚启汉风”，从礼乐制度、艺术、精神等多个角度为观众展示楚文化的内涵，兼具学术性与观赏性。在图录后还附相关学术文章六篇²⁸⁵。



图七 楚文化特展中的龙形玉环（左）和三人踏猪形玉佩（右）

《权利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一书中收录 2015 年 4 月 5 日-6 月 20 日在北京大学赛克

²⁸¹ 杜金鹏：《临朐西朱封龙山文化玉器研究》，科学出版社，2015 年。

²⁸² 雷广臻主编：《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巨型礼仪建筑群》，科学出版社，2015 年。

²⁸³ 叶舒宪主编：《玉成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探源》，中华书局，2015 年。

²⁸⁴ 马东峰主编：《东夷华彩——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特展》，浙江摄影出版社，2015 年。

²⁸⁵ 湖南省博物馆：《凤舞九天——楚文化特展》，科学出版社，2015 年。

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举办的“权利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所有展品。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研究论文，第二部分为器物图版，第三部分为器物说明与索引。图版部分的器物顺序均同展览，按照展览的三个单元依序排列分别是：“‘王’的葬礼”、“权利的展现”和“以玉事神”²⁸⁶。



图八 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中展出良渚文化玉琮（左）和冠状器（右）

为纪念屯溪博物馆建馆 30 周年，也让读者欣赏到更多文物。屯溪博物馆选取 177 件（套）文物作为馆藏珍品编辑出版。全书共分为陶瓷、杂项、书画和文房四个部分。在杂项中包括玉器、青铜器、银器、漆器等。具有代表性的玉器有玛瑙栗枣花生挂件（图九）、青白玉莲蓬挂件、墨玉巧雕双獾²⁸⁷。

《良渚文化刻画符号》正文收录带有刻画符号的器物共计 544 件，其中陶器 536 件、石器 11 件、玉器 7 件。不同质地的器物上符号的形制和内容有着明显区别。具有刻画符号的玉器主要以玉琮和玉璧为主，主题为立鸟和高台。玉璧上的符号十分隐秘，而玉琮所刻画的符号直视即可看到。在制作水平上，玉璧的符号远比玉琮上的精致²⁸⁸。

《印记延年——周秦两汉玉印陶文掇英》中收录唐存才、许雄志所收藏战国陶文与周秦两汉玉印共计 112 品拓印题跋。其中玉印有五十六方，皆稀世精品。“王赳”白文印为战国秦印系列。曲尺形在铜印中已属罕见之品，玉质者更为罕见。出土于洛阳金村旧址的战国“肖形”印的印钮甚小，与存世诸多的商周印钮类似，而金村为东周墓葬群，此印年代应更早（图十）²⁸⁹。



图九 屯溪博物馆展出玛瑙栗枣花生挂件



图一〇 洛阳金村旧址出土的“肖形印”

²⁸⁶ 秦岭主编，《权利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文物出版社，2015 年。

²⁸⁷ 储莉萍主编，《屯溪博物馆馆藏珍品集》，文物出版社，2015 年。

²⁸⁸ 张炳火主编，《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

²⁸⁹ 童衍方主编，《印记延年——周秦两汉玉印陶文掇英》，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 年。

玉器考古文献汇编（2015年7月-12月）

原载《玉器考古通讯》总第七期

刘思源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一 考古发现

（一）新石器时代

1. 东北地区

2012年7-9月，在2010、2011年两次大规模抢救发掘的基础上，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哈民忙哈遗址进行了第三次抢救性考古发掘，本次发掘共清理房址11座、灰坑19座、墓葬6座、环壕2条，出土器物500余件，分为陶器、石器、骨角蚌器和玉器。玉器共计40余件，器形主要有璧、璜、匕形器、勾云形器和饰件（图一）。除了2件玉器散落在距离房址较远处，大多数玉器均发现于人骨集中的四座房址内（F44、F45、F46、F47），多位于人骨颈部或腰腹部。F46出土玉器数量最多，计16件²⁹⁰。



图一 哈民忙哈遗址出土的玉璧和勾云形玉器

2. 西北地区

2010年6-11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科技大学材料与冶金史研究所联合对甘肃张掖市西城驿遗址进行了发掘。西城驿遗址根据陶器特征及层位关系，可以将地层及各地层下叠压的遗迹分为两大期。第一期年代介于马厂晚期至四坝早期之间，第二期属于四坝文化。第一期中出土陶器、铜器、石器、玉器等，玉器包括斧、饼及绿松石等。第二期中主要出土物为陶器、石器、铜器和骨器，亦有绿松石、玛瑙及水晶等²⁹¹。

3. 华中地区

2008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岳阳市、县文物部门对青山遗址进行了发掘。青山遗址位于

²⁹⁰ 阿如娜等：《内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新石器时代遗址2012年的发掘》，《考古》2015年10期。

²⁹¹ 陈国科等：《甘肃张掖市西城驿遗址2010年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10期。

湘江下游，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重要遗址，文化因素复杂。该遗址出土器物包括陶器、石器和玉器，其中玉器共出土 3 件，分别是：玉璜、玉环和玉簪²⁹²。

4. 华东地区

2010 年 12 月至 2011 年 1 月，为了进一步了解福泉山遗址的聚落布局情况，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再次对遗址进行了主动性发掘。本次工作的重点是吴家场地点，发掘可以确认该地点为良渚文化晚期人工堆筑的权贵墓地。吴家场墓地共发掘良渚文化墓葬 4 座，共出土玉器、石器、陶器和骨器 373 件（组）。其中玉器 280 件（组），种类包括琮、璧、钺、锥形器、镯、坠、管、珠等。琮仅出土 1 件，标本 M207:68。透闪石—阳起石，墨绿色。近方形，上下射部为较规整的环形，射孔内有空心对钻的对接台痕痕迹。器面以直槽分块，以四角线为中心，各雕刻一个简化的神人纹。神人纹以两条平行弦纹的横棱作冠，双眼作重圈状，内圈瞳孔为锐器刻划的数道细线连接而成，两侧各加一短线作眼睑，下有短鼻梁，内有细刻弧线。器表孔壁高度抛光，上射面上残留数道切割痕。宽 7.3-7.7、孔径 4.3-4.6、高 5 厘米²⁹³。

（二）夏商周时期

1. 西北地区

2014 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基于 2007-2013 年对马鬃山玉矿遗址进行的考古调查、发掘和测绘工作，继续对该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本次考古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对寒窑子草场玉矿遗址和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进行发掘。寒窑子草场玉矿遗址规模较小，以露天开采为主，在矿坑周边及山麓两侧采集到大量的碎玉料、石锤、陶片等。玉料以青玉为主。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年代为战国至汉代，可能存在四坝文化时期的遗存。出土遗物主要有陶片、石器、铜器、玉料（图二）等。玉料形体不大，有少量初选后的精料，大多为边角废料，基本色调为黄、绿、青和白色。玉料外表包裹一层或薄或厚的石皮，外表发黑者或为锰离子浸入所致，外表呈褐色者是褐铁矿浸染所致。部分表面白化，不透明。结构为多纤维交织结构，基本上由透闪石组成，含有微细杂质矿物。部分玉料局部磨光，部分有火烧痕迹。另出土少量戈壁玉料²⁹⁴。



图二 马鬃山玉矿遗址玉料

²⁹²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阴青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5 年。

²⁹³ 陈杰等：《上海福泉山遗址吴家场墓地 2010 年发掘简报》，《考古》2015 年 10 期。

²⁹⁴ 陈国科等：《甘肃肃北县马鬃山玉矿遗址》，《考古》2015 年 7 期。



图三 2014年的周原的三处发掘区
(北部围墙内为凤雏甲组建筑)

2013年12月,陕西周原遗址贺家村发现一处西周中晚期铜器窖藏,出土器物包括车马器、乐器和工具三大类,共102件。44件鞞、軋中有39件镶嵌绿松石,工艺精美,这在以往未有发现²⁹⁵。

2014年秋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对岐山县凤雏村南的一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进行发掘(图三)。该基址编号为2014ZYIIC4F3(凤雏三号基址),其平面为“回”字型,总占地面积约2180平方米,是迄今发掘最大的西周建筑遗址。三号基址庭院外围出土了金箔、绿松石、原始瓷器残片等贵重物品²⁹⁶。

2. 华中地区

2002年至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对河南安阳市铁三路制骨作坊进行过三次发掘,综合三次发掘,可以推测三路制骨作坊为东北—西南走向。发掘期间共清理300余座墓葬,绝大多数为殷墟文化时期。其中2001APNM2118中出土玉鸟1件(M2118:10),灰白色,较纯净,抛光细致。一侧羽翼留有两个半圆形两面对钻而成的圆孔,由此判断该件玉鸟应是改制器。长2.2、宽2.2、最厚1厘米。玉饰1件(M2118:12),残,原器形不明。青灰色。扁平状,上、下端均内凹,一侧打磨成缺口,另一侧为断口。长4.4、宽1.1-2、厚0.3厘米。绿松石鸟1件(M2118:11),青绿色。头部有钻孔,无足。头至尾长2.6、双翅部位宽2.6厘米²⁹⁷。

2012年12月-2013年7月,为配合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基本建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漯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固厢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固厢墓地位于河南省漯河市固厢乡固厢村东,本次发掘共清理300座墓葬,其中战国墓葬100余座,出土随葬品的墓63座,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其余为铜器、铁器、玉石器等。玉石器多出自墓主人身上或其附近²⁹⁸。

2005年3月,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华鑫苑住宅小区的建设,对项目所在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共清理西周至明清时期墓葬247座,其中M124为春秋晚期墓,墓葬形制及随葬品保存完好,出土器物16件,包括陶、铜、玉器,其中玉器包括玉饰件和玉片两类。玉饰件共2件,为青白玉,长条形,形制相同,大小不同。断面近四边形。玉片仅1件,残,亦为青白玉²⁹⁹。

2005年2月,河南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南阳万家园基本建设时,清理了两周至明清时期的墓葬247座,其中M199时代为春秋早期,是本次发掘的两周墓葬中规格最高的一座,出土了三鼎四簋及玉圭、玉戈等180余件随葬品。其中玉器共23件,有戈1、璜2、圭形器1、玦2、圆饼形饰

²⁹⁵ 徐建军等:《陕西周原遗址贺家村车马器窖藏清理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11期。

²⁹⁶ 徐天进等:《周原遗址凤雏三号基址2014年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7期。

²⁹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等:《河南安阳市铁三路殷墟文化时期制骨作坊遗址》,《考古》2015年8期。

²⁹⁸ 楚小龙等:《河南漯河固厢墓地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2015年8期。

²⁹⁹ 蒋宏杰等:《河南南阳市华鑫苑小区M124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5年3期。

1、牌饰 6、菱形饰 3、柄形饰 2、璧 1、瑗 1、管 1、残玉片 2。戈 1 件 (M199:45), 和田玉, 大部分沁色呈鸡骨白。上、下刃皆斜直, 有中脊, 长方形内。内前端有穿, 穿为一面钻。长 30、援长 22.2、援宽 6.9、内长 6.2、内厚 0.7 厘米。牌饰 6 件。M199:52-57, 和田青白玉, 其中 4 件大部分沁色呈鸡骨白, 2 件温润微透。形制及大小相同。上部呈圆弧形、下部有两凹槽。背部有四个隧形孔, 其中 2 件中部有穿。正面雕有云纹。长 3.3、宽 2.5、厚 0.35 厘米。玛瑙 78 件。有圭、珠。玛瑙圭 1 件 (M199:66), 白色微黄, 土色沁。下宽上窄。圭首为双面刃, 略残。磨光。长 13.3、刃宽 2.7、厚 0.7 厘米³⁰⁰。

1993 年 3 月, 河南大学学生在应国墓地实习期间发掘了一座小型应国贵族墓 (M257), 该墓葬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葬具为木质单棺单椁, 随葬品放置在棺椁之间和棺内两处, 共计 115 件(片), 按照性质分为礼器、兵器、车器、马器、生活用器等, 其中包括 77 件(片)玉器。依据用途的不同, 可分为礼玉和佩玉两类, 礼玉为 4 组 75 件, 计有玉璋、条形玉缀饰 2 组, 玉璋从形制上又可分为柄形璋、匕形璋、圭形璋和璜形璋四种, 条形玉缀饰是玉璋的附属物或装饰品。玉柄形璋及缀饰为 1 组 18 件(片), 出于墓主人头部。玉柄形璋位于条形玉片缀饰上方。玉柄形璋为较宽的扁薄体长条形玉版, 其末端有平齐的钝刃且首端切去双角, 故称为平刃兼双切角型玉柄形璋。玉匕形璋及缀饰共 2 组 34 件(片)。每一组都由 1 件玉匕璋与多片条形玉缀饰组合而成, 出土时已经零乱, 难以复原。玉圭形璋共出土 2 件, 发现时位于椁室北端铜礼器与铜车马器之中。其用途与玉璋相同, 可称为平刃型玉圭形璋, 2 件形制基本相同, 宽度有所差别, 玉质、玉色相近, 均为青玉, 冰青色, 略有深浅之别, 半透明。首端比较宽, 呈三角形; 末端略窄, 平齐, 双面磨出刃部。玉璜形璋为 1 组 21 件(片)。出土于墓主人下腹部, 20 片条形玉片缀饰散乱地分布在其下方。佩玉为玉块, 共 2 件, 其质地为青玉, 因受腐蚀而呈黄白色碎块状。根据残存痕迹, 其外径约 4 厘米。文中指出, 这些玉璋应该是用来赠送给参与祭祀的宾客, 其用途应是用来将谷类食物从炊食器具分配到饮食器具中的一种用具。同时, 发掘者认为, 在考古发现中, 因女性墓随葬玉璋数量较少而男性墓则较多, 所以这种情况基本反映了作为礼器的玉璋代表着墓主人身份的用途³⁰¹。

2009 年 2 月至 2010 年 4 月,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宋庄墓地进行了钻探, 并对 19 座墓葬进行发掘, 其中 M4 为一座春秋晚期墓葬, 保存比较完整。形制为“甲”字形竖穴土坑墓, 有殉人和殉狗。出土大量随葬品, 包括铜器、陶器、石磬、玉石器和海贝。玉石器集中出土于墓主的首和胸等部位, 其中玉虎 2 件, 通体光滑, 镂雕成形。标本 M4:56, 乳白色, 素面。伸首, 躯干匍匐蜷曲, 尾部上卷, 背部有一穿孔。长 9.9、宽 2、厚 0.28 厘米(图四)。标本 M4:57, 淡绿色, 素面。昂首张嘴, 前肢起立, 后肢残缺, 尾部下垂, 尾端略上卷, 似奔走状。首部一圆作目, 颈背有一突出圆环, 中部有一大圆孔。身长 7.7、宽 3.9、厚 0.2 厘米。玉鱼 2 件。青绿色, 长条形, 两端尖, 上、下边缘有扉棱作鱼鳍。中部有横向切割痕迹。标本 M4:60, 鱼头上、下边缘各有 1 个穿孔, 鱼尾有 1 个穿孔。长 9.6、宽 2.6、厚 0.16 厘米(图四)。玉璜 2 件, 均为黄褐色。标本 M4:59, 位于墓主人腹部。素面,

³⁰⁰ 潘洁等:《河南南阳万家园 M199 春秋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5 年 5 期。

³⁰¹ 王龙正等:《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 M257 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5 年 3 期。

器表有横向切割痕迹，两端各有 2 个穿孔。外弧缘两端、侧缘均有较为圆滑的齿突。长 12.9、宽 3.6、厚 0.2 厘米。标本 M4:62，位于墓主人股骨内侧。造型不甚规整。一面为素面，有切割痕迹；一面阴刻双勾线虺龙纹，有 4 行，最外 1 行为 7 只，向内逐行少 1 只，最内侧仅有 4 只。两端各有 3 个穿孔，内、外弧缘有方形缺口。长 9.8、宽 4.4、厚 0.12 厘米。玉片饰 2 件。墓主腰部两侧各 1 件，青灰色。形制一致，片状，体扁薄，两端边缘有穿孔，两侧边缘有方形缺口。标本 M4:54，一面为素面，另一面阴刻双钩线虺龙纹，纵横三列三排，共 9 只。两端各有 3 个穿孔，中部有 2 个穿孔。长 5.3、宽 3.5-3.9、厚 0.14 厘米。标本 M4:55，素面，缺一角，呈五边形。两端各有两个穿孔。长 5.9、宽 3.4、厚 0.1 厘米。玉块 2 件，应是耳饰。黄褐色，圆柱形，中段略束收。中穿为孔，一侧缺口。器表饰阴刻双勾线虺龙纹，左右共 4 排，前两排龙首与后两排龙首一正一倒，面向也一左一右。标本 M4:53 纹饰较为规整，标本 M4:52 较为凌乱。标本 M4 53，两端直径 1.9 厘米，中空直径 0.8、通高 2.5 厘米。串珠共 11 颗，为串饰³⁰²。



图四 宋庄墓地出土的玉虎(左)和玉鱼(右)

2000 年 6-8 月，荆州博物馆对曹家山 26 座东周楚墓进行清理发掘，其中一号墓为带墓道的竖穴土坑木椁墓，保存情况较好，出土随葬品 22 件，按照质地可以分为铜器、玉器、漆木器和竹器。其中玉器仅 1 件。璧 (M1:11)，颜色浅黄，质地较软。圆体，扁平，截面长方形。肉宽略大于好径，肉部两面阴刻谷纹。通径 7.9、截面厚 0.45 厘米³⁰³。

2014 年 6-8 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南漳县博物馆对南漳川庙山墓地的 23 座东周墓葬进行抢救发掘。除 M2 和 M15 以外，其他 21 座墓中共出土随葬品 102 件 (套)。包括陶器、青铜礼器、铜佩饰、玉佩饰、骨器、石器和铜铃等。其中玉佩饰 2 件 (套)，共计 19 件，均出自 M18。一套位于颈部，一套位于腹部，分别属于项饰和佩饰。项饰共 15 件，散落于墓主残存下颌骨的上面和下面，系绳无存，串连方式不明，器形分为条形、环形和贝形。佩饰共 4 件，叠放于墓主腰腹部残骨之上，系绳无存，佩戴方式和串连方式不明，分为觶和管³⁰⁴。

2011 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洛阳市瀍河区的 8 座西周墓进行发掘，出土器物比较丰富，有陶瓷器、铜器、玉石器等 73 件。其中玉石器 3 件，器形包括柄形器、玉片和玉环。柄形器 1 件 (C3M1519:3)。扁平长条形，宽部两侧磨平，截面为等腰梯形，为圆凸刃。黑灰色，素面，从残余痕迹看，正背两面涂有一薄层朱砂。长 8、宽 1.5、厚 0.4 厘米。玉片 5 片 (C3M1507:2)，均青白玉。从残存情况看可分三型。A 型 3 块。通体素面。其中一块残长 9.6、宽 3.6 厘米。B 型 1 块。两面均有一直线，错缝，

³⁰² 郭移洪等：《河南淇县宋庄东周墓地 M4 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5 年 4 期。

³⁰³ 杨开勇等：《湖北荆州曹家山一号楚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5 年 5 期。

³⁰⁴ 田桂萍等：《湖北南漳川庙山东周墓地 2014 年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15 年 4 期。

线的两侧高低不平。其中一块残长 9、宽 8 厘米。C 型 1 块。一面有一凸起直线，把这面分成高低两部分，另一面素面。长 7.8、宽 7 厘米。玉环 1 件 (C3M1523:8)，青灰色玉，素面。直径 2.4、孔径 0.9、厚 0.3 厘米³⁰⁵。

3. 华东地区

2013 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铜陵县夏家墩遗址和神墩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西周至春秋时期房址、大型红烧土建筑遗迹、灰坑等，出土陶器、原始瓷器、玉器、石器、铜器等遗物。其中玉器仅于夏家墩遗址中出土一件，为残玉 (TXT1④:3)，青黄色玉质，局部有杂色，器表有白沁。横剖面为长椭圆形，一端有圆穿，两面对穿，残高 3 厘米³⁰⁶。

苏州观音山石室土墩墓 D1M1 墓葬结构为打破基岩的岩坑墓，常见于长江下游沿太湖周边山区西周至东周时期的墓葬形式，特别是在东周时期比较常见。器物坑所出土器物均为春秋时期常见的器形，印纹陶纹饰也流行于春秋时期，因此 D1M1 年代可推断为东周。另墓室底部清理出的少量玉器具有秦汉时期的特点，据此推测 D1M1 在秦汉时期被破坏，并利用了春秋时期构筑的岩坑墓穴进行再次埋葬。墓坑中清理出被破坏残留器物 3 件，有玉印 1 件，玉带钩 1 件，玉珉 1 件。玉印 (M1:3) 为灰白色。覆斗形，钮部有一穿孔，印面篆刻阴纹“贾”字。剑珉为青玉，湖绿色，受沁处发白。正视为束腰倒梯形，横截面呈长菱形。两面均饰浅浮雕云雷纹，上端即与剑鞘衔接面有三个钻孔，用以连接剑鞘，中间的较大；两侧较小，并斜向穿透。出土时断为三块，缺其一；二块分别出于不同点，拼合宽 5.1、厚 1.3、高 4.2 厘米。带钩为灰白色，带有自然纹脉。局部还留有朱砂印痕，推测可能原置于馆内，弯钩型，钩端残缺³⁰⁷。

(三) 秦汉至隋唐时期

1. 东北地区

2008 年 5-11 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辽阳市东南部的苗圃墓地进行了发掘。本次共发掘 19 座墓葬，多为石板砌筑，少数使用石块。虽墓葬受到破坏严重，但仍出土随葬品 438 件，以陶器为主，另有少量石器、铜器、玛瑙器和骨器等³⁰⁸。

北燕冯素弗墓位于辽宁省北票县西官营子，于 1965 年 9 月发现，至 11 月墓地的的工作结束。1998 年 10 月，辽宁省博物馆对西官营子冯素弗墓地又一次进行勘察，并进行了补充性和局部性的发掘。该墓地共两座墓，墓主人推测为东晋十六国时期北燕国国王冯跋的长弟、北燕国的缔造者之一——北燕宰辅冯素弗及其妻属。两座墓中出土遗物包括陶器、铜器、玉器、玻璃器、铁器、漆器等，其中玉器主要出自第一号墓。玉盃 1 件 (图五)，玉色灰黄参半，灰色部分杂有白色纹带和黑点，有类于玛瑙。质地较薄，近半透明。大口，矮身，平底，浅圈足。内底心下凹为一个平面。口外有弦纹两周，圈足足底甚宽，在圈足的着地面又加工出凹槽一周。口径 8.6、底径 5.4、高 3.3、壁厚 0.2 厘米。玉

³⁰⁵ 俞凉亘等：《洛阳铁道·龙锦嘉园西周墓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 年 11 期。

³⁰⁶ 黎海超等：《安徽铜陵夏家墩、神墩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5 年 6 期。

³⁰⁷ 丁金龙等：《江苏苏州观音山东周石室土墩墓 D1M1 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5 年 5 期。

³⁰⁸ 王培新等：《辽宁辽阳苗圃汉魏石室墓 2008 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5 年 4 期。

剑首 1 件（图五），灰黄色。圆形隆顶，平底。面雕流动的云纹，面、底与周壁俱经抛光。底心一方槽，槽心一透穿，用镶剑首。直径 3.7、高 1.4 厘米，方槽长 1.2、深 0.4 厘米³⁰⁹。



图五 冯素弗墓地出土玉盖（左）和玉剑首（右）

2014 年 7-10 月，呼伦贝尔联合考古队对岗嘎墓地进行了系统钻探和正式的考古发掘。该遗址棺木样品的碳十四测年的年代为公元 8-10 世纪，属于典型的游牧民族文化遗存。本次的发掘区位于岗嘎墓地东侧，清理出墓葬 16 座。墓葬出土随葬品十分丰富，按功能可分为生活用具、装饰品和骑射用品等。其中装饰品包括棒形玉饰、红色玛瑙珠饰、玻璃珠饰等。棒形玉饰仅有一件，出自 M11 墓主人左侧肩胛骨之上，青白色，初步判定为和田玉。随葬玛瑙珠的墓葬有三座，其中 M11 的玛瑙珠出自墓主人颈部右侧，酱红色，器身有七棱七面，纵截面呈枣核形，中间有钻孔。M15 出土 3 枚玛瑙珠，分别呈紫红色、白色和灰色。M18 出土 2 枚玛瑙珠，1 枚发现于墓主人下颌骨右侧，另 1 枚发现于墓主人盆骨右侧，均为酱红色，圆形，中间有钻孔³¹⁰。

2. 西北地区

2001 年 11 月至 2002 年 8 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南郊西安理工大新校区发掘墓葬 186 座，其中唐墓 140 余座，II 区 M2 为唐宗室后裔李倕之墓。该墓未被盗掘，出土大量随葬品，包括陶器、瓷器、漆木器、铜器、玉器、金银器等。因为现场清理的局限性，所以对墓主的头部及身部均采用打石膏包的方法予以提取，在石膏包中清理出冠饰、配饰以及玉器等物品，其中玉器包括玉蚕 1 件、玉猪 1 件和小玉佩四型 13 件。除石膏包中清理出玉器，发掘现场亦出土玉佩四型 10 件、玉珠 2 枚，均出自人骨周围，应为墓主下葬时配饰³¹¹。

3. 华中地区

2014 年 1 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掘清理了尉氏县后刘墓地。本次发掘共清理 13 座墓葬，其中 11 座为东汉墓葬。在“甲”字型墓（M5）中，出土玉器 2 件，均为玉握。标本 M5:1，柱状，截面为正八边形。长 6.2 厘米，截面径长 1.4 厘米。标本 M5:2，柱状，首端两面削成斜坡状，尾端截面

³⁰⁹ 辽宁省博物馆：《北燕冯素弗墓》，文物出版社，2015 年。

³¹⁰ 刘国祥等：《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岗嘎墓地》，《考古》2015 年 7 期。

³¹¹ 高明涛等：《唐李倕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5 年 6 期。

为八边形。长 6.1、尾端截面径长 1.5 厘米³¹²。

2010 年 4 月中旬至 5 月中旬，淅川县文物局文物勘探队受岳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委托组织力量对河南淅川李沟墓地进行勘探，发现墓葬 39 座。5 月下旬至 7 月底，湖南文理学院襄阳及三国历史文化研究所受委托对已发现墓葬进行发掘并进行进一步调查勘探，新发现墓葬 22 座。两次共发现墓葬 61 座，其中 57 座年代约为西汉中期到东汉早期，其余 4 座为唐宋墓葬，简报主要报道了汉墓的情况。57 座汉墓中有 44 座出土随葬器物，共计 1205 件，有陶、铜、铁、石、玉、玛瑙和漆器。其中玉器和玛瑙有 5 件，器类有玉璧、环、玛瑙珠。玉璧 2 件，体薄，圆形，中部穿孔，内、外缘平。M28:19，位于棺槨内，双面饰网格套乳点纹。外径 14.2、好径 4.3、厚 0.3 厘米。M34:8，双面饰谷纹。外径 12.7、好径 3.8、厚 0.22 厘米。玉环 2 件，环形，依据环面的不同，可分二型。A 型：1 件（M27:7），白色微泛黄，半透明。表面平整、光滑，横断面呈五棱形。外径 5、内径 3.6 厘米。置于棺外东、南侧。B 型：1 件（M34:18），灰黄色，不甚透明。表面呈索状，横断面近扁圆形。外形 3.2、内径 2.2 厘米。玛瑙珠 1 件（M26:14），通体红色，半透明。圆球体，中部对穿小孔。直径 1 厘米³¹³。

4. 华东地区

2013 年 12 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固镇县文物局联合组成考古队，对固镇县蔡庄墓群中已被盗掘的 M1 进行抢救性发掘。该墓上有巨大封土，封土呈馒头状，平面大致呈“凸”字形。出土随葬品共计 36 件（组），大多保存完好，按照质地可分为釉陶器、陶器、石器、铜器、玉器和铁器六大类。玉器包括玉管 2 件，截面呈多边形。出自墓葬填土之中³¹⁴。



图六 前李墓地的串饰

2004 年 6-8 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泗许高速公路建设，对泗县长沟镇前李自然村北的汉、宋墓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 48 座，其中汉代 42 座，宋代 6 座，均为竖穴土坑墓，出土各类器物 100 余件（套）。随葬品包括陶器、铜器、铁器、骨器及玛瑙等，基本出自汉代墓葬中，宋代墓葬出土器物极少。其中玛瑙出自 M18，与环形骨璧、料珠等共同组成环形串饰（图六）³¹⁵。

魏家庄遗址位于济南市市中区魏家庄街道办事处，为配合该片区的棚户区改造工程，2009-2010 年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在此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汉墓 95 座，随葬品种类丰富，按照种类可以分为陶、铁、铜、玉器等，共 639 余件（组）。玉器有玉剑璲、玉剑首等，多放置于棺内³¹⁶。

5. 西南地区

2005 年 4-6 月，昭通市文物管理所对水富县张滩西汉早期墓进行发掘，共清理墓葬 16 座，出土

³¹² 李占扬等：《河南尉氏县后刘墓地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5 年 3 期。

³¹³ 叶植：《河南淅川李沟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5 年 3 期。

³¹⁴ 张义中等：《安徽省固镇县蔡庄墓群一号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5 年 6 期。

³¹⁵ 贾庆元等：《安徽泗县前李墓地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5 年 3 期。

³¹⁶ 李铭等：《济南市魏家庄汉代墓葬发掘报告》，《海岱考古》（第八辑），科学出版社，2015 年。

器物 425 件，出土物具有浓厚的巴文化因素。按照质地可将器物分为陶器、铜器、铁器、玉器、玛瑙器和骨器等，其中以陶器和铜器为主。M16 中出土玉管 1 件，圆柱形，中空。通高 2.4、宽 0.6、孔径 0.1 厘米³¹⁷。

（四）宋辽至明清

1. 东北地区

2004 年 6-9 月，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哈尔滨市文物管理站、五常市文物管理所等单位组成考古队，对位于黑龙江省五常市拉林满族镇北村东的拉林机场清代遗址进行了发掘。本次发掘发现了灰坑、灰沟、灶、井等遗迹，出土物包括铜器、铁器、陶瓷器及玉器等，其中以陶器为大宗。玉器共四件，包括防玉烟嘴 1 件、仿玉配件 1 件、仿玉手镯 2 件³¹⁸。

2005 年 7-8 月，因本辽辽高速公路的建设，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辽宁省辽阳县首山一座塔基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砖瓦等建筑构件，并发现一座地宫，出土了瓷罐、瓷碗、玉香炉、石砚等遗物。发掘者指出，该塔基遗址应为清初清风寺天律禅师的舍利塔基础。其中出土玉香炉 1 件。DG:2，青白玉质，素面，三足，方唇，斜口，平沿，鼓腹。唇上有一道凹弦纹，腹上部有一道凹弦纹。口径 11.4、高 8 厘米³¹⁹。

2014 年 7-10 月，辽上京考古队对辽上京遗址的宫城城墙进行发掘，主要出土遗物为瓦当、筒瓦、滴水等建筑构件，陶器、瓷器、铜器、玉器、铁器、骨器等生活用器。其中玉器 1 件，为玉髓制成，通体白色，圆柱体，一断完整，另一端渐细，端面中心可见白芯。残长 2.3、直径 0.8-1 厘米。玛瑙珠 1 件，为浅红色透白灰色，通体磨光，圆形。直径 1.38 厘米³²⁰。

2. 西北地区

2009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南郊长安区发掘了蒙元时期“汉人世侯”刘黑马及其家族成员墓葬 12 座。其中刘黑马墓（M17）为斜坡式台阶墓道前后室土洞墓，虽曾被盗扰，但仍出土随葬品 45 件（组），主要有陶俑、陶器、金银铜玉饰件、铜币、铁器、镇墓石、墓志石等，其中陶明器多出土于墓室前室及壁龛内，而金银、玉珠饰件等随葬物品集中出土于墓室后室。玉石类饰品共 15 件（组）。玛瑙杯 1 件，M17:29，外径 1.3、孔径 0.5、壁厚 0.2 厘米。玉簪 1 件，M17:34，白玉质地，簪头似挖耳，簪体扁圆。长 14.2 厘米。玉钗 1 件，M17:35，白玉质地，钗分为两股。钗长 11.2、末端宽 1、钗腿径 0.4 厘米。珠饰 9 件，M17:25，由 5 粒白色水晶珠（2 大 3 小）、2 粒南红玛瑙（1 珠形、1 扁鼓形）、1 粒鼓形缠丝玛瑙及 1 粒略残的扁圆形松石组成。水晶珠直径为 0.7-1.1 厘米，珠形玛瑙直径为 1.2 厘米，扁鼓形玛瑙直径 1.1、厚 0.7 厘米，鼓形缠丝玛瑙腹径 0.8、高 1.3 厘米，扁圆形松石高 1.4、厚 0.7 厘米。玛瑙饰 2 件，M17:28，形似觿状。长 3.5 厘米。料珠 1 组（约 46 粒），M17:31，

³¹⁷ 刘春城等：《云南昭通水富张滩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5 年 9 期。

³¹⁸ 魏明江等：《黑龙江省五常市拉林机场清代遗址发掘简报》，《北方文物》2015 年 4 期。

³¹⁹ 李维宇等：《辽宁省辽阳县首山塔基清代遗址发掘简报》，《北方文物》2015 年 4 期。

³²⁰ 汪盈等：《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城墙 2014 年发掘简报》，《考古》2015 年 12 期。

黑褐色扁圆珠串。直径约 0.6、高约 0.5 厘米³²¹。

3. 华北地区

2011 年 10 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为配合石景山京西商务中心项目建设，对其所占地范围所发现的汉代窑址和清代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代墓葬共 10 座，出土器物为银器、铜器、玉器及铜钱。其中 M10 出土玉戒指一枚。标本 M10:7，呈圆环形，截面呈半圆状。直径 2.4、内径 1.8 厘米³²²。

4. 华中地区

2012 年 5-6 月，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配合市区大岭路南段西侧化工厂整体改造工程建设时，发掘清理了两座金代砖室墓。其中 M18 未被盗扰，保存完好，出土器物较多。包括玉璧 1 件，出于墓内西北角，青玉，薄形圆璧，外环一周凹弦纹，一侧边缘有穿孔，中心呈圆空，空外饰方格纹，方格纹内为阴刻“·”字纹，背面为素面。外径 3 厘米，内径 0.8 厘米，厚 0.4 厘米³²³。

5. 华东地区

2009 年 5 月，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对蓝调国际项目建筑工地内的 1 座砖室元代墓葬进行清理发掘。该墓内共清理随葬器物 22 件。其中瓷器 8 件，香炉、碗各 2 件，罐、碟、梅瓶、缸各 1 件；玉器 5 件，卧马 1 件，佩饰、扣各 2 件；铁齿状构件 1 件；另有铜钱 8 枚及部分被扰乱铜丝铜片。玉器包括佩饰 2 件、卧马 1 件及玉扣 2 件。玉佩饰 2 件形制相同。玉质洁白细腻，形似蝶状，高浮雕镂空如意纹（或灵芝纹），手法古朴。玉卧马玉质细腻，雕工简洁，在雕刻出马的大体形状后，稍加装饰，把马的细部体现得栩栩如生。马卧在地，四蹄蜷缩，头向左侧后方，似睡非睡，一副安逸模样。应为衣物所用。玉扣为四花瓣形，中间两个线孔，玉质与玉佩饰相同，做工细腻³²⁴。

2012 年 4 月，浙江省文物研究所与长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对长兴县湖州石泉村小黄山北坡的明代墓葬进行发掘。本次共清理墓葬 3 座，因墓葬遭到破坏，所以墓地现场所出随葬品并不多，包括瓷器 2 件、铜器 1 件、铁器 1 件、玉器 1 件及铁棺钉若干。其中玉锥形器出自 M1，乳白色，略泛黄，表面光滑。一端呈圆锥形，一端呈四棱尖状。长 5.3 厘米³²⁵。



图七 杨氏土司墓出土柳叶形玉饰

6. 西南地区

2013 年 4 月至 2014 年 11 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遵义市文物局对播州杨氏第二十九世土司杨烈墓（M1）、第二十一世土司杨铿墓（M2）和第十四世杨价墓（M3）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这三座墓葬年代跨越南宋至明末。其中 M2 虽被严重盗扰，但仍出土少量残存的随葬遗物，包括陶骑马俑、铜香炉、柳叶形玉饰（图七）等，共 52 套³²⁶。

³²¹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东郊大朝刘黑马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5 年 4 期。

³²² 张智勇等：《石景山京西商务中心汉代窑址、清代墓葬发掘简报》，《北京文博文丛》2015 年 3 期。

³²³ 王军震等：《河南三门峡市化工厂两座金代砖雕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5 年 4 期。

³²⁴ 仝艳锋等：《济南市化纤厂路元代墓葬》，《海岱考古》（第八辑）。

³²⁵ 郑建明等：《浙江长兴石泉明墓发掘简报》，《文物》2015 年 7 期。

³²⁶ 周必素等：《贵州遵义市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考古》2015 年 7 期。

二 探索与研究

(一) 考古学研究

1. 新石器时代.

袁广阔和杨小燕通过玉器和陶器图案的比较,认识到黄河、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那些绘制在彩陶上的一些图案与当时的玉器有关,它们可能是对不同玉器的描绘。这些或抽象或具象的纹饰都是“有意味的形式”,是原始先民主观意向的表达³²⁷。

王炜林在《庙底沟文化与璧的起源》一文中,结合史籍中关于璧的记载以及目前对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等玉璧的相关认识,对璧等器物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同时,根据高陵杨官寨、华县泉护村、扶风案板等遗址发现的璧、琮器物以及彩陶图案中的相关题材,认为璧等古代中国的礼器出现的时间应该可以追溯到庙底沟文化时期,起源地或在中原地区³²⁸。

在《三角城遗址文化内涵与社会现象管窥》一文中,李维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根据金川三角城遗址的文化内涵管窥当时社会现象。文章第一部分对三角城遗址的文化内涵进行分析,第二部分主要叙述所反映出的社会现象。同时,作者指出这是一支来自北方草原的古族,在本地受当地环境及本地域文化影响,并与周边文化交流而形成具有自身特征的文化。鉴于三角城遗址具有聚落中心地位,文化内涵丰富,属于学界所称沙井文化典型遗址,认为或许可以考虑定性为三角城类型或称名三角城文化³²⁹。

张小帆在《崧泽—良渚转型期的礼制遗存刍议——以小兜里、仙坛庙、邱承墩遗址为例》一文中,首先以崧泽—良渚时期的小兜里、仙坛庙、邱承墩遗址为例,对太湖流域崧泽—良渚转型期礼制遗存的现状分类作简要的概述,包括祭祀性质的土台,礼制遗物出现陶、玉并重的礼器组合现象,鼎、豆、壶成为陶礼器的固定组合等。同时认为小玉璧、小玉镯可能为良渚文化玉璧、玉琮的雏形。在转型期中,不仅孕育了良渚文化的礼仪制度,并且对良渚文化礼仪制度发展的趋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³³⁰。

曹昕运在《小梅岭玉矿与良渚文化玉料来源再探》中,考察了小梅岭古玉矿所处的古沙河支流徐家园河、中田舍河以及整个古沙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尤其是良渚文化时期的遗存分布状况,从地理位置、玉器制作、运输途径和技术来分析,确认了良渚文化时期的溧阳人已经具备了发现、开采、外运小梅岭玉矿的技术。再次印证了学界关于小梅岭古玉矿是良渚文化玉器来源这一观点³³¹。

基于目前花厅遗址出土的玉串珠出现酥松、粉化的现象,范陶峰在《新沂花厅遗址出土古玉串珠的保护探究》中首先通过检测分析确定玉质材料为叶蛇纹石,接下来为了解决玉串珠所出现的病害状况,采用浓度为14%的正硅酸乙酯溶液进行加固,浓度为3%的氟橡胶封护剂进行表面封护。该方法成功加固保护了新沂花厅遗址出土的107颗玉串珠。除此之外,作者提出加固保护的机理为:正硅酸酯

³²⁷ 袁广阔等:《略论我国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玉器图案》,《中原文物》2015年5期。

³²⁸ 王炜林:《庙底沟文化与璧的起源》,《考古与文物》2015年6期。

³²⁹ 李维明:《三角城遗址文化内涵与社会现象管窥》,《考古与文物》2015年5期。

³³⁰ 张小帆:《崧泽—良渚转型期的礼制遗存刍议——以小兜里、仙坛庙、邱承墩遗址为例》,《南方文物》2015年4期。

³³¹ 曹昕运:《小梅岭玉矿与良渚文化玉料来源再探》,《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S2期。

处理玉石时生成的硅氧烷聚合体能够产生增强、加固效果，通过烷氧基的水解，相邻颗粒间以硅烷链联结在一起使软弱、松散的玉石表面得以加固和增强。这一研究结果是在风化、脆弱古玉器保护方面的一次有益尝试³³²。

唐启翠在《玉璜如何“统一”中国：以“夏后氏之璜”神话为中心》中，以“夏后氏之璜”神话叙事为中心，立足于汉语语境“文学”发生于礼仪之本义和多重证据法，系统考察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来玉璜的时空分布及其化异趋同进程，探寻“夏后氏之璜”神话背后的族群故事与文化认同，以及玉璜在礼制文明话语建构中的地位³³³。

2. 夏商周时期

黄可佳在《试析以大甸子墓地玉器为代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一文中，在前人对大甸子墓地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期望能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用玉传统深入了解，并分析其在整个东北系玉器传统发展演变中所处的位置。文章首先对大甸子墓葬中随葬的玉器类别和形制进行分析，将玉器分为了礼器类、装饰类和附属类三个大的类别。接着分析随葬玉器的位置功能和习俗。最后对大甸子墓地的玉器特点和 Related 文化玉器关系进行探讨。文章认为大甸子玉器主要受红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影响。其虽处于东北系玉器演变的尾声，但其在继承地域性用玉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周边和同时代的玉器特点和制作玉器技术，玉料的来源多样化，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玉器类别和玉器风格³³⁴。

辛爱罡在《二里头文化非镶嵌类绿松石制品的功能分析》一文中提出，二里头文化中的非镶嵌类绿松石制品均是作为服饰之用，以珠管为主，也有少量坠饰。按照功能可以划分为耳饰、项饰、腕饰及冠饰等。在其加工过程之中，存在因料取形现象，形制上亦表现出无序的多样性，根据现在的资料尚不能判断形制和使用方式之间的相关性。非镶嵌类绿松石出现于二里头文化一期，或为富裕阶层个人喜好的选择，二期时开始具有了贵族的阶级属性，这时出现的绿松石龙和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是具有神秘宗教特征的绿松石制品，三期出现的大型绿松石珠串是贵族阶层身份的另一种标志，其他绿松石装饰品应亦为贵族阶层专享的装饰品³³⁵。

陈翔在《河南省荥阳市小胡村 M22、M28 相关问题蠡测》中首先对河南省荥阳市小胡村 M22、M28 的墓葬年代进行推断，认为其年代大致在殷墟二期晚段。接下来作者通过论述，认为这两座墓葬应当是舌族的中小贵族，二人生前既要参与军队事务，又需负责生产管理事宜。M28 墓主生前所属兵种应与车兵有关，甚至可能就是车兵、射手。1993 年被盗的安阳薛家庄殷墓墓主应与小胡村舌族为同一家族，其身份应为在商王室供职的舌族高级贵族或族长。除此之外，小胡墓地普遍使用朱砂及仅仅随葬青铜器（155 件）和玉器（45 件），极少陶器（3 件）的现象，说明其葬俗上具有一定独特性³³⁶。

丁思聪在《殷墟玉戈类器研究》中认为殷墟出土的所谓玉石质戈、圭、璋具有相同来源，可以统

³³² 范陶峰：《新沂花厅遗址出土古玉串珠的保护探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5 年 3 期。

³³³ 唐启翠：《玉璜如何“统一”中国：以“夏后氏之璜”神话为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 6 期。

³³⁴ 黄可佳：《试析以大甸子墓地玉器为代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草原文物》2015 年 2 期。

³³⁵ 辛爱罡：《二里头文化非镶嵌类绿松石制品的功能分析》，《中原文物》2015 年 6 期。

³³⁶ 陈翔：《河南省荥阳市小胡村 M22、M28 相关问题蠡测》，《南方文物》2015 年 4 期。

称为玉戈类器。殷墟出土被赋予不同名称的戈、圭、璋实际上都是玉戈分化的产物，具有相似的功能。“石璋”在殷墟四期的流行，可能与当时玉料来源的缺乏、社会礼制的僵化和随葬品的明器化相关³³⁷。

在《殷墟玉器的发现、研究与新思考》一文中，丁思聪首先对殷墟玉器的发现情况进行概述，认为虽然殷墟玉器资料已经较为丰富，但是还存在一些局限性。接下来在第二部分中，作者主要对殷墟玉器的研究现状按照时间顺序作一回顾。第三部分提出了有关殷墟玉器研究的新思考。作者认为今后的研究可以在研究理论和方法、商人对玉的认识和利用、玉器使用与社会关系、用玉制度的变化与时代背景及商周用玉沿革这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化³³⁸。

张睿祥等在《周代组玉佩形制嬗变的初步研究》中，针对目前学界对于组玉佩的名称、结构组成及功能等方面的研究较为深入，而组玉佩的形制演变及原因分析、组玉佩与墓主的关系等一些问题的研究较少的情况，对组玉佩研究较为薄弱的环节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得出如下结论：在周礼严格的制度下，除棚国墓地外，多璜式组玉佩均出自姬姓诸侯及其夫人的墓葬。将其作为判断墓主人是否为姬姓贵族的标准未尝不可，但仍需谨慎对待。同级别墓葬，用璜数量不等，似无定制，玉牌式组玉佩均出自于诸侯夫人墓，佩戴于肩部或胯下，是墓主性别的标识物。而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新的佩玉种类开始增多，组玉佩在更为广泛的地域和社会阶层内盛行不怠³³⁹。

周代组玉佩是在礼制规范下，按一定规律穿系而成的大型玉佩饰。张睿祥等在《两周组玉佩形制的嬗变及相关问题》一文中，根据其组合方式将组玉佩分为多璜式、玉牌式和环佩组合式三种。并认为，多璜式组玉佩主要出土于姬姓诸侯及夫人墓葬中，玉牌式组玉佩专属诸侯夫人佩戴，主要起装饰作用。春秋战国之交，随着周礼衰落和服饰制度的改革，组玉佩在形制和佩戴方式等方面表现出灵活性和统一性，并成为秦汉时期流行的佩玉形式³⁴⁰。

刘凌云在《西周玉器的斜刀技法实验考古研究》中，对西周玉器雕刻过程中的斜刀技法进行研究，通过实验证明斜刀技法是由硬物手刻完成的，并非斜砣所致。因为从实验结果看，硬物手刻痕迹和西周玉器上的痕迹是一致的，而砣刻所产生的微痕与西周玉器上的微痕相距甚远，对一些学者关于早在西周时期便已出现了砣具的观点提出了反对意见³⁴¹。

张晶雨在《春秋时期玉器所见制度史研究》中主要从身份等级标志、邦交用玉、礼仪用玉、赐命用玉这四个方面入手，对春秋时期玉器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体现的重要作用进行了介绍³⁴²。

《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月河一号春秋墓出土玉器阴刻技术的微痕分析》一文，主要对桐柏县月河一号春秋墓中6件典型玉器的阴刻纹饰进行微痕观察，判断出春秋晚期玉器阴刻工艺已经成熟使用了添加玉砂的旋转砣具技术。除此之外，通过比较不同玉器阴刻工艺水平的细微差别，认为一号墓出土的春秋玉器并非由固定的玉工或玉作坊加工而成。另外，牙璋142是墓主人所收藏的古玉，从阴刻工

³³⁷ 丁思聪：《殷墟玉戈类器研究》，《殷都学刊》2015年4期。

³³⁸ 丁思聪：《殷墟玉器的发现、研究与新思考》，《三代考古》（六），科学出版社，2016年。

³³⁹ 张睿祥等：《周代组玉佩形制嬗变的初步研究》，《四川文物》2015年5期。

³⁴⁰ 张睿祥等：《两周组玉佩形制的嬗变及相关问题》，《中原文物》2015年5期。

³⁴¹ 刘凌云：《西周玉器的斜刀技法实验考古研究》，《南方文物》2015年4期。

³⁴² 张晶雨：《春秋时期玉器所见制度史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1期。

艺判断可能为商代遗物³⁴³。

在《葫芦岛市博物馆藏东大杖子墓地出土器物研究》一文中，作者首先对馆藏的东大杖子墓地器物进行介绍，具体按照质地分为铜器、玉器和金器。在此基础上，作者对这批器物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在玉器方面，认为馆藏的玉环从其材质来看，与东大杖子墓地历年发掘出土的器物基本类似，只是相对于 M40、M47 出土的典型玛瑙环形体略小，制作也较为粗糙一些，可以看作是同一时代等级相对较低的产品³⁴⁴。

张登毅和李延祥在《山西出土先秦绿松石制品初步研究》一文中，通过对山西出土先秦绿松石制品进行分区分期的类型学研究，对绿松石这个特殊的文明载体在山西的滥觞、留滞、嬗变及衍生的类型进行了探讨。同时，对绿松石制品的文化寓意及其所反应的先秦人的审美意念进行了初步研究。关于绿松石原料的来源这一问题，作者认为不排除为陕西洛南这一带的可能性³⁴⁵。

3. 秦汉至隋唐

耿庆刚在《试论汉代玉器的改制现象》中一开始便介绍了玉器改制的定义是将旧玉或残玉改制成新的玉器。接下来认为改制的对象以玉璧类为大宗，另有少量玉具剑和先秦古玉，改制后的玉器以玉衣、玉覆面、镶玉棺等葬玉为主。在改制玉器的使用范围上，作者指出改制玉器限于皇室、王侯及高级贵族墓葬中。最后作者以改制为媒介，将考古发现玉器分为依次下降的三个层级：帝陵陵园内发现的皇后之印、玉杯、玉舞人、玉辟邪等玉器；玉璧、玉具剑等日常使用的礼玉、装饰用玉；玉衣、玉覆面等葬玉³⁴⁶。

梁书台在《记刘胜金缕玉衣的第三次修复》中对刘胜金缕玉衣的第三次修复工艺及过程做了简要介绍。本次玉衣修复是在经过对玉衣本体和病害的大量研究后进行的，修复过程中，根据不同病害的特点，采用了不同的技术手段和方法。断裂玉片的粘接则根据玉片的薄厚不同采用了不同的粘接方法。经过两个月的工作，完成了此次修复³⁴⁷。

刘思哲在《隋炀帝墓发现的十三环蹀躞金玉带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将隋炀帝墓所出的十三环蹀躞金玉带与已知北周时期的玉带进行对比，认为墓中出土的十三环蹀躞金玉带是北周时期制作的³⁴⁸。

田卫丽在《唐代玉带銙述略——以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玉带銙为中心》中，对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十副唐代玉带銙进行了介绍，并从其玉石原料、定名、样式、形制分类、纹饰题材、制作技法及使用制度等方面加以考略³⁴⁹。

4. 辽宋至明清

徐颖在《魂归杭州——从鲜于枢墓出土文物探寻元代杭州艺术文化史》中，首先对元代书法家鲜于枢墓出土的 14 件器物进行介绍，接下来进一步探讨了杭州元代艺术圈形成的背景与过程，及以此

³⁴³ 叶晓红等：《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月河一号春秋墓出土玉器阴刻技术的微痕分析》，《南方文物》2015 年 4 期。

³⁴⁴ 成璟塘等：《葫芦岛市博物馆藏东大杖子墓地出土器物研究》，《文物》2015 年 11 期。

³⁴⁵ 张登毅等：《山西出土先秦绿松石制品初步研究》，《华夏考古》2015 年 4 期。

³⁴⁶ 耿庆刚：《试论汉代玉器的改制现象》，《文博》2015 年 6 期。

³⁴⁷ 梁书台：《记刘胜金缕玉衣的第三次修复》，《文物春秋》2015 年 6 期。

³⁴⁸ 刘思哲：《隋炀帝墓发现的十三环蹀躞金玉带及相关问题研究》，《考古与文物》2015 年 5 期。

³⁴⁹ 田卫丽：《唐代玉带銙述略——以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玉带銙为中心》，《文物世界》2015 年 4 期。

为基础产生的艺术品品评鉴赏之风和元代书法的“复古”运动。鲜于枢墓中出土的玉器包括元白玉笔端饰、元白玉连珠环及西晋玉剑璫和唐玉剑格³⁵⁰。

（二）神话学研究

在《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一书中，叶舒宪主要分为三大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是理论与方法，包括第一至三章节。介绍了神话学的跨学科范式及四重证据法，并用四重证据法重建中国文化观。第二部分是文明起源的玉器时代，包括第四至十一章节。这一部分以玉器为核心，作者认为不仅中国文明起源与玉器相关，并且认为各大文明的起源和玉器之间均有联系，倡导玉器时代和玉石之路研究的国际大视野，解析和归纳世界五大文明发生期的玉石神话与信仰的共性。除此之外，还提出了华夏文明的原始国教为玉教等一系列观点。第三部分为夏商周秦神话历史，包括第十二至二十章。按照朝代顺序依次探讨历史叙事与神话叙事浑融不分的情况，以出土实物为证据，分别检验自古未能解决的神话传说之真伪性质。第二十一章节为本书的总结与展望³⁵¹。

（三）玉器鉴赏



图八 旧玉雕九螭十二章纹圭

《古玉发微》一书由苏州博物馆与苏州文物商店协作编著，精心挑选数百件典型玉器藏品，由杨震华女士详细解释其时代特征与文化内涵，并选取多家博物馆玉器藏品为佐证，以期见微知著，使观者能够基本掌握玉器鉴赏的要领。同时，本书还将玉器鉴定心得和研究理论加以传承发扬，启迪下一代工作者。本书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为器物图版及介绍，展示玉器均十分精美。比如旧玉雕九螭十二章纹圭（图八）。玉质为和田玉，色泽青灰，带有黑褐色的沁斑。圭、璧重叠连体，圭在壁上，顶部镂雕一盘踞之龙，底部浮雕寿山福海纹，圭面浅浮雕十二章纹，璧面余部高浮雕八条螭龙，璧之背面中部有圆形开光。第二部分为相关研究文章三篇³⁵²。

（四）其他相关研究

在《近红外光谱结合化学计量学无损鉴定软玉产地的可行性研究》一文中，谷岸等应用近红外光谱结合化学计量学无损检测新技术，对和田、青海、俄罗斯、韩国等产地的软玉样品进行了判别分析。结果表明，光钎近红外光谱仪应用于玉器文物的材料产地鉴定是可行的³⁵³。

沁色是出土玉器的常见重要特征，出土玉器受沁作用和沁色会影响玉器玉质的宝石学特征，从而会影响对玉器玉质的正确鉴定。朱勤文、蔡青等在《浅析出土软玉质玉器的沁对玉质鉴定的影响》一文中，以4处软玉质出土玉器特征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根据出土玉器受沁特征的研究分析，初步探索

³⁵⁰ 杭州博物馆：《杭州博物馆论丛（2015）》，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

³⁵¹ 叶舒宪编：《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³⁵² 苏州博物馆、苏州文物商店：《古玉发微》，文物出版社，2015年。

³⁵³ 谷岸等：《近红外光谱结合化学计量学无损鉴定软玉产地的可行性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5年3期。

了受沁作用和沁色对玉器颜色、光泽、透明度、孔隙度、密度、硬度等宝石学特征的影响和受沁后玉石成分的变化规律，以期为出土玉器的正确鉴定和仿古玉器伪沁的辨析提供参考和帮助。文章研究结果显示：1) 受沁对出土玉器颜色的影响规律是，受沁程度不同则影响表观颜色的程度不同，玉器受沁程度越严重，对玉器表观颜色的改变越大，一般是颜色变深；2) 受沁对出土玉器光泽和透明度的影响规律是，受沁越严重则玉器的光泽和透明度越差，从未受沁—轻度—中度—较重—重度受沁，光泽的变化一般呈现玻璃光泽—亚玻璃光泽—油脂光泽—蜡状光泽—土状光泽的变化，透明度的变化一般呈现透明—亚透明—半透明—不透明的变化；3) 受沁对出土玉器的密度、孔隙度和硬度的影响规律是，受沁越重孔隙度增大，相应的密度和硬度降低，如严重受沁的透闪石质玉器，其摩氏硬度一般小于 5.5，最低可到 4，最高可到 6；4) 受沁对出土玉器成分的影响规律是主要矿物组成一般不变化，玉石种类也不变化，只是有的玉器局部可产生化学元素种类和含量的变化³⁵⁴。

三 展览及图录

《秦韵——大堡子山出土文物精粹》中展示了大量大堡子山出土的精美文物，包括铜器、金器、玉器等，值得一提的是还收录了大堡子山现已追回的 32 件金饰品。其中玉器共 14 件（组），器类包括琮、玦、璜、戈、柄形器等³⁵⁵。



图九 大堡子山出土的弦纹玉玦（左）和束帛形玉饰（右）

北京市大葆台汉墓经考古发掘，共发现两座大型汉墓，在清理一号墓南部封土时，发现一座破坏较为严重的金代建筑遗址。发掘二号墓时，又在两墓之间清理了一座近代砖井，《大葆台汉墓文物》中除汉墓中出土遗物外，还遴选了一部分金代遗物予以收录。出土文物按照材质分类，包括陶瓷器、铜器、铁器、玉器骨角牙器、漆木器、纺织品等。对于复合材质的器物，按其主要功用来归类。玉器共 23 件（组），种类丰富，造型精美。比如玉舞人，质地白玉，使用透雕镂空技法制成，为双面阴刻舞人的形象，展现了汉代舞人佩“长袖”和“细腰”的特点。上下各有一孔，应为组玉佩中的一件³⁵⁶。

“穆穆曾侯——全国十大考古发现：郭家庙墓地特展”全面展示了 2002 年和 2014 年发掘的枣阳

³⁵⁴ 朱勤文等：《浅析出土软玉质玉器的沁对玉质鉴定的影响》，《宝石和宝石学杂志》2015 年 6 期。

³⁵⁵ 国家文物局：《秦韵——大堡子山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2015 年。

³⁵⁶ 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大葆台汉墓文物》，文物出版社，2015 年。



图一〇 郭家庙墓地出土的羽人形玉佩

郭家庙曾国墓地的考古成果，主要分为三个单元进行介绍，分别是郭家庙墓区、曹门湾墓区和曾侯墓 M1。郭家庙墓地出土器物以青铜器、陶器和玉器为主。郭家庙墓区 20 座墓中共出土玉器 229 件，分为礼器、佩饰、葬玉和杂器四类，质地有青玉、青白玉、羊脂玉等，一般采用琢磨、雕刻、钻孔等方法进行制作。曹门湾墓区出土玉器初步整理有 93 件（组），分类与质地同于郭家庙墓区，其中出土的玉腰带饰是在湖北的首次发现³⁵⁷。

“温·婉——中国古代女性文物大展”是一个由女性策展人来策划的“女性”展览，在南京博物院展出。此次展览既展示传统女性的生活与艺术，又体现当代知识女性的聪慧与才智。通过展览，我们得以回顾漫漫历史长路，思考中国女性是怎样坚定执着地一路走来。本次展览共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为：形塑女性、女仕日常、才媛集艺和笔端容功。在第二部分女仕日常中，主要展示了女性的生活用品，包括金镶玉嵌宝金背木梳、嵌白玉葫芦金耳环、嵌白玉人金耳环、白玉绞丝镯及多宝挂饰等一系列女性装饰物。其中多宝挂饰由 1 件白玉工字佩、3 件玛瑙管饰、1 件琉璃管饰、3 件琉璃虎饰、1 件琉璃龟饰、1 件紫晶葫芦饰、1 件琉璃蟾蜍饰及 2 件琉璃珠，计 13 件不同质地的串饰组成。每件串饰皆有极其细小的穿孔³⁵⁸。



图一一 中国古代女性文物大展中展出的金镶玉嵌宝金背木梳（左）和多宝挂饰（右）

《上海出土文物精品选》中共选取 200 余件上海出土文物精品，按照时间顺序，以遗址为单位对



图一二 明代潘允端夫妇墓出土白玉莲鹅纹带饰

文物进行介绍并配彩图。文物包括玉器、石器、陶瓷器、铜器、木器等。玉器自新石器时代至明代均有出土，数量较大，且形制和纹饰多样。明代潘允端夫妇墓位于上海徐汇区龙华，该墓出土了白玉莲鹅纹带饰（一对）（图一二）、白玉龙首蟠螭带钩等玉器³⁵⁹。

董干在《春风又绿江南岸——馆藏春意蕴玉器选介》中，以杭州博物馆馆藏玉器为对象，通过对宋、元、明、清各时期玉器的梳理，探讨玉器所表现出的自然物候，分析玉器所传达的文化信息³⁶⁰。

³⁵⁷ 长江文明馆等：《穆穆曾侯：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文物出版社，2015 年

³⁵⁸ 南京博物院：《温·婉——中国古代女性文物大展》，译林出版社，2015 年。

³⁵⁹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上海市文物局：《上海出土文物精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³⁶⁰ 杭州博物馆：《杭州博物馆论丛（2015）》，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

玉器考古文献汇编（2016年1月-6月）

原载《玉器考古通讯》总第八期

刘思源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一 考古发现

（一）新石器时代

1. 东北地区

2010年5月20日至28日，葫芦岛市博物馆会同连山区文管所，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指导下对连山区金星镇原种场场内的两座汉魏墓葬进行了抢救发掘。两座墓应为同一时期，共出遗物62件，包括1件玉片，形状为扁平片，不规则，黄褐色外皮，黄绿色肉，长3.1、宽1.8、厚0.6厘米³⁶¹。

2015年7月-10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考古学系联合对乃林皋遗址进行了勘探、调查和发掘工作。本次工作发现房址、灰坑（窖穴）及壕沟等遗迹。出土遗物比较丰富，种类包括石器、骨器、陶器、玉器和青铜器等。其中石器数量最多，玉器仅有2件，分别是圆形权杖首和残佩饰。青铜器1件，为青铜小刀。从发现的房址建筑模式和遗物来看，该遗址属于典型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土台式聚落，在赤峰地区发现较多³⁶²。

2015年6-8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敖汉旗博物馆为配合基本建设对热水汤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遗址时代大致与夏家店上层文化龙头山类型相当。本次工作清理房址9座、灰坑64座、墓葬3座，出土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各类器物200余件。

2015年6-12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多伦县文物局等联合对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小王力沟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共清理2座墓葬，二号墓较为完整，出土遗物极为丰富，包括金、银、铜、铁、瓷、玉、玻璃、琥珀等大量珍贵文物。发掘人员初步判断该墓葬主人为辽大贵妃，但还未有最终结论³⁶³。

2. 西北地区

韩家圪旦地点位于陕西神木石峁城址内城中部偏东的一处东西向“舌形”山峁，与皇城台隔沟相望，是一处重要的居址与墓葬交错分布区域，先后承担过居址和墓地两种聚落功能。该地点早期为居址，房屋以高低错落的窑洞为主要建筑形式；晚期成为墓地，墓葬形制包括竖穴土坑墓、石棺墓和偏洞室墓，尤以竖穴土坑墓居多。个别墓葬规模较大。虽多遭盗掘，但仍保留重要随葬品。结合与石峁城址的核心区域——皇城台隔沟相望的特殊地理位置，这些现象暗示着韩家圪旦地点应是一处重要的

³⁶¹ 孙建军等：《辽宁省葫芦岛市金星汉魏墓葬发掘简报》，《北方文物》2016年1期。

³⁶² 党郁：《2015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发现综述》，《草原文物》2016年1期。

³⁶³ 党郁：《2015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发现综述》，《草原文物》2016年1期。

贵族墓地。韩家圪旦地点 2014 年度出土的遗物以陶器为大宗，其次为石器和骨器，还发现个别蚌饰、海贝、鸵鸟蛋壳、绿松石饰及玉器³⁶⁴。

石擦擦山遗址位于陕西省佳县石擦擦山及其附近区域，距离黄河约 15 公里，2003 年 7 至 10 月对此遗址做了考古发掘。本次工作揭露遗址面积约 900 平方米，清理灰坑、窖穴 93 座、房址 18 座、陶窑 1 座，以及用石块包崖镶坡所筑的内外城墙、宽大的护城壕和保存较好的石砌护坡等遗迹。出土陶器、石玉器、骨器等遗物 200 多件。玉环 1 件，残，淡绿色。断面宽 1.5、高 3.4 厘米³⁶⁵。

2008 年，为配合峡沟水库建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哈密市文物局联合组成考古工作队对峡沟遗址淹没区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墓地属于早期铁器时代。该墓地的发现尤其是积石墓的发掘，为认识东天山北麓古代游牧民族考古学文化面貌及其分布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资料。该墓地出土器物较少，共 10 件。其中绿松石管 1 件 M6:4，直径 0.45、孔径 0.2、厚 0.25 厘米，对钻成孔³⁶⁶。

尕马台遗址位于青海省贵南县拉乙亥乡昂索村南 500 米处，遗址地处共和盆地黄河谷地内，台地平坦。周边有高渠顶遗址和宗日遗址。1977 年 4 月，青海省文化局、青海省考古队、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单位共同举办了“龙羊峡水电站工程亦工亦农考古短训班”。7 月至 9 月，短训班成员分为五组，对尕马台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该遗址共开探方 65 个，揭露面积 1626 平方米。发掘出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存 1 处，遗址中发现居住面 1 处，烧灶面 14 处，瓮棺葬 18 座。在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之上叠压有齐家文化墓地，共发掘齐家文化竖穴土坑墓 43 座，瓮棺葬 1 座。出土遗物十分丰富，包括陶器、石器、骨器等。在齐家文化墓葬中，还出土玉璜 1 件、绿松石珠 188 枚（图一）³⁶⁷。



图一 尕马台遗址出土的齐家文化装饰品（绿松石珠及骨珠）

3. 华中地区

2013 年，位于叶家山墓地中部的一座中型墓葬 M107 被全面揭露清理，该墓所出的器物特征与其他墓葬器物特征基本一致，但铜容器上的铭文和族徽相异。墓葬出土铜、陶、玉、漆木等质地器物 110

³⁶⁴ 孙周勇等：《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韩家圪旦地点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6 年 4 期。

³⁶⁵ 张天恩等：《陕西佳县石擦擦山遗址龙山遗存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6 年 4 期。

³⁶⁶ 张玉忠等：《2008 年新疆伊吾峡沟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6 年 1 期。

³⁶⁷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贵南尕马台》，科学出版社，2016 年。

余套。其中玉器共 19 件（套）。器类主要有璧、璇玑、管、笄、挖耳勺、戈形佩饰和鱼、龙、燕、蝉、兔、蚕等动物形状佩饰等。出土璇玑 1 件，最大径 5.8、穿孔径 2.2、厚 0.35 厘米，重 12 克。出于椁内东北部。青玉，半透明，受沁有褐、灰白色斑。保存完整。璧形，外缘有三个间距相等、朝同一方向旋转的牙，中部有一圆形穿孔。素面。璧 1 件，龙形。直径 4.4-4.8、肉宽 1.85、肉厚 0.5、好径约 1.5 厘米。重 20.5 克。出于墓主胸前左侧。青玉，半透明，土沁有灰色斑点。保存完整。圆形，略厚，两面平整。整玉雕凿成夔龙形，体卷曲呈圆形，尖尾伸进嘴里，中部透雕一穿孔。两面均饰重环纹和卷云纹³⁶⁸。

2014 年 12 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在盘龙城杨家嘴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工作，清理了 M26 和 H14 两处遗迹，时间大致为二里岗上层较晚阶段其中 M26 出土铜器、玉器、陶器和漆器，共计 14 件。玉柄形器残，仅见 5 件残片，主要分布于棺与二层台之间，有一块残片置于墓主左腿骨东侧。这些碎片之间无法拼合，说明这件玉器在下葬前已经不是完整器，在下葬时仅部分埋入墓葬³⁶⁹。

2014 年 11 月，为推进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再次启动了石家河遗址考古工作。此次发掘在石家河城址结构与布局、印信台遗址祭祀场所等方面成果突出，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玉器的再次面世，更是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在谭家岭遗址东部发现了 5 座后石家河玉器的瓮棺葬，玉器以玉蝉、玉管、玉珠、玉虎数量最多，其中双人连体头像玉块、虎座双鹰玉饰、玉牌饰、虎形玉冠饰、玉虎、玉鹰、玉钺等为首次发现。瓮棺中还发现有将剩余的玉料与玉器同葬的现象。多数玉器表面都有精美的线刻、勾连图案和复杂的透雕和细如针尖的钻孔，其普遍使用的圆雕、透雕、减地阳刻、浅浮雕线刻等工艺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³⁷⁰。

2011 年 7 月至 9 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对简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揭露了一处两汉时期的聚落。简营遗址位于河南省淅川县下集镇简营村，处于淅水东岸的二级台地上，在丹江水库淹没区内。遗址出土遗物丰富，包括陶器、铜器、玉器等。其中玉器仅有 1 件。玉钺，质地青白玉，玉质较杂，平面整体近圆角长方形，肩部和底部微残，上部饰一个圆孔，为对穿磨制而成，双刃磨光。长 12.5、宽 8.6、厚 1.2 厘米³⁷¹。

4. 华东地区

神墩遗址位于江苏省南部、太湖西部的溧阳市，现为平原地带高出四周地面 1-2 米的不太规整的长条形土墩，东西约 150 米，南北约 200 米，总面积近 3 万平方米。为了全面了解太湖西部的马家浜文化整体面貌，建立完整的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的文化序列，确定太湖文化区和宁镇文化区的文化分界，动态地把握马家浜文化的变迁过程，2004-2006 年，南京博物院、常州博物馆、溧阳市文化局（现溧阳市文化广电体育局）联合组成溧阳神墩遗址考古队对神墩遗址进行了三次主动性科学发掘。

³⁶⁸ 曾令斌等：《湖北随州叶家山 M107 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6 年 3 期。

³⁶⁹ 黄玉洪等：《2014 年盘龙城杨家嘴遗址 M26、H14 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6 年 2 期。

³⁷⁰ 刘辉等：《石家河遗址 2015 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江汉考古》2016 年 1 期。

³⁷¹ 马晓姣等：《河南淅川简营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6 年 1 期。

三次发掘累计发掘面积 1002.5 平方米。发现 1 处马家浜文化时期相对完整的氏族公共墓地，共清理马家浜文化时期墓葬 252 座、瓮棺葬 16 座、房址 10 座、灰坑 90 个、灰沟 1 条。崧泽—良渚文化时期墓葬 9 座，夏商时期灰坑 12 个、灰沟 1 条。出土器物丰富，按照质地可分为陶器、石器、玉器等。如马家浜文化 M188 内出土有玉璜、玉管等（图二）³⁷²。



图二 神墩遗址 M188 内出土的玉璜（左）和玉管（右）

2010 年—2013 年，南京博物院、泗洪县博物馆对江苏省泗洪县梅花镇顺山集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 2750 平方米。该遗址年代距今 8500—7500 年，新石器时代遗存可分为三期，其中第一、二期文化遗存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现将其称之为“顺山集文化”，三期文化遗存与长江下游的跨湖桥文化关系密切。顺山集遗址总面积 17.5 万平方米，为淮河下游地区同时期面积最大的环壕聚落遗址。一至三期文化遗存中均有玉器出土。第一期出土玉管 1 件，黑白斑泛淡绿色。一侧残，双面管钻，内壁留有台痕，器表打磨光滑。直径 2.9—3.1、钻孔径 2—2.2、高 5.6—5.8 厘米。绿松石 1 件，淡绿色。两端均残，整体扁平近梯形，器表经磨光，局部侵蚀严重。残宽 0.7—1.1、残高 2.3 厘米³⁷³。

5. 西南地区

2010 年 4 月至 6 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青川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对四川省青川县乔庄镇的郝家坪战国墓葬群进行发掘，共清理 34 座墓葬，其中 26 座墓葬出土各种随葬器物（或痕迹）90 余件（组），按照质地可分为陶器、漆器、铜器、玛瑙器、木器等。玛瑙手镯共 1 件，通体半透明，横断面呈菱形。外径 6.9、内径 5、横断面最厚处 1.1 厘米³⁷⁴。

（二）夏商周时期

1. 西北地区

石鼓山商周墓地位于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石鼓镇石嘴头村四。2012 年 3—6 月，当地村民在平整住宅用地时，前后发现三批铜器。石鼓山考古队对其进行了发掘，并确认这些铜器出自商周时期墓葬。随后，又发现商周时期墓葬 11 座及其他时期墓葬 46 座。依据墓葬分布情况，商周墓地可以分为北区和西南区两区。2013 年下半年至 2014 年初，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宝鸡市渭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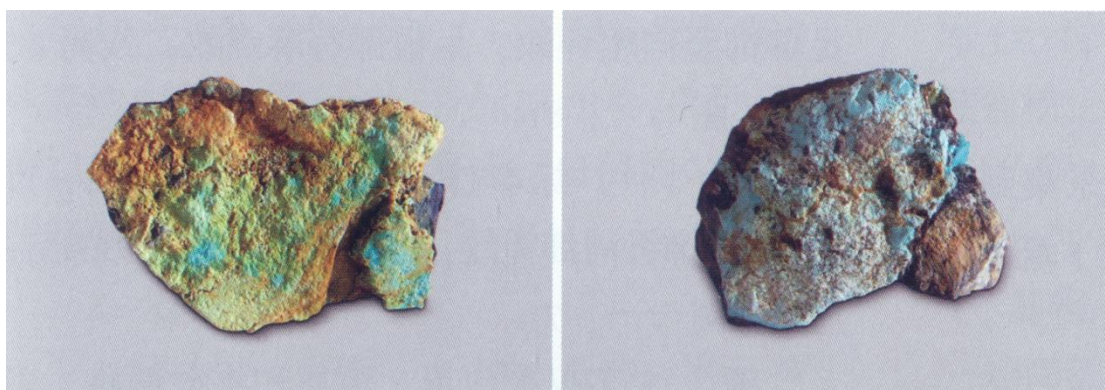
³⁷² 南京博物院等：《溧阳神墩》，文物出版社，2016 年。

³⁷³ 南京博物院等：《顺山集：泗洪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6 年。

³⁷⁴ 孙智彬等：《四川青川县郝家坪战国墓葬群 2010 年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6 年 3 期。

区博物馆组建的石鼓山考古队对 11 座商周墓葬（北区 M4-M9，西南区 M12、M18-M21）进行了考古发掘，包括中型墓 2 座（M4、M9）、小型墓 9 座。其中 M4 出土器物丰富，主要有铜器、陶器、海贝、蚌器、彩绘漆器、玉石器，另有动物骨骼，多放置于壁龛。项饰 1 组（M4:1）。共 79 颗，出土于棺内，饰于墓主的项、胸部位，体不大，质地有别，均有穿孔，当是以物串系佩于项、胸。按质地可分为青玉、红玛瑙、绿松石等数种；按形状可分为长方形、圆柱状、圆三角状、环状等数种³⁷⁵。

2010 年，李延祥等在进行古矿业考察时初步认定石锤为青铜时代采矿工具，陕西洛南河口遗址为开采绿松石的古矿遗址。矿洞中发现了丰富的遗物，为先秦时期的陶器、石器、木质遗物、绿松石块体（图三）、动物骨器等，还有部分唐宋遗物。矿洞内的绿松石多呈线状分布，采集到的绿松石多为片状，较薄，一般厚度小于 5 毫米。颜色为蓝色、绿色³⁷⁶。



图三 洛南河口遗址采集的绿松石料

2012 年 10-11 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马鬃山玉矿遗址 2011 年发掘地点上继续进行发掘工作，发掘面积 700 平方米，遗迹单位 49 处，其中灰坑 38 个、房址 9 座、石台基遗迹 2 处，出土遗物千余件。遗物按照质地可分为陶器、石器、铜器、玉料等。发掘者初步判定，2012 年发掘区域为选料作坊区³⁷⁷。

2. 华北地区

2012-2014 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长治市文物旅游局对西南呈中心幼儿园建设区域进行了考古勘察，探明墓葬 75 座。随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学校旧址内的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墓葬 15 座，其中大型墓葬 1 座、小型墓葬 14 座。出土遗物主要有陶器、铜器、玉石器和海贝四大类，其中玉石器数量较多，但质地较差。以石磬残块为主，还有玉片饰（图四）等³⁷⁸。

3. 华中地区

³⁷⁵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 M4 发掘简报》，《文物》2016 年 1 期。

³⁷⁶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等：《陕西洛南河口绿松石矿遗址调查报告》，《考古与文物》2016 年 3 期。

³⁷⁷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甘肃肃北县马鬃山玉矿遗址 2012 年发掘简报》，《考古》2016 年 1 期。

³⁷⁸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长子县西南呈西周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16 年 3 期。



图四 山西西南呈西周墓地 M11 内出土的玉片饰

1991 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其他单位对天湖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商周时期墓葬 24 座。其中 M57 保存较好,是商代晚期墓葬,出土随葬品较为丰富。M57 随葬器物分为铜器、玉器、陶器、漆木器 4 类,共计 34 件。其中铜礼器、陶器多集中放置于墓室北部,玉器、铜戈放置于墓主胸部、腰部,铜工具、兵器放置于墓主两侧,墓主脚部也放置有少量陶器和工具,漆木器放置于墓主人头部³⁷⁹。

2013 年 10 月至 2014 年 1 月,为探索河南荥阳官庄城址南侧大城的布局,郑州大学考古学系等单位对大城西北部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其中周代遗物以陶器为大宗,另有部分骨器和蚌器,少量石器、铜器和玉器等³⁸⁰。

2007 年 10 月至 2008 年 5 月,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等单位对河南焦作市温县武德镇的徐堡遗址进行发掘,共清理了 9 座两周时期的墓葬,出土陶器、玉器、贝饰 13 件。其中有 2 件(套)玉器,分别为玉玦和玉片。玉玦,残,一端磨制光滑,另一端残。厚 0.3、肉径 1 厘米。玉片,共 6 片,均残,其中有两片的一端磨制光滑,另一端残。5 片玉片上均有阴线刻画的弧线纹。厚均为 0.3、肉径 1 厘米³⁸¹。

2010 年 10 月至 2011 年 6 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项目的开展,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南阳市淅川县熊家岭墓地进行了发掘,共清理战国墓 67 座。其中 M24 出土各类器物 70 余件,为战国中期早段的小型贵族墓葬。M24 内出土随葬器物共 73 件。依质地可分为陶、铜、玉、骨和贝等五类。玉器共有 4 件。有璧、璜形饰与刀形饰。其中璧 2 件。黄白色滑石质,素面。标本 M24:22,出土时少部分残缺。青玉,玉质较差,近石质,不透明。豆青色,整体受沁呈灰白色或有大面积的墨斑。器形体较薄,断面近长方形,中孔为单面钻。直径 9.8、好径 3.4、厚 0.1 厘米。标本 M24:23,青玉,玉质较粗,不透明。深豆青色,大部分受沁呈灰白色或黄褐色。器形体较薄。断面近长方形,中孔为单面钻。直径 4.2、好径 1.4、厚 0.3 厘米。璜 1 件。标本 M24:32,青玉,玉质较细,半透明。浅豆青色,受沁处有灰白斑,整体呈半圆形,断面近梯形,两端各有一双面钻细圆穿。长 5、宽 0.6、厚 0.5 厘米。觚 1 件。标本 M24:27,青玉,玉质细腻,半透明,豆青色。平面呈刀形,断面近椭圆形,接近刀背中部和末端处各有 1 个单面钻穿孔。长 6.9、最宽处 1.4、厚 0.5 厘米³⁸²。

1991 年 11 月至 1992 年 1 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发掘了一批东周时期的墓葬。该墓地位于洛阳市西工区西小屯南、东周王城遗址中部偏北处,北距汉河南县城北城墙不远。其中有三座墓出土的青

³⁷⁹ 张志清等:《河南罗山天湖商周墓地 M57 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6 年 2 期。

³⁸⁰ 韩国河等:《河南荥阳官庄遗址 2013 年度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6 年 3 期。

³⁸¹ 孙新民等:《河南温县徐堡遗址两周墓葬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6 年 2 期。

³⁸² 杨海青等:《河南淅川熊家岭墓地 M24 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6 年 2 期。

铜器比较重要，分别是 C1M3494、C1M3490、C1M3433。C1M3494 共随葬 28 件（组）器物，包括铜器、玉器、石器，其中有玉片状饰 1 组。C1M3490 内出土器物共 26 件（组），有青铜器、玉器及骨贝等，玉器出土 3 件，分别是玉环、玉璧、玉片状器。C1M3422 内随葬 16 件（组）器物，包括铜器 12 件，玉器 4 件（组）³⁸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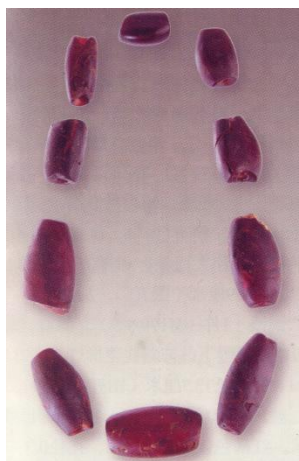
图五 山东淄博市范家墓地 M91 内出土的组佩饰

4. 华东地区

2012 年 9 月至 2013 年 1 月，为配合淄江小学的建设，临淄区文物局对施工中发现的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了 3 座战国时期的大型殉人陪葬墓。M91 内残存遗物 466 件（组），有陶器、铜器、玉器、水晶玛瑙器、石器、骨器、象牙器和金器等。其中玉器共 4 件，包括琮、口含、组佩饰（图五）。M174 内随葬铜器、玉器、水晶玛瑙器、石器 2338 件，其中有玉瑗 1 件，淡青色，半透明。扁平椭圆形。M175 内出土陶器、石器、铜器、玛瑙器等 1287 件³⁸⁴。

5. 西南地区

2012 年 11 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联合保山市博物馆和昌宁县文物管理所等单位对大甸山墓地进行正式发掘，实际发掘面积达 4300 平方米，出土随葬品 268 件（组），包括铜器、陶器、铁器、琥珀珠（图六）等³⁸⁵。



图六 大甸山墓地内出土的琥珀珠

（三）秦汉至隋唐

1. 西北地区

³⁸³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洛阳市西工区西小屯村春秋墓葬》，《考古》2016 年 4 期。

³⁸⁴ 临淄区文物局：《山东淄博市临淄区范家墓地战国墓》，《考古》2016 年 2 期。

³⁸⁵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昌宁县大甸山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16 年 1 期。

1991年8月，甘肃省环县县城刘家湾台地有居民修庄挖地基时发现古墓，随后向县博物馆报告。县博物馆立即组织专业人员赶赴现场，经勘查，此处有两座古墓。本次共清理出随葬器物86件，其中陶器13件，铁器53件，铜器6件，玉石器8件，钱币6枚。其中玉蝉1件，白色，寥寥几刀，已成蝉形，玉质较次，整体扁形，稍加雕刻成型。长5、宽3.2厘米³⁸⁶。

2003年11月至2004年8月，为配合西北大学长安新校区的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西北大学考古学系联合组成考古队，对建设区域内勘探发现的120余座汉、唐古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该墓曾遭多次盗扰，随葬器物出土共计124件（组），有陶俑、白瓷罐、铜币、组玉佩、青石墓志等。其中组玉佩2组。形制大小基本相同。每组由5件玉佩、若干水晶串珠和1对玉坠组成，出土时位于男性墓主腰间两侧。玉料颜色白中泛黄，半透明，质地细腻温润，表面磨制光滑。报告介绍了其中一组（CXD M48:111）（图七），该组玉佩包括：珩2件。形制完全相同，云朵形状，一大一小。顶端有一个穿孔，下端有三个穿孔，每个穿孔都镶有鎏金铜卡扣。卡扣剖面呈“U”字形；铆接处两侧平面呈圆形，外侧饰一周极细小的联珠纹，内镶一小片白色琉璃片。大珩高4.4、宽8.8、厚0.2厘米；小珩高2.9、宽5.4、厚0.21厘米。璜2件。形制大小完全相同。半圆形，一端厚一端薄，上下两端各有一个穿孔，皆镶鎏金铜卡扣。高4.6、宽2.2、肉径4.6、好径1.8、厚0.09-0.19厘米。冲牙1件。形似“山”字形，顶部造型与珩顶部相近，顶端正中有一个穿孔。高4.7、宽10.3、厚0.31厘米。坠2枚。形制大小完全相同。椭球体，底部较平，顶端有一个穿孔。上覆六瓣花萼形鎏金铜托。玉色白中泛青，温润光滑。通高2.5、最大直径1.7厘米。水晶串珠176枚。白色天然水晶制成，球形，中间穿孔。直径0.8-1.4厘米。根据出土时的情形观察，越靠近玉坠的串珠直径越大。组玉佩的各个组件原本可能由丝线穿缀成型，丝线腐朽后，组件散落于地，已无法得知其原始的排列组合情况³⁸⁷。



图七 唐刘智夫妇墓内出土的组玉佩

2. 华中地区

2010年11月至2011年5月，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家单位联合对淅川全寨子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掘各类遗迹152处，多数为墓葬，仅1座灰坑。出土器物共700余件，按质地可分为陶、铜、铁、铅、玉石、瓷等。目前21座汉代砖室墓的资料已经整理完毕，但并未出土玉器³⁸⁸。

淅川全寨子墓地位于南阳市淅川县盛湾镇河扒村，是一处以汉代墓葬为主的墓地。2010年10月至2011年5月，河南省考古研究院、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对该墓地进行了发掘。此次

³⁸⁶ 环县博物馆：《甘肃省环县刘家湾汉墓清理报告》，《考古与文物》2016年2期。

³⁸⁷ 刘呆运等：《陕西西安唐刘智夫妇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6年3期。

³⁸⁸ 李翼等：《河南淅川全寨子墓地东汉墓的发掘》，《中原文物》2016年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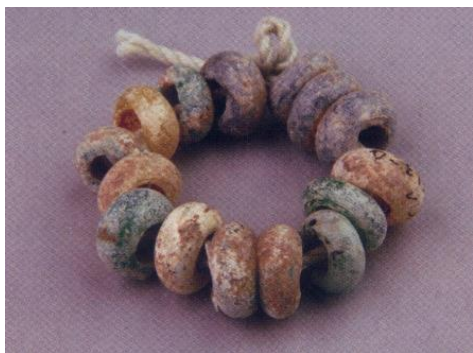
共发掘墓葬 151 座、灰坑 1 座。其中战国秦汉墓葬 140 座、明清墓 11 座、二里头时期灰坑 1 座，出土陶器、铜器、铁器、玉石器、漆木器等各类随葬器物 696 件及部分铜钱。《浙川全寨子》报告中以墓葬为主要单位，系统介绍了 151 座墓葬和 1 座灰坑的考古发掘成果。在战国秦汉时期的 M24 中出土 1 件玉璧，青玉，半透明，局部有褐色沁斑，有内外廓，两面均饰隆起的谷纹，谷纹间可以看到菱格纹，厚薄均匀。直径 14.9、好径 4.3、厚 0.4、内外郭宽 0.5 厘米³⁸⁹。

2007-2009 年武汉大学考古系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马岭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后冈一期文化至清代的遗存。汉代聚落是马岭遗址的主要遗存遗址，遗址及周边有一定数量的汉墓。2010 年 7-8 月，武汉大学考古系发掘了马岭汉墓群，共发掘 33 座砖室墓，出土器物有陶器、铜器、铜钱、玉器等。其中 M11 内出土玉串珠 1 组（图八），包括 16 枚玉珠，青绿色或黄褐色，环状珠，大小不等³⁹⁰。

（四）宋辽至明清

1. 华北地区

2013 年 3-5 月，为了配合北京市丽泽金融商务区园区规划绿地工程，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墓地进行正式发掘。此次发掘面积为 2350 平方米，共清理辽代墓葬 2 座，明、清时期墓葬 253 座。出土陶器、瓷器、金银器、铜器、玉器等随葬物品 1000 余件（不计铜钱）。其中 M239 内出土玉戒指 1 件，圆形，戒面凸起，呈长条弧状。直径 2.5、内径 1.8 厘米（图九）³⁹¹。



图八 马岭汉墓 M11 内出土的玉串珠



图九 丽泽墓地内出土的玉戒指

2. 华中地区

2005 年 11 月 21 日，郢靖王墓主墓区域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至 2006 年 1 月 9 日结束。出土文物十分丰富，为客观全面反映原始资料，《郢靖王墓》报告中将出土物按照前室、中室、后室、配室等不同区域加以区分。器物种类有铜器、玉器、金器、铁器、漆木器等。其中后室宝床中部出土玉腰带，出土时革带的皮质已经腐朽，玉饰件及金属配饰保存较好。玉饰件共 20 片，皆为青白玉，有油脂感，局部表面泛白，有侵蚀。器型有长条方形、长条形、桃形和一端呈圆弧状的长方形的玉版³⁹²。

³⁸⁹ 河南省文物局：《浙川全寨子墓地》，科学出版社，2016 年。

³⁹⁰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系等：《河南淅川县马岭汉代砖室墓发掘简报》，《考古》2016 年 6 期。

³⁹¹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丽泽墓地：丽泽金融商务区园区规划绿地工程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6 年。

³⁹²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郢靖王墓》，文物出版社，2016 年。

3. 华东地区

2012年12月,为配合基本建设,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在长清区崮云湖办事处抢救性发掘了3座宋代石室墓,出土墓志2合、各类随葬器物30余件。三墓开口距地表约4米,墓道均向南,东西并排,自西向东为M1、M2、M3。其中M2出土器物26件。其中漆木器4件、瓷器1件、铜器7件、金器1件、银器2件、铁器6件、玛瑙珠2件、铜钱1组,另有麻布香囊1件、石质墓志1合。玛瑙珠2件。标本M2:10,红色,其中一个有双孔,一个有三孔,相通。直径1厘米。标本M2:11,大小形制同M2:10³⁹³。

2010年9月,在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中华东路与和平路交叉口西南约250米外的建筑工地发现了一只沉船。2010年10月至2011年1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菏泽市文物事业管理处联合对沉船进行了发掘。沉船内及周围区域出土的器物有100余件,包括瓷器、陶器、漆器、玉器、石器、铁器、铜器、金器等。其中绿松石金耳坠呈S形。用金片透雕牡丹纹图案,并镶嵌绿松石。重18.7克。玉荷叶形洗,质地为和田青玉。卷式荷叶形,口内敛,膛较大。外壁浮雕叶脉,荷枝为底,并浮雕一莲蓬。长11.3、宽10、高4厘米,重156.9克³⁹⁴。

二 探索与研究

(一) 考古学研究

1. 新石器时代

宋建在《良渚文化主神新证》中认为良渚文化的神权地位和作用在中国东南地区的早期文明中十分突出。但是目前关于良渚文化神祇系统认识十分不足。本文中使用的考古学、文献学、民族学等方法,欲梳理良渚文化主神的意义、影响。作者认为良渚文化主神为人虎复合,具体形态表现为人形神的上半身在上,下半身隐于后,双臂环抱作踞姿;虎神在下,匍匐于人形神下半身前。这种结构和观念在之后的甲骨文和金文“祝”中再现,而商周时期的“祝”是可以伴随于王之左右的神职高官,所以人形神或许是良渚大巫师的真实写照。主神形象确立不晚于良渚文化的瑶山墓地阶段。目前良渚文化的主神完整图像仅见于地位尊崇的反山M12中,该墓墓主或许既是大巫师又是一代国王³⁹⁵。

方建能、余炳盛等4位学者围绕良渚文化玉器进行了四方面研究:首先,对良渚文化及部分出土器物进行介绍;第二,检讨过去放射性定年的准确性,认为良渚地区特殊的地质或可将良渚文化期略往后延展,良渚末期应该为夏代初期;第三,指出良渚器物的特别矿物性质,分别良渚器的闪玉(软玉)、蛇纹石器物及仿古器物;第四,根据良渚闪玉的矿物特性研究而深入探讨了闪玉(Nephrite)的定义,指出西洋关于Nephrite定义的不当之处,并提出适合古代中国玉新的矿物学定义³⁹⁶。

崔岩勤在《赤峰地区出土红山文化玉器探析》中,首先对赤峰地区红山文化玉器出土情况进行简

³⁹³ 刘剑:《山东济南长清崮云湖宋墓发掘简报》,《文物》2015年2期。

³⁹⁴ 王守功:《山东菏泽元代沉船发掘简报》,《文物》2015年2期。

³⁹⁵ 宋建:《良渚文化主神新证》,《南方文物》2016年2期。

³⁹⁶ 方建能等:《良渚玉器与地质特性(一)》,《台湾矿业》2016年1期;方建能等:《良渚玉器与地质特性(二)》,《台湾矿业》2016年2期。

单概述；随后，对玉器的种类、形制特点和雕琢工艺进行分析；最后，作者总结了红山文化玉器的历史价值³⁹⁷。

徐琳在对故宫博物馆所藏齐家文化玉璧系统梳理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三点思考：第一，这批齐家玉璧的收藏状况问题；第二，玉璧的工艺问题；第三，则是玉料的来源问题。作者支持齐家文化玉料的就地取材之说，并不认为此时和田玉已经进入中原，零星的白色玉料可能来源于甘青交界处玉矿或青海昆仑玉³⁹⁸。

刘昱午在《人首形玉佩的来源、年代与用途》一文中将原河南省文物交流中心的一件人首形玉佩时代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来源则被认定是石家河文化。关于这些人首形玉佩的用途，文中并不认为它们是单纯的艺术品，而可能是巫师主持祭祀或行使巫术时通天致神的法器，是原始宗教的重要载体³⁹⁹。

2. 夏商周时期

梁兰莪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楚文化所表现的楚玉特色：以曾侯乙墓玉器为例》中透过文献与考古资料的整理对比，发现曾玉的独特之处外，更为深具楚风的汉玉，奠定文化丰硕而多姿多彩的基础。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首先对曾国相关历史情况和曾侯乙墓考古资料进行梳理，接下来便对楚文化对曾国的影响进行研究，最后则对曾侯乙墓玉器的特色进行了细致地分析⁴⁰⁰。

因便携式 X 荧光仪（PXRF）可进行快速无损检测。先怡衡等人尝试利用 PXRF 对不同产地绿松石矿样进行了分析检测，以期实现对不同产地绿松石的有效鉴别。实验样品包括矿石样品和文物样品共 58 件，其中矿石样品 55 件，均来自我国秦岭东段地区，分别为陕西洛南河口 11 件、湖北竹山喇叭山 10 件、湖北郧县云盖寺 11 件、陕西白河白龙洞 10 件、河南淅川刘家坪 13 件，矿石样品均为矿山实地取样。文物样品 3 件，来自偃师二里头遗址宫城以南绿松石废料灰坑（2004VT85H290）。利用该方法对二里头遗址出土的 3 件绿松石废料产地进行判定，发现其与河口古矿所出绿松石检测数据产生区域重叠，具有较好的相聚性，该现象说明陕西河口绿松石古矿可能是二里头绿松石文物的来源地之一⁴⁰¹。

张国英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首先将石峁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所出玉器进行了整体比较，认为二者之间有三处相似和四处相异之处；接下来，作者将两处文化的玉器分为礼玉、象征性礼玉和单出玉器三个部分再次对比，找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最后，作者对这些差异所反映的现象和原因进行了简要探讨⁴⁰²。

罗丹在其硕士论文《战国时期楚国组玉佩研究》中，选择战国时期楚式组玉佩的结构和应用功能作为研究对象。作者认为组玉佩既是周代用玉制度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楚国用玉制度的重要内容。自

³⁹⁷ 崔岩勤：《赤峰地区出土红山文化玉器探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 6 期。

³⁹⁸ 徐琳：《故宫博物院藏齐家文化玉璧综述》，《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 年 3 期。

³⁹⁹ 刘昱午：《人首形玉佩的来源、年代与用途》，《中原文物》2016 年 3 期。

⁴⁰⁰ 梁兰莪：《楚文化所表现的楚玉特色：以曾侯乙墓玉器为例》，淡江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班硕士论文，2014 年。

⁴⁰¹ 先怡衡等：《便携式 X 荧光光谱结合主成分分析鉴别不同产地的绿松石》，《考古与文物》2016 年 3 期。

⁴⁰² 张国英：《石峁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玉器比较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年。

西周早期起，组玉佩的形式还较为单一，且玉璜的数量或与佩戴者的身份等级相对应，而春秋晚年到战国以后，组玉佩无论是组成玉件还是系结方式均发生了极大地转变。战国时期楚墓出土了大量佩玉，将这些实物资料结合传世文献，为研究楚式佩玉提供了可能，通过楚式佩玉既是加深对楚国政治、文化生活的了解，也是加深对周代礼玉文化的了解⁴⁰³。

朱乃诚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六题》一文中选择玉勾云形坠饰、玉钩形器、玉璇玑形坠饰、玉蝉、鸟形坠饰和刻纹镂空玉臂饰这六类玉器进行分析，并由此概括出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文化面貌的六种特点。首先，作者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具有红山文化玉器的传统，是红山文化同类玉器的演变发展；第二，在以牛河梁遗址群为代表的红山文化玉器向以大甸子遗址为代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可能还有一个或几个中间环节；第三，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中有大汶口文化玉器的因素，并且还受到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玉器的影响，如璇玑形玉坠饰。尽管这类玉器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所占比例不大，但还是可以看出辽西及其邻近地区之间存在文化交流与互动；第四，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与长江中游地区“石家河文化晚期”玉器发生着交流，并互相影响；第五，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形成了自身的风格，即在红山文化玉器传统的基础上产生了新的器型与装饰风格，出现了玉器精品；第六，装饰类玉器盛行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的主要特点，这与红山文化晚期以礼仪玉器为主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⁴⁰⁴。

近 60 年来，对于虢国墓地出土玉器的研究，经由玉器考释、赏析、比较等相关研究的编纂出版，已经取得一些成就。但李铁青通过对虢国墓地玉器研究的梳理，认为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以及研究选题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对虢国墓地出土玉器的研究、发掘、展示其独具特色的艺术、礼仪之美⁴⁰⁵。

陈蕙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晚商至西周玉器比较研究》中以古器物学结合风格理论，尝试对玉器进行制作工艺程序的讨论与复原，藉由观察玉器本身所得的资料，反推商周时期制玉工业的样貌，区分二者在风格上的不同，也一探物质文化背后所体现的古文明。掌握风格分析的五个层次再回头观看晚商与西周的玉器，可以发现设计制作者意念的不同，逐步改变对玉器的处理方式，也就使得风格产生变化⁴⁰⁶。

先怡衡在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洛南辣子崖采矿遗址及周边绿松石产源特征研究》中以辣子崖绿松石矿业遗址为研究对象，对遗址性质、年代、采矿工具和该矿所产的绿松石矿物特征进行研究，并且和东秦岭地区四处其他绿松石矿相结合，采用多种检测方式，尝试建立我国不同产区绿松石的区分模型，期望研究成果可以用于我国绿松石文物的产源示踪，为考古学探讨先民对早期珍稀资源的利用、加工和流布提供一种科学方法⁴⁰⁷。

张登毅在其博士毕业论文中对中国先秦时期 8 处遗址的 128 件绿松石样品进行检测分析，并将检

⁴⁰³ 罗丹：《战国时期楚国组玉佩研究》，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6 年。

⁴⁰⁴ 朱乃诚：《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六题》，《考古》2016 年 2 期。

⁴⁰⁵ 李铁青：《60 年来虢国出土玉器研究述评》，《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 02 期。

⁴⁰⁶ 陈蕙娴：《晚商至西周玉器比较研究》，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年。

⁴⁰⁷ 先怡衡：《陕西洛南辣子崖采矿遗址及周边绿松石产源特征研究》，北京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 年。

测结果与5处绿松石矿源的数据进行比较,得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临汾下靳墓地的绿松石制品至少有3处不同矿源这一结论,同时,作者认为其中的两处矿源指向竹山喇嘛洞和洛南辣子崖地区。除此之外,作者在将绿松石样品科技数据和考古背景相结合之后提出:先秦“绿松石之路”分陆路交通和水陆交通两种形式,“太行山西路”是陆路传播最典型的代表,而“洛河一线”则是水陆交通的典型代表⁴⁰⁸。

3. 秦汉至隋唐

在《隋唐组玉佩刍议》中,李明提到,隋唐中、高级墓葬的随葬器物中常见多种规格的片形玉佩饰,称谓有所谓“蝙蝠形”玉佩、“山”形玉佩、玉璜、“冠顶饰”等。发掘者和研究者普遍认为这些形制不同的片形玉佩饰应该属于组玉佩的部件,但形制完整、组合清楚的组玉佩始终没有被发现。200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发掘唐总章二年(669年)刘智夫妇墓时,发现了一对两组基本保持原状的完整唐代组玉佩,它们的主人是唐高宗时代的中央中级官员——朝散大夫行司宰寺丞上柱国刘智。作者拟利用考古出土材料,特别是形制完整的唐刘智组玉佩,分析隋唐组玉佩的来源和形制,并对其适用范围进行初步考证。作者从隋唐组玉佩的来源、隋唐组玉佩的发现和隋唐组玉佩的形制与适用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得出以下结论:从考古发现的实物来看,组玉佩自隋初至唐代中晚期的墓葬始终有实物出土说明其在当时的舆服制度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隋唐组玉佩继承了三国、西晋组玉佩的传统形制,直接来源于北朝的组玉佩并在隋代中期固定下来,成为唐代“剑珮绶”朝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隋唐组玉佩的佩戴和随葬没有性别选择,即女性只要有足够高的品阶和爵位亦可使用。唐代墓葬中随葬组玉佩实物的较少,仍多以明器为主,而且并不一定随葬完整的成套组玉佩,而多用玉佩部件来代替。通过出土实物的观察,与两晋组玉佩形制最为接近的隋代组玉佩出现于隋代中期。隋代中期之后直至唐代的组玉佩完全照搬王粲佩法而抛弃了北周的组玉佩形制,这大概就是“今之佩,粲所制也”的深层次来源⁴⁰⁹。

(二) 神话学研究

叶舒宪认为从玉石神话信仰到白玉独尊的文化价值观体系形成是驱动华夏文明发生的特殊动力要素,它使中国掀起最高价值以和田白玉为原型的“玉教新教革命”,建构白玉崇拜为核心的华夏核心价值,周代以来的“白圭之玷”与“白璧无瑕”、夏商周以来的出土白玉玉器以及白玉为尊的价值谱系皆是上古国家统治者的神话观与西玉东输的文化现象构成的因果链条,揭示了华夏文明数千年来所独有的资源依赖现象的宗教信仰底蕴⁴¹⁰。

(三) 其他相关研究

巫新华在《浅析新疆吉尔赞喀勒墓群出土蚀花红玉髓珠、天珠的制作工艺与次生变化》中,首先对新疆帕米尔高原吉尔赞喀勒墓群出土的蚀花红玉髓珠制作工艺进行观察,同时梳理相关资料,将这

⁴⁰⁸ 张登毅:《中原先秦绿松石制品产源探索》,北京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

⁴⁰⁹ 李明:《隋唐组玉佩刍议》,《考古与文物》2016年3期。

⁴¹⁰ 叶舒宪:《从“玉教”说到“玉教新教革命”说——华夏文明起源的神话动力学解释理论》,《民族艺术》2016年1期。

批玛瑙的蚀花工艺复原。除此之外，作者认为蚀花玛瑙珠体表里次生变化主要受到帕米尔高原台地干旱少雨环境和棕漠土的影响。这批国内出土年代最早的天珠具有早期琐罗亚斯德教宗教文化意涵⁴¹¹。

王荣等通过考古学、矿物学和材料学等方法，从人为火烧成因和自然受沁成因两方面对蛇纹石玉呈现白化的性状特征和形成机制进行梳理和探讨，目的是探明蛇纹石玉火烧变白过程的热力学机制，探讨自然受沁成因的内在白化机制。在此基础上揭示白化玉器背后的人类行为和自然行为，帮助白化蛇纹石玉器的保护工作更加顺利进行⁴¹²。

赵德云在《西周至汉晋时期中国外来珠饰研究》一书中着眼于西周至汉晋时期与中西文化交流有关的十三类珠饰，包括蚀花肉红石髓珠、青金石珠、费昂斯珠等。作者对它们进行具体分析，追溯各自的源头；在此基础上，通过观察母型在传播过程中的形态及使用功能的变异，研究外来文化因素进入中国以后与本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的情况，进而分析中国文化面对外来文化因素的调适机制；并通过分析外来珠饰传播的可能中介者，勾勒其传播的途径，结合不同种类珠饰流行的时代编年分析以及流行地域等情况，以其时欧亚大陆的宏观历史背景为参考，总结西周至汉晋时期外来珠饰乃至中西文化交流的阶段特征⁴¹³。

穆朝娜以古代玉器作为研究方向，运用实物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方法，从不同角度和层面阐释了自己对玉文化的见解。其中，既有对高古玉的专题性讨论，也有对某类玉器的个案分析；既有对馆藏品的梳理与把握，也有结合所从事的古代玉器系列展览工作的心得和体会；既有对玉器专题展览的回顾与思考，也有以文学性语言描述玉器文化带来的内心感受⁴¹⁴。

三 展览及图录

鉴于当前传统图录、博物馆实体展览已无法满足公众和学者对于文物全面特征和特质的了解，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始研发文物（包括文物遗迹）三维动态鉴赏浏览系统。此次选取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文物 157 件，包括石器、陶器、玉器、骨器等。这些文物基本涵盖了郑州不同历史阶段的艺术魅力和华美风采。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将这些文物三维动态化，同时与纸质媒介结合，予以单独出版，即《华美与灵动：馆藏文物精品三维动态鉴赏》⁴¹⁵。

1992 年 5 月，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发掘了宝鸡益门二号春秋墓，该墓虽形制小，但随葬品丰富而精美，器物以金器、玉器和铁器为主，与其他秦墓有所区别。其中玉器 93 件（组），包括玉璧（图一〇）、玉环、璋形器玉带钩、亚字形玉饰（图一〇）、玉璋、玛瑙珠、绿松石配饰等。《秦墓遗珍：宝鸡益门二号春秋墓》中不仅收录该墓葬出土各类文物，还将研究人员对金器、铁器的监测分析报告和相关研

⁴¹¹ 巫新华：《浅析新疆吉尔赞喀勒墓群出土蚀花红玉髓珠、天珠的制作工艺与次生变化》，《四川文物》2016 年 3 期。

⁴¹² 王荣等：《中国古代蛇纹石玉的白化机制研究述要》，《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6 年 1 期。

⁴¹³ 赵德云：《西周至汉晋时期中国外来珠饰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 年。

⁴¹⁴ 穆朝娜：《玉论》，科学出版社，2016 年。

⁴¹⁵ 顾万发：《华美与灵动：馆藏文物精品三维动态鉴赏》，科学出版社，2016 年。

究性文章附录于后，方便研究者参考⁴¹⁶。



图一〇 益门二号春秋墓内出土的玉璧（左）和“亚”字形玉饰（右）

“王后·母亲·女将：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中展出了 300 多件妇好墓出土的玉器，在数量和质量上均可以达到一个中型专题展览的水平，所以编辑本次展览图录之时，专门将玉器汇集成一部“玉器篇”。“玉器篇”在内容上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赏析、论述和文献。“赏析”中将玉器按照性质分为六个单元，在向读者展示精美图片的同时，用简洁的文字介绍其基本情况和背景故事。在“论述”这一部分中，图录选取五篇研究性文章，涉及范围较广。最后一部分，则将商代玉器文献资料进行汇总，便于研究者查阅（图一一）⁴¹⁷。



图一一 妇好墓出土的嵌松石铜柄玉矛

《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中将此次考古成果分为五个部分进行展示，分别是墓园、车马坑、祔葬墓、主墓和出土文物。目前出土金器、青铜器、铁器、玉器、陶瓷器、简牍等各类精美文物约 1 万件、其中回廊约 6000 件，主椁室约 1000 件，车马坑约 3000 件。玉器种类多样，包括玉饰件、玉剑格、玉璧、玉印、玉佩（图一二）等⁴¹⁸。

⁴¹⁶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秦墓遗珍：宝鸡益门二号春秋墓》，科学出版社，2016 年。

⁴¹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王后·母亲·女将：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玉器篇》，科学出版社，2016 年。

⁴¹⁸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 年。



图一二 海昏侯墓出土的鞞形佩（左）和玉环（右）

《镇赉文物精粹》按照历史年代顺序编排，共分五部分，每部分所精选的文物，都代表了镇赉县各时期的文物特点。文物种类较多，包括石器、陶器、骨角器、玉器、铜器、瓷器等。其中玉器多集中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这两部分中⁴¹⁹。

《郑州大师姑图录》以 2002-2003 年大师姑遗址发掘出土的器物为主，收录陶器、铜器、玉器、骨器等 219 件。按照时代分为二里头文化和早商文化两个部分。玉器共 5 件，包括玉方杯、玉琮、玉饰等，均属于二里头文化⁴²⁰。

四 学术动态

2015 年 8 月 23 日至 8 月 27 日，由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玛纳斯县人民政府承办的“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丝绸之路与玉文化研讨会”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玛纳斯县召开，来自全国各地 100 余位研究玉器的专家和学者出席了会议。在这次研讨会上，学者从五个方面就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分别是：“丝绸之路”与“玉石之路”涵义的界定、“丝绸之路”古玉矿相关问题探讨、有关“丝绸之路”玉器相关问题探讨、碧玉相关问题探讨、明清时期和田玉相关问题探讨⁴²¹。

震旦博物馆系列学术讲座之红山文化玉器与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标志于 2016 年 4 月 9 日在震旦博物馆一楼多功能厅召开，刘国祥研究员在该讲座中系统讲述了红山文化的发现与认识过程、红山文化考古的系列重大发现、红山文化与中华五千年文明之路等内容，论证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之一⁴²²。

2016 年 3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联合研究基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及历史系共同举办了“玉器与王权诞生”研讨会。此次会议主题以二里头绿松石及铜牌饰为

⁴¹⁹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镇赉文物精粹》，科学出版社，2016 年。

⁴²⁰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师姑图录》，科学出版社，2016 年。

⁴²¹ 马林：《“丝绸之路与玉文化研讨会”综述》，《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 年 1 期

⁴²² <http://www.kgzg.cn/forum.php>

讨论重心，其中包括与二里头 M3 龙形器来源关系密切的日照两城镇 M33 墓发现，花地嘴朱绘神面的分析。二里头方面包括 M3 随葬绿松石龙形器的考古学背景，绿松石嵌片技术，铜牌饰胶黏剂探索，2015 年二里头最新发掘成果，二里头文化时期陶器及铸铜业特征⁴²³。

⁴²³ <http://www.kgzg.cn/forum.php>

玉器考古文献汇编（2016年7月-12月）

原载《玉器考古通讯》总第九期

刘思源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一 考古发现

（一）新石器时代

1. 东北地区

2011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成立了“吉林省田野考古实践教学与遗址保护研究基地”，对后套木嘎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发掘。此次发掘所获的文化遗存共可分为七个时期。其中第二、三期遗物内包含少量玉器，简报内并未详细介绍。第四期出土的遗物中有玉坠、珠、管等⁴²⁴。

2. 西北地区

韩家圪旦地点位于陕西神木石峁城址内城中部偏东的一处东西向“舌形”山岭，与皇城台隔沟相望，是一处重要的居址与墓葬交错分布区域，先后承担过居址和墓地两种聚落功能。该地点早期为居址，房屋以高低错落的窑洞为主要建筑形式；晚期成为墓地，墓葬形制包括竖穴土坑墓、石棺墓和偏洞室墓，尤以竖穴土坑墓居多。个别墓葬规模较大。虽多遭盗掘，但仍保留重要随葬品。结合与石峁城址的核心区域——皇城台隔沟相望的特殊地理位置，这些现象暗示着韩家圪旦地点应是一处重要的贵族墓地。韩家圪旦地点2014年度出土的遗物以陶器为大宗，其次为石器和骨器，还发现个别蚌饰、海贝、鸵鸟蛋壳、绿松石饰及玉器⁴²⁵。

石擦擦山遗址位于陕西省佳县的石擦擦山及其附近区域，距离黄河约15公里，2003年7至10月对此遗址做了考古发掘。本次工作揭露遗址面积约900平方米，清理灰坑、窖穴93座、房址18座、陶窑1座，以及用石块包崖镶坡所筑的内外城墙、宽大的护城壕和保存较好的石砌护坡等遗迹。出土陶器、石玉器、骨器等遗物200多件。玉环1件，残，淡绿色。断面宽1.5、高3.4厘米⁴²⁶。

3. 华东地区

蒋庄遗址位于江苏省兴化、东台两市交界处，分属兴化市张郭镇蒋庄村及东台市时堰镇五星村、双溪村。以泰东河（泰州市至盐城东台市）为界，遗址分为东、西两区：东区以唐宋时期堆积为主，另有明清时期遗存，面积45万平方米；西区有良渚文化、汉代及唐宋时期遗存，以良渚文化遗存为主，堆积厚度多达到2米，面积近2万平方米。因泰东河拓宽、疏浚工程，需在遗址东区西侧及西区

⁴²⁴ 霍东峰：《吉林大安市后套木嘎遗址AIII区发掘简报》，《考古》2016年9期。

⁴²⁵ 孙周勇等：《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韩家圪旦地点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6年4期。

⁴²⁶ 张天恩等：《陕西佳县石擦擦山遗址龙山遗存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6年4期。

东侧沿河部分进行施工。2010年夏，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对泰东河沿线进行考古调查与勘探，2011年10月至2015年12月，又先后两次在此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及具有学术目的的后续主动性发掘。总发掘面积3500平方米，发掘工作主要集中于西区。

目前已清理良渚文化墓葬284座、房址8座、灰坑100余座以及水井、灰沟等，出土玉器、石器、陶器、骨器等遗物近1200件。玉器主要出土于良渚文化墓葬中，包括琮、璧、锥、镯、环、管、珠、坠饰等（图一）。玉器和石器多出土于墓主头部及腹部以上，部分压于身下⁴²⁷。



图一 蒋庄遗址出土的玉镯和玉坠饰

2012年上海市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等单位对广富林遗址进行了发掘，在南京大学发掘区发现良渚文化时期墓葬10座。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随葬品以陶器为主，还有少量玉器和石器。玉器有玉锥形器和玉管。玉锥形器1件（M350:5），米黄色，圆锥形，截面圆形，磨制光滑，一端尖，一端出榫，榫上有小孔，上端略残，残长6.6、最大管径0.9厘米。玉管1件（M357:5），青绿色，素面，圆柱体，纵向穿有一孔，长1.9、管径0.8厘米。

根据墓葬开口层位、随葬品组合、典型陶器演变序列判断，10座墓葬年代存在早晚差异，其中早期墓葬3座，中期1座，晚期4座，另有2座因被晚期水沟打破不见随葬品而未能断代。墓葬均位于高土台上，反映了良渚先民择高处而葬的习俗⁴²⁸。

（二）夏商周时期

1. 西北地区

2014年9月，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的周原考古队启动了周原遗址新一轮的考古工作。截止到2016年2月，在凤雏、贺家、礼村及周边区域已完成300多万平方米的重点普探工作。大致摸清了该区域内夯土基址、城墙、壕沟、居址及墓葬等地下遗存的分布情况。按照工作计划，依据勘探成果，考古队对贺家北区域的两座夯土基址、一处“居址-墓地”、一座车马坑、一座马坑以及水网系统中的五处池渠遗迹进行了发掘。

在三号夯土基址的发掘区中出土了较多的高等级遗物，有金箔、绿松石片、原始瓷器、漆器、玉器、海贝。其中金箔、绿松石片、原始瓷片主要出土于凸出部东部的一批灰坑中，漆器出土于凸出部东、北两面的地层和灰坑中，玉器绝大多数出土于庭院内。

⁴²⁷ 南京博物院：《江苏兴化、东台市蒋庄遗址良渚文化遗存》，《考古》2016年7期。

⁴²⁸ 宋建等：《上海广富林遗址2012年南京大学发掘区良渚文化时期墓葬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6年4期。

“居址-墓地”可分为东、西两个发掘点。西发掘点位于夯土基址区西南约 150 米处，在 412 平方米的发掘区内共清理西周时期具有叠压打破关系的遗迹 149 处，包括中小型墓葬 20 座、灰坑 124 座、房址 5 座。其中 H57 为大型灰坑，平面形状较规整，近椭圆形，近圜底，底部西侧坡度平缓，东侧较陡直，东西最长约 2.44、南北最宽约 3.28、深约 0.86 米，坑口距地表深 1.48-1.66 米。坑内堆积较丰富，内含较多黑色木炭颗粒和少量红烧土颗粒。出土遗物有大量陶片、碎骨、蚌片、蚌刀、石刀，另有数量众多的小件遗物。原始瓷、陶片、玉料等显示出较高等级的特征。H57 属于生活垃圾坑，其使用者身份等级较高。根据出土遗物形制分析，H57 内堆积的年代处于西周中期偏晚。东发掘点位于夯土基址区南约 140 米，距西发掘点约 80 米，在 225 平方米的发掘区内共发现 4 座西周晚期墓葬和 12 座商周之际的灰坑。其中 M30 为东西向墓。西端被盗洞及近代墓破坏。由于扰乱后的头骨在西端，腿骨等在东端，推测墓主头向可能朝西。墓内葬具为一椁两棺，椁长 3.61、宽 2.27、高 1.2 米，外棺长 2.7、宽 1.45、残高 0.1 米，内棺长 2.2、宽 0.9、残高 0.3 米。椁底板下东、西两端各有一根垫木。墓底中部有椭圆形腰坑，腰坑东西长 0.57、南北宽 0.44、深 0.3 米，坑内殉狗。由于盗扰严重，墓主人葬式与头向不清。二层台和椁盖板上的部分随葬品未经扰动，棺椁内随葬品均失去原始位置。在西侧二层台上摆放随葬品 17 件。东、南、北二层台和椁盖板上残留有玉器、漆器、蚌器等 16 件，盗洞内出土铜饰、小玉器、海贝等 627 件⁴²⁹。

2011 年，为配合蒲城县文物局对永丰镇发现古墓群的有效保护，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该墓地进行了调查和勘探，并对发现的 4 座战国秦汉时期的家族墓葬进行了发掘。其中 M2 为大型竖穴木椁墓，墓主身份尊贵，时代为战国晚期；M3、M4、M5 为中小型竖穴墓道土洞墓，时代为秦代或汉初。随葬品包括陶、铁、铜（包括铜钱）、玉等，其中陶器为大宗，玉器仅有一件。玉璧 1 件，出土时已裂为数块。玉色黄白，表面蚀化严重，素面。标本 2011SPYM2:15，直径 13.2、好径 6、厚 0.4 厘米⁴³⁰。

1987 年 4 月，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对干骨崖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组成干骨崖墓地联合发掘队，自 5 月 6 日正式开始发掘工作，前后历时 40 余日。共发掘墓葬 107 座，出土一批石器、陶器、铜器、玉石器、骨牙器等，共 457 件（套）。其中玉器仅有 3 件，包括斧和权杖头，均为礼仪用器。斧（钺）2 件，标本 M74:5，黑色，表面有少许墨绿色条纹，圆角长方形，上宽下窄，中间偏上约三分之一位置有单面钻的一个孔，刃部略呈弧形，圆钝，长 8.6、宽 5.3、孔径 0.8-1.1、厚 1.6 厘米。权杖头 1 件，标本 M44:1，白色，局部表面呈浅淡泛黄的颜色，顶视呈圆球状，侧视呈扁圆形，中心部位上下管钻一孔，上小下大，孔内壁保留多道管钻留下的旋槽痕迹，器表打磨十分光滑，高 5.7、直径 7、孔径 1.9-2.5 厘米⁴³¹。

《王大户与九龙山——北方青铜文化墓地》一书中分别对彭阳县王大户墓地（2007 年发掘），中庄墓地（2008 年发掘）和固原市原州区九龙山墓地（2009 年发掘）的考古发掘工作进行了整理和分析。王大户墓地中出土遗物的质地有铜、铁、骨、石、费昂斯饰件等，石质和铁质器物较少。根据遗

⁴²⁹ 周原考古队：《陕西宝鸡市周原遗址 2014~2015 年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16 年 7 期。

⁴³⁰ 岳连建等：《陕西蒲城永丰战国秦汉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6 年 5 期。

⁴³¹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酒泉干骨崖》，文物出版社，2016 年。

物的功能可分为炊器、兵器、工具、车器、马器和饰件等，饰件有带饰、骨饰、绿松石珠饰等。中庄墓地中仅有墓葬两座，且其中一座被盗毁，遗物主要是PZM1内出土，包括铜器、骨器和玉石器58件。九龙山墓地的墓葬出土器物以各种小件青铜器饰品居多，女性墓葬中还有铜耳环和由石珠、绿松石等构成的项饰⁴³²。

2. 华中地区

2007年6月至10月，为配合三门峡市林业局等单位住宅小区的工程建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考古队，对三门峡市李家窑遗址的西南部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了一批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墓葬。M7、M8、M9和M23较为重要且具代表性，其中玉器仅见于M23。M23中出土器物共9件，按质地可分为陶、玉、石、骨4类。玉珠1件，标本M23:6，白色，玉质稍粗，整体呈圆柱形，柱身中部略细，且有横向划痕，顶部和底部直径均为1.2、2.1厘米⁴³³。

2007年9月，根据国家文物局和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的统一安排，驻马店市文物考古管理所承担了马川墓地及遗址的考古钻探和发掘工作，钻探和发掘工作前后持续6年。马川东周时代文化遗存是遗址中最主要的文化遗存，直接叠压在汉代文化层下。东周时期墓葬共清理208座，可分为大型墓葬、中型墓葬和小型墓葬三类。各类墓葬共出土随葬品683件。其中陶器609件，铜器51件，铁器1件，其他22件。玉饰件1件，M135:11，色白，质地细腻较光泽，含灰色斑点⁴³⁴。

2005年7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荥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对西司马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分三次进行，共清理古墓葬124座，灰坑4座，水井1座，其中晚商西周墓葬82座，战国墓葬20座，魏晋墓葬2座，唐宋墓葬19座，清墓1座。其中战国墓葬05XGSM18内出土玉带钩、玉璧各1件。玉带钩，标本05XGSM18:2，素面，器身圆柱长条状，较短，尾齐，横断面呈圆形，圆形钮，通长5、最宽处1.7、最厚处1.4、钮径1.6厘米⁴³⁵。

2014年10月至2015年1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湖北枣阳郭家庙墓地曹门湾墓区进行了发掘。此次发掘共清理春秋早期墓葬25座、车坑1座、马坑2座、车马坑1座，目前已经确认曹门湾墓区是春秋早期曾国墓地。其中M10、M13、M22是保存完整的三座墓葬。M10内出土玉环2件、琏1件。环2件，形制相同。M10:11，置于棺内，乳白色，环状，中间钻孔，直径1.3、孔径0.6、高0.3厘米，残重0.8克。M10:13，直径1.3、孔径0.6、高0.3厘米，重0.8克。琏1件，出土于牙齿附近。M10:4，乳白色，玉质差，呈不规则小石子状，宽度为0.3-0.6厘米之间。M13内仅出土玉块，共4件，每两件为一组。M13:9，白色玉质，一半通透，一半呈乳白色，扁体圆形，中心钻孔，一侧留有缺口，通体打磨光滑，素面。M13:9-1，微残，直径1.8、孔径0.8、通高0.35厘米，重2.3克。M13:9-2，残缺，直径1.8、孔径0.8、通高0.35厘

⁴³²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王大户与九龙山——北方青铜文化墓地》，文物出版社，2016年。

⁴³³ 王龙正等：《三门峡市李家窑遗址两周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6年4期。

⁴³⁴ 河南省文物局：《浙川马川墓地东周楚墓》，科学出版社，2016年。

⁴³⁵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荥阳西司马墓地》，大象出版社，2016年。

米，重 2.2 克。M13:11，完整，正面有裂痕，青色玉质，杂白色、黑色、褐色沁斑。M13:11-1，直径 1.8、孔径 0.8、通高 0.3 厘米，重 2 克。M13:11-2，完整，直径 1.8、孔径 0.8、通高 0.3 厘米，重 2.1 克。M22 内出土玉器 2 件，器型有玦和环。玦 1 件，完整，出土时位于棺内东侧头部。青色玉质，温润有光泽，半透明状，局部有黑色沁斑，扁体圆形，中心钻孔，一侧有缺口，光素无纹饰，正面孔缘处有一处钻孔时留下的标记，直径 3、孔径 1.1、厚 0.3 厘米，重 5.4 克。环 1 件，残，两端断痕不规则，出土时位于棺内中部，青黄色玉，表面有黑色和黄色沁斑，局部被腐蚀，半环状，外边出缘，缘部形成一道弧形凹槽，内边起脊，内壁打磨光滑，残径 6.4、厚 1、缘宽 0.6 厘米，重 11.5 克⁴³⁶。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1 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枣阳郭家庙墓地曹门湾墓区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共清理春秋早期墓葬二十七座，其中曹门湾 M43 保存完整。该墓中随葬品共 11 件。椁室东侧有铜礼器和陶器，随葬 1 鼎、2 簋、1 盘、1 匜以及陶罐 3 件。棺内耳颈旁随葬玉玦 2 件、玉刀 1 件，头顶南发现陶纺轮 1 件。玉玦 2 件，从两面切割痕迹看，两件来源于同一块玉料，M43:5，保存完整，青黄色玉质，杂质较多，带白色、黑色、褐色沁斑，形制为扁体圆形，中心钻孔，一侧留有缺口，通体打磨光滑，素面，直径 3.85、孔径 2.5、厚 0.2 厘米，4.5 克。M43:6，沁斑略少，表面布满裂纹，反面有切割痕，直径 3.75、孔径 2.4、厚 0.2 厘米，重 4 克。玉刀 1 件（M43:7），残断，青色玉质，杂大量白斑，长条形，带刃，长 12.6、一端宽 2.3、厚 1.5-3 厘米⁴³⁷。

3. 华东地区

2009 年 6-9 月，为配合前营孜煤矿铁路专用线建设工程，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宿州市文物部门对芦城孜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 3800 平方米。2010 年 3 月开始对这批发掘资料进行整理，2014 年 9 月基本完成报告编纂工作。报告按照时间顺序分别对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龙山文化遗存、周代文化遗存、汉代遗存及唐代遗存进行了介绍。在周代及唐代遗存中出土玉器。玉玦 2 件，形制相同，周代。标本 M26:1，圆形，灰白色玉料，中间一圆形穿孔，直径 2.6、孔径 0.8、缺口宽 0.2-0.3 厘米。标本 M26:2，大小和形制同标本 M26:1⁴³⁸。

五担岗遗址于 1984 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过程中发现。2002 年，因马鞍山市修筑旅游大道，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并出土了较多重要文化遗物。2009 年 3 月至 10 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对五担岗遗址进行了再次发掘。五担岗遗址早期阶段的地层、文化遗迹的时代大约从商代早期延续至战国时期。出土器物比较丰富，包括陶器、铜器、玉器、石器、骨器、木器、草编器等，陶器数量最多，器类也比较多。玉器仅 3 件，器类有串饰、锥形器和圆形饰。串饰 1 件（H87:2），通体绿色，略带白色杂质，圆柱形，精磨，中间有双面对钻的穿孔，高 1.5、宽 13、上孔径 0.6、下孔径 0.65 厘米。锥形器 1 件（T08:1），残，通体黄绿色，土质坚硬，整体呈尖锥形，精磨，尖端截面呈扁圆形，末端略残截面呈方形，长 2.8、宽 0.8 厘米。圆形饰 1 件（T32:9），绿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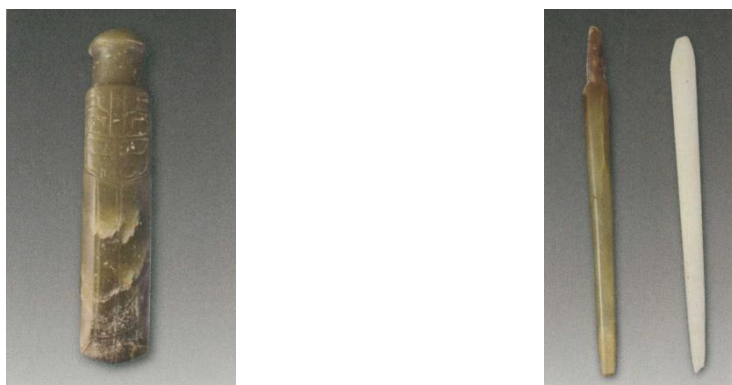
⁴³⁶ 张天宇等：《湖北枣阳郭家庙墓地曹门湾墓区（2014）M10、M13、M22 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6 年 5 期。

⁴³⁷ 张晓云等：《湖北枣阳郭家庙墓地曹门湾墓区（2015）M43 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6 年 5 期。

⁴³⁸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宿州芦城孜》，文物出版社，2016 年。

石装饰，近圆形，蓝绿色，精磨，应为镶嵌在某种器物上的装饰性玉器，直径 0.5、厚 0.25 厘米⁴³⁹。

刘家庄遗址位于济南市老城区西北约三公里的刘家庄村，是一处商周和唐至明清时期的遗址。2010 年 7 月至 2011 年 2 月，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出大量灰坑、墓葬等遗迹。M121、M122 两座墓葬规模较大，随葬器物丰富，出土大量青铜器及少量玉器和陶器。初步推测两座墓的时代为殷墟三期，墓主人为中等贵族。M121 内随葬的玉器包括：玉戚、玉戈、玉柄形器、玉簪等（图二）。M122 内随葬的玉器有玉戈和玉镞⁴⁴⁰。



图二 刘家庄遗址 M121 内随葬的玉柄形器和玉簪

（三）秦汉至隋唐时期

1. 西北地区

2011 至 2012 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配合基本建设，发掘清理了汉代至明代墓葬 113 座（以汉代墓葬为主）。其中有一座唐代墓葬（M92）为唐故监察御史杨筹墓。该墓被盗扰，残存陶瓷器多出土于墓室东部棺床下。共出土随葬器物 13 件，分为陶、铜、铁、玉石器，器形包括瓷罐、陶塔式罐、陶砚、铜镜、铜钱、铁锁、墓志等。玉石残料 1 件（M92:7），残为两半，形状不规则，为切割玉石器所余残料，一面切割光滑呈墨绿色，长约 26、宽约 16 厘米⁴⁴¹。

2013 年 11 月至 12 月，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基础建设，对征地范围内的古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此次共清理两汉时期墓葬 12 座、陶窑 1 座。其中 M6、M12 墓葬形制较为典型。M6 为长斜坡墓道竖穴土坑墓，墓内出土器物 25 件（组），按照质地可以分为原始瓷器、陶器、铜器、玉器等。其中玉器有两组，分别是玉片和玉圭。M12 为双竖穴墓道空心砖墓，出土文物 12 件（组），按照质地可以分为铜器、铁器、玉器等。玉器仅 1 件，为玉塞（M12:9），柱状，截面呈六边形，色灰白，质坚硬，长 2.4、直径 0.5-0.6 厘米⁴⁴²。

2. 华中地区

2008 年 12 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立考古队，对安阳市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一座被盗大

⁴³⁹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马鞍山五担岗》，文物出版社，2016 年。

⁴⁴⁰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济南市刘家庄遗址商代墓葬 M121、M122 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 年 7 期。

⁴⁴¹ 张小丽等：《西安曲江缪家寨唐代杨筹墓发掘简报》，《文物》2016 年 7 期。

⁴⁴²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崔家村汉墓发掘简报》，《文博》2016 年 4 期。

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大量珍贵文物。2009年12月13日，国家文物局组织各方面专家，成立专家组，对该墓葬进行综合论证。会上各位专家一致认为，安阳西高穴二号大墓（M2）就是魏武王曹操的陵墓。M2内出土器物较多，其中玉器所占比重并不大。从质地上说，出土玉器分为青玉、白玉、玛瑙、水晶等；从器形上分，有珠、饼、璧等；从功用上分，有礼器、葬玉、身上的配饰等。除了珠类保存较好外，其他类玉器多有损坏。玉珠8件，多出土于前墓室扰土中，个别出土于后室南侧室内。根据大小，可以分为小型玉珠和大型玉珠，其中大玉珠2件，小玉珠6件。按照材质和颜色分，又分为青玉珠、白玉珠、黑玉珠和玛瑙珠。其中青玉珠4件、白玉珠2件、玛瑙珠1件、黑玉珠1件。玉璧1件，出土于后室扰土中，青玉，仅余残块，整体呈扇形，外为直壁，在直壁靠近一面的上部边缘处，有两周极细的凹弦纹，两面图案完全一致，中间部位均匀密布蒲纹，边缘处有一周平滑的窄边，略低于中部的纹饰，从雕刻技法和纹饰看，具有典型的汉代玉璧特征，残存部分弧边宽5.1、斜边长4、边缘处厚0.45、中部纹饰部位厚0.5厘米。从残存的弧形边来测算，完整的玉璧直径应为16.5厘米左右，残存部分较小，孔径大小不详⁴⁴³。

2009年2月至2010年9月，为配合基本建设，洛阳市文物考古院（原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在连霍高速对拟建线路进行了考古调查，在邙山大汉冢东汉帝陵陵园遗址附近发掘了3座规模较大的墓葬。其中1座是位于大汉冢陵园遗址东侧的曹魏名将曹休墓（ZM44），另外2座分别为M1和M4。M1和M4被盗严重，出土器物较少，有陶器、铜器、铁器、玉器、石器及金器，共70余件。玉剑璲1件（M1:38），和田玉质，白色，平面呈长方形，两端圆折微向内卷，正面浮雕一龙，昂首挺胸，尾部卷曲上翘；与龙首相对的位置有一凤头，阴刻，颌首，目视下方，做恭敬状；背部有一长方形穿孔。长7.5、宽2.1、高2厘米⁴⁴⁴。

2012年7月，为配合洛阳市基本建设，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衡山路北延线进行了考古勘探，发现了一座规模较大的墓葬（M926）。墓葬位于洛阳市涧西区红山乡张岭村东南约300米。该墓葬的发掘工作于2013年1月结束。由于多次被盗，墓葬出土的器物较少且残损，有陶器、瓷器、铜器、铁器、金器、银器、玉器等。玉器为玉棒1件（M926:10），玉质灰白，质地近石，尖锥状，残长4、直径0.5厘米⁴⁴⁵。

自1954年到2011年12月，沅水下游地区历年发掘两汉墓葬总数已经超过600座，《沅水下游汉墓》报告共收录墓葬485座。该地区汉墓随葬品种类丰富，包括陶瓷器、铜器、铁器、玉石器、玻璃器、金银器等。其中玉器共91件（组），包含玉猪、玉鸟、玉琮、玉塞、玉带钩、玉环等（图三）⁴⁴⁶。

2010年11月至2012年6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对龙门堂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墓葬77座。其中M37、M56两座墓葬为带斜坡墓道的长方形砖室墓，共出土陶器、铜器、玉器和石器35件，钱币233枚。石珠和玛瑙饰1组，标本M37:5，残，石

⁴⁴³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曹操高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⁴⁴⁴ 王成秋等：《洛阳孟津卅里铺东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11期。

⁴⁴⁵ 严辉等：《洛阳涧西衡山路北魏墓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7期。

⁴⁴⁶ 湖南常德市文物局等：《沅水下游汉墓》，文物出版社，2016年。

珠黑色，四瓣，中有一孔，珠直径 0.85、孔径 0.4 厘米。玛瑙饰红色，略呈椭圆形，上下平，中有孔，残长 3.1、宽 0.8、孔径 0.1 厘米。依据墓葬形制、器物组合等判断，M37 时代约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中期，M56 时代约为新莽时期至东汉早中期⁴⁴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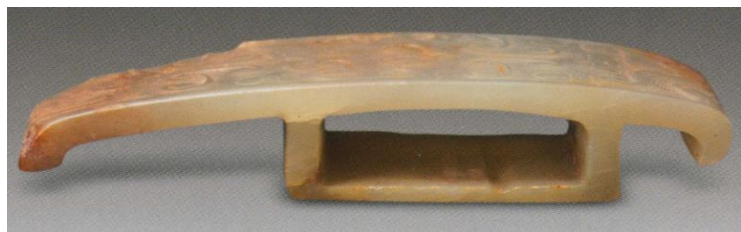
图三 沅水下游汉墓随葬的玉带钩和玉鸟

3. 华东地区

2009 年至 2010 年，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对济南市魏家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有汉代墓葬 95 座，多为土坑竖穴墓和砖椁墓。随葬品种类丰富，数量较多，出土陶、铁、铜、玉器等各类文物 630 余件（组）。在随葬品的位置摆放方面，铜镜、铜刷柄、玉璧、石砚板等多位于墓主头部附近。M105 内出土玉剑首 1 件。标本 M105:7，略残，扁圆形，双面均刻划纹饰，一面外缘刻单周凹弦纹，中部刻双周凹弦纹，两组弦纹间饰谷纹，双周凹弦纹内饰变体卷云纹三组，另一面中部刻双周凹弦纹，其内外均饰谷纹，直径 4、厚 0.4 厘米。M120 内出土玉剑璏 1 件，标本 M120:16，平面呈圆角长方形，两端向下卷曲，背面附有长方形套，正面两侧留白，长方形框内刻划中轴对称卷云纹，一端为兽首形，长 6.6、宽 2.2 厘米⁴⁴⁸。

洗砚池晋墓位于临沂市兰山区王羲之故居公园院内东北部，南距洗砚池街约 200 米，北距兰山路约 100 米，东至沂蒙路约 270 米。2003 年 5 月 2 日至 16 日，抢救发掘保护协调小组对 M1 进行了发掘。6 月 8 日，发现另外一座较大墓葬（M2），考古队遂继续进行发掘工作。发掘工作从 6 月 8 日开始，到 7 月 2 日结束。M1 位于王羲之故居公园内东北部。墓葬由封土、墓道、前庭、墓室构成。

墓葬的西墓室随葬品十分丰富，共出土陶器 13 件，瓷器 17 件，铜器 30 件，铁器 8 件，玉石器 7 件（套），骨角器 8 件，金银器 51 件，另有漆木器 30 件，其他类随葬品有琥珀兽、云母片等 9 件（套），共计 173 件（套）。西墓室中出土的玉器包括玉珠、玉剑璏。玉剑璏 1 件，M1 西:67，有残缺，白玉质，局部泛褐色，璏面刻有兽面纹及变形云纹，长 7.1、宽 2.7、高 1.3 厘米（图四）。M2 位于 M1 西 35 米处，因



图四 临沂洗砚池晋墓 M1 出土的玉剑璏

⁴⁴⁷ 刘尊志等：《湖北省郧县龙门堂墓地 M37 与 M56 汉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6 年 6 期。

⁴⁴⁸ 济南市考古所：《山东济南魏家庄汉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6 年 4 期。

被盗掘，随葬品所剩无几，但墓葬的形制结构保存完整，规模宏大，从清理的两具成人骨架来看，该墓为夫妻合葬墓，墓内出土陶器、瓷器、铜器等器物 30 件（套），其中包括玛瑙珠 2 件、玛瑙剑格 1 件⁴⁴⁹。

浙江汉墓出土的各类随葬品总计 7878 件（组），包括陶瓷器、铜器、铁器、金银器、玉料器、石器、漆木器等。棺内基本随葬小件器物，一般玉质琯、耳塞、鼻塞和琉璃或玛瑙质地的耳珥位于墓主头部；铜镜、铜削、铁削等多摆放于头部两侧；其中铜镜往往盛放在漆盒内，个别摆放于足部。玉、水晶、玛瑙等质地的装饰品位于胸前。玉器普遍保存良好，玉器中以青玉为主，少量为白玉。玉器采用切割、打磨等工艺制作而成。装饰技法有阴刻、半浮雕、钻孔等，纹饰有涡纹、乳钉纹、蟠螭纹等。其余质地的器物则有切割、打磨、钻孔等制作工艺，器表普遍素面⁴⁵⁰。

2011 年 4 月 6 日，国家文物局主持召开了墓葬保护专家论证会，会上同意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海昏侯墓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2011 年至 2016 年，考古工作者对墓园、祔葬墓、车马坑和主墓等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勘探面积约 400 万平方米（含紫金城城址），发掘面积约 1 万平方米。截至 2016 年 4 月，清理遗物 1 万余件（套），有金器、青铜器、铁器、玉器、漆木器、陶瓷器、竹编器、草编器、纺织品和竹筒、木牍等。其中玉器 500 余件（套）。有璧、环、玉人、鞞形佩、羽觞、带钩、剑饰、玉饰、玉片、玉管、饰件、“大刘记印”、“刘贺”印章、琥珀、玛瑙、绿松石等。除此之外，玉器还作为其他器物上的装饰品使用。席镇共 64 件，有龟形、虎形等。M1:739-2，龟形，龟背填充以兽皮，兽皮上分块缝制成龟背纹，其间鎏金并镶嵌白玉颗粒。金镶玉漆樽 1 件（M1:1），圆形，器身等距离镶嵌金片和玉饰，金片上饰龙纹及其他动物纹⁴⁵¹。

2009 年 6-9 月，为配合前营孜煤矿铁路专用线建设工程，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宿州市文物部门对芦城孜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周代及唐代遗存中出土玉器。玉兔 1 件，属于唐代遗存，标本 T2:22，灰白色半透明玉料，上部有一穿孔，下端残，长 8.6、厚 0.4 厘米⁴⁵²。

4. 西南地区

2002 年 9 月至 2003 年 1 月，重庆市文物考古所（现更名为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小田溪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灰坑 1 个、墓葬 13 座。其中 M12 规模较大，出土器物丰富，时代为秦代至西汉初年。M12 内共随葬各类器物 66 件（套），类别有铜、陶、玉、漆等，其中以铜器为主，陶器数量较少而且保存较差，玉器和漆器在以往发掘的巴文化墓葬中虽有发现但多为零星几件，而此次发现较多。除一套组佩外，另有两件玉璧，共计 3 件（套）（共 35 件），功能属于葬玉，均位于棺内墓主身上。组佩 1 套（33 件），这是巴文化首次发现的一套组佩，属于四仰璜组佩，由 33 件不同质地（玉 18、玛瑙 5、料器 4、铜 6）和器形（瑗 1、珩 1、璜 4、环 1、双龙形佩 1、珠 9、管 11、长方形饰 2、鸟形牙饰 1、桃形饰 1、翅形饰 1）的部件组成。璧 2 件，内外郭上均饰有一周凹弦纹，肉上两

⁴⁴⁹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临沂洗砚池晋墓》，文物出版社，2016 年。

⁴⁵⁰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汉墓》，文物出版社，2016 年。

⁴⁵¹ 杨军等：《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考古》2016 年 7 期。

⁴⁵² 同注 15。

面饰有谷纹，制作较为粗糙，正、背两面未作抛光。标本 M12:111，白玉质，略残，大部分有黄褐色浸蚀，直径 12.9、好径 4.5、肉宽 4.2、厚 0.5 厘米。标本 M12:11，青玉质，有黄色、白色瑕疵及浸蚀，直径 11.5、好径 4.6、肉宽 3.45、厚 0.5 厘米⁴⁵³。

奉节营盘包墓地自 1992 年被发现以后，分别在 2003 年、2004 年及 2005 年进行过多次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墓地时代延续时间较长，包括战国墓葬、汉代墓葬和宋代墓葬，存在部分年代不明墓葬。其中汉代墓葬共发掘 43 座，可分为土坑墓、砖室墓和石室墓三类。汉墓 M6 内出土铜器、陶器、玉器、铜钱等，其中玉器 2 件，均为剑饰（图五）。在探方发掘中，也出土了部分有价值的文物，其中有的可以肯定是墓葬中的遗物，由于墓坑早被破坏无存，所以只能作为地层出土物加以介绍。这些器物有陶罐、陶壶、陶鼎、铜铃、玉璧、翡翠饰、铜钱等。玉璧 1 件（T25:1），青白色，晶莹剔透，两面各有精美的花纹：一面是龙纹，一条龙卷曲身体绕好孔而设，首尾相接，形象生动；另一面为对称布局的卷云纹和菱形纹，细致工整，直径 5.4、孔径 0.7、厚 0.65 厘米。翡翠饰 1 件（T25:2），翡翠绿，表面光滑，一端宽一端窄，窄端套有铜箍，上连有饰物（已残失），长 8.4，宽 1.15-1.85、厚约 2.5 厘米⁴⁵⁴。



图五 奉节营盘包墓地 M6 出土铜剑

（四）宋辽至明清

1. 西北地区

2011 年至 2012 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为配合基本建设，于原缪家寨村所在地发掘汉代至明代墓葬 113 座。其中一座元代墓葬（编号 2012JGYM109，以下简称 M109）保存完好，出土器物丰富，年代明确。M109 为竖穴墓道前后室土洞墓，坐北朝南，由墓道、封门、甬道及前后室组成。墓葬保存完好，共出土器物 72 件（套），包括陶器 58 件（套）、瓷器 3 件、铜器 1 件、铁器 1 件、玉器 1 件，另有铜钱 2 枚、镇墓石 5 块及砖墓券 1 件。玉饰 1 件（M109:1），白玉质，不透光，局部尚呈石质，半圆形，一面较平，一面外弧，整体镂空出一动物造型，似为一龙。断面一侧中间有一对燧孔，靠边有一小圆形凹槽，应为未成形的孔，较平一面的龙首处亦有一对燧孔。整体来看，纹饰造型不完整，似为一玉佩饰残断后再加工而成，可能作为冠饰使用。长 4、宽 2.6、厚 1.2 厘米⁴⁵⁵。

2. 华北地区

2007 年 8 月至 10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辽祖陵陵园内的一号陪葬墓进行发掘。由于该墓葬多次被盗掘，出土的遗物较少，主要包括日常用器、建筑材料、石墓志等三大类。其中玉器共 5 件。带孔器 1 件（PM1:169），乳白色，透明，通体

⁴⁵³ 董小陈等：《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 M12 发掘简报》，《文物》2016 年 9 期。

⁴⁵⁴ 重庆市文物局等：《奉节营盘包墓地》，科学出版社，2016 年。

⁴⁵⁵ 张小丽等：《西安曲江缪家寨元代袁贵安墓发掘简报》，《文物》2016 年 7 期。

打磨光滑，整体呈圆柱状，一端略细并钻有一孔，长 6.6、直径 0.6-0.65 厘米⁴⁵⁶。

2015 年 6 月至 12 月，经上级文物管理部门批准，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锡林郭勒盟文物保护管理站、多伦县文物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内蒙古多伦县小王力沟辽代墓葬进行发掘，此次共清理大型墓葬 2 座（编号 M1、M2）。其中 M2 内随葬有陶器、瓷器、金银器、铜器、玉器、木器等，另还出土一方保存完整的墓志。

鎏金银托嵌玉鈿捍腰 1 件（M2 收缴:3），可修复，鎏金银托为锤揲、焊接成形。上边呈多曲连弧形，底边平直，中部有七个凹托座用于镶嵌玉带鈿。边缘部分皆焊接凸棱，饰缠枝蔓草纹，辅以鱼子状底纹。两侧各有一长方形孔，用于穿系革带或丝带，带已残朽。带鈿共 7 块，青白玉质，有沁痕。居中的一块带鈿为长方形，浅浮雕升龙，龙首为鹿角，口衔珠，“S”形龙身粗壮并饰鱼鳞纹，足为三爪，四周篆刻卷云纹。两侧各有三块玉鈿，形状、大小及纹饰均是两两左右对应，分别篆刻降龙、升龙、降龙，辅以卷云纹。纹样有涂金痕迹。整器长 58.7、高 15.8 厘米。银丝链玉组佩 1 组共 8 件（M2 收缴:5-1-8）。组佩通长 12.5 厘米，上部为 1 件镂雕玉饰，其下用鎏金银链系挂 7 件玉坠。镂雕玉饰 1 件，青白色，表面有灰白色斑，整体雕成折枝花卉形，枝蔓粗壮，缠绕花朵，表面抛光，长 5.4、宽 1.2、厚 0.25 厘米。玉坠皆呈青白色，圆雕。鱼形玉坠共 3 件，两面用交叉斜线刻出菱形鱼鳞纹。其中 2 件细部刻画清晰，形象生动，顶端鱼头钻入花蒂中，花蒂钻孔以穿系银链。雕作双鱼者口尾相衔作追逐状，长 7.1、宽 1、厚 0.3 厘米。雕作单鱼者所系银链与龙首觿形玉坠的银链在上部合为一股，长 4.7、宽 1.3、厚 0.3 厘米。另 1 件为雕刻较简约的单鱼，头部细长，身为扁平长方形，尾部短小，头部钻孔代表眼睛并穿系银链，与摩羯首锥形玉坠的银链在上部合为一股，长 6.9、宽 0.7、厚 0.25 厘米。龙首玉坠 1 件，龙首刻画简约，下为觿形工具，龙首钻孔以穿系银链，长 5.9、宽 0.6、厚 0.5 厘米。摩羯首玉坠共 2 件，均雕作龙首鱼身，鱼身刻菱形鱼鳞纹，龙首钻孔以穿系银链；1 件龙首刻画简约，尾部接觿形工具，长 6.3、宽 0.9、厚 0.45 厘米；另 1 件龙首刻画较细腻，鱼尾分叉连接觿形工具，长 7.8、宽 0.9、厚 0.3 厘米。居于组佩中心位置的 1 件扁圆盒形玉坠分两半，以子母口扣合紧密，盖、身各琢一孔，上下相对穿系银链，直径 2.6、厚 0.95 厘米。玛瑙罐 2 件，均保存完整，腹壁可见自然纹理，表面抛光，方唇，鼓腹，平底。M2 收缴:11，白色，斜肩，斜壁，口径 2.5、底径 2.3、高 3.3 厘米。M2 收缴:12，黑色，溜肩，弧壁，口径 3.3、底径 2.7、高 3.6 厘米⁴⁵⁷。

二 探索与研究

（一）考古学研究

1. 新石器时代

龙岗寺遗址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墓地，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玉石器。杨岐黄从随葬玉器墓葬的数量、位置、规模、随葬品数量入手，结合数据统计的方法进行分析，对于遗址所见玉石器的出土情况、玉

⁴⁵⁶ 董新林等：《内蒙古巴林左旗辽祖陵一号陪葬墓》，《考古》2016 年 10 期。

⁴⁵⁷ 盖之咏等：《内蒙古多伦县小王力沟辽代墓葬》，《考古》2016 年 10 期。

料、尤其是玉石器随葬习俗方面提出量化认识⁴⁵⁸。

多璜联璧主要出土于晋南陶寺文化、晋陕北新华文化、甘青地区齐家文化，其形制特殊，分布相对集中，年代相对单一，具有鲜明的自身特点。高江涛认为，龙山文化时期晋南地区首先创造性地发明了多璜联璧这类独特玉器种类，之后北传至陕北，再通过陕北、内蒙古中南部等新华文化与齐家文化间的互动交流或文化扩张进而向西传至齐家文化分布区。多璜联璧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中功用有别，在晋南主要是佩戴饰物，而在齐家文化中却多与祭祀相关⁴⁵⁹。

费玲伶在《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动物形玉器的研究》一文中将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的动物形玉器分为全形动物、半形动物和复合形动物三类，根据动物造型又分为若干不同的器形，并对动物形玉器的寓意进行分析推测，认为玉器的动物造型与原始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动物形玉器应象征某种神灵的力量或象征赋予人以某种神灵的力量⁴⁶⁰。

鱼形饰是中国古代玉器的一个重要门类，但史前鱼形饰出土很少。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日)斯台遗址发现了一件红山文化鱼形饰，然而有关其材质的观点多样且缺乏科学数据的佐证。王荣等借助拉曼光谱和 X 荧光光谱等便携式仪器对该件鱼形饰进行了无损测试分析，结果显示该件器物系萤石材质，而非以往认为的“碧玉”和“碧玺”。由于这是北方地区唯一一件经科学检测的史前萤石质玉器，所以进一步结合南方地区出土的史前萤石质玉器，对材质、造型、加工工艺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⁴⁶¹。

曹芳芳在《陈白沙藏牙璋与璋文化小史》一文中对广东省博物馆玉器杂项库收藏的传世品牙璋“新石器晚期陈白沙玉璋”历史进行了考证。除此之外，在文中第三部分还对玉璋这一中国古代玉礼器小史进行了介绍⁴⁶²。

红山文化出土玉猪龙原型众说纷纭。崔天兴采用图式考证表明玉猪龙的原型来源于玉玦和兽首的结合，其平面形象为兽面纹玉璋。兽面形玉璋与红山文化玉蚕蛹从构图图式上存在极大相似性，玉猪龙的形象与蚕崇拜、丝绸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为理解中华文明的特质与内涵，也为了解丝绸之路和早期草原文化通道提供了新的视角⁴⁶³。

2. 夏商周时期

董洁在《西周丰姬墓出土玉器初探》中对该墓出土的玉器进行了介绍。除此之外还结合西周其他墓葬的发掘情况，对墓主出土玉器的用途、特点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⁴⁶⁴。

谌小灵、李岩和王亮在对岭南地区牙璋的分布与年代进行考察之后，引申出商周时期大石铲、牙璋、仿铜原始瓷礼器三种反映意识形态活动的器物，并结合各自的考古学文化演变，大体可见其格局；广西地区从大石铲所在的时期既与西南地区有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可以划分出其文化圈，而村头类型

⁴⁵⁸ 杨岐黄：《龙岗寺遗址出土的玉石器试析》，《文博》2016年6期。

⁴⁵⁹ 高江涛：《陶寺遗址出土多璜联璧初探》，《南方文物》2016年4期。

⁴⁶⁰ 费玲伶：《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动物形玉器的研究》，《华夏考古》2016年4期。

⁴⁶¹ 王荣等：《红山文化萤石质鱼形饰的鉴别和探讨》，《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6年4期。

⁴⁶² 曹芳芳：《陈白沙藏牙璋与璋文化小史》，《文史天地》2016年12期。

⁴⁶³ 崔天兴：《红山文化“玉猪龙”原型新考》，《北方文物》2016年3期。

⁴⁶⁴ 董洁：《西周丰姬墓出土玉器初探》，《文博》2016年4期。

和浮滨文化则是岭南中部地区的另一文化圈，福建北部则可归入浙江原始瓷器文化圈⁴⁶⁵。

朱勤文等在考古学的基础上，运用岩石学和宝玉石学的知识和技术，采用无损鉴定方法，对湖北省博物馆馆藏战国时期出土玉（石）器进行了较系统的检测和分析，鉴定出这些玉（石）器的材质种类等，从而逐步建立馆藏战国玉（石）器的考古学和宝玉石学特征数据库⁴⁶⁶。

叶晓红、唐际根等人在《殷墟晚商玉器切割技术试析》一文中介绍了殷墟妇好墓玉器切割技术的研究情况。殷墟晚商时期玉器开料以锯片切割技术为主。二次加工中，存在一类携带解玉砂的、硬度和韧度都较高的线状工具，被用于镂雕等工艺。另外，解玉砂技术在殷墟晚商时可能已经产生变革⁴⁶⁷。



图六 上海博物馆所藏“重环谷纹玉璧”

玉瑗是璧环类玉器的一种器物类型，其萌芽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是应璧、环类器物解玉之需而产生的。符合《考工记》、《尔雅》所记载玉瑗定义的实物，大约出现于战国时期。

上海博物馆所藏的一件“重环谷纹玉璧”（图六），与《考工记》所载“璧羨度尺，好三寸，以为度”符合，应是当时璧、瑗、环三器集于一体的标准器⁴⁶⁸。

赵瑞廷、于平等人通过对 1960 年湖南长沙杨家山铁路工地 12 号墓出土的龙形玉璜佩、玉剑璏，以及 1980 年湖南临澧九里茶厂 1 号楚墓出土的鸟形玉觿佩和镂空双龙首纹玉璜进行科技检测发现，这 4 件战国墓葬出土玉器的黑色沁与汞元素有着必然的关系。很可能是在墓葬埋藏环境下，汞与尸体腐烂释放出的硫，在玉器接触面长时间发生化学反应，黑色硫化汞慢慢浸润玉材而形成玉器黑漆古“水银沁”现象⁴⁶⁹。

3. 秦汉至隋唐时期

朱歌敏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整理关中地区各类秦墓出土玉器的基本资料，分析秦墓中出土葬玉的特点及此时期各类玉器的随葬情况，探明自战国中晚期开始，随着国势的逐步强大秦国渐渐摒弃西周礼制这一现象⁴⁷⁰。

黄晓娟等以米脂县银南新区汉墓 M103 出土的玉制品为对象，通过显微观察、拉曼光谱分析、XRD 分析以及红外光谱分析和扫描电镜显微分析对选取的 11 片玉片样品的材质和加工工艺以及玉片表面残留物进行了科学分析与研究。结果显示，透闪石玉是组成玉覆面及玉鞋的主要玉种，此外还有少量蛇纹石玉和石英岩玉。玉片上的红色附着物为朱砂，很有可能是用于纺织品染色。纺织品痕迹显示其为麻织物，织物可能是用于承托和固定玉片。玉片的加工痕迹显示，可能是受工艺水平限制或制作时

⁴⁶⁵ 谌小灵等：《关于岭南所见牙璋的分布及相关认识》，《华夏考古》2016 年 4 期。

⁴⁶⁶ 朱勤文等：《湖北省博物馆藏出土战国玉（石）器材质研究》，《江汉考古》2016 年 5 期。

⁴⁶⁷ 叶晓红等：《殷墟晚商玉器切割技术试析》，《南方文物》2016 年 4 期。

⁴⁶⁸ 方辉：《说“瑗”》，《江汉考古》2016 年 6 期。

⁴⁶⁹ 赵瑞廷等：《对战国楚地贵族墓葬出土玉器黑色水银沁现象的再认识——以湖南省博物馆藏战国玉器黑色沁为例》，《草原文物》2016 年 2 期。

⁴⁷⁰ 朱歌敏：《关中地区秦墓葬玉探析》，《文博》2016 年 4 期。

间仓促，制作较粗糙⁴⁷¹。

4. 其他

曹楠在《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明义士藏中国古代玉器》一文中对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藏的部分玉器进行整理研究。文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概述，作者对明义士藏的玉石器入藏时间、数量、器型等进行简略描述；第二部分为选粹与研究，主要是对部分玉器进行详细介绍并进行了相关研究⁴⁷²。

（二）理论研究

张忠培先生在“中华玉文化中心第五届年会”闭幕式上讲话的中心是对中国玉器与玉文化研究道路的思考，重点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需要将中国玉器与玉文化研究放在中国文化变革之路中进行考察；二是如何用考古学方法研究玉器与玉文化⁴⁷³。

（三）玉器相关研究

《闪玉学研究在台湾》一文主要从岩石学、矿物学、考古学、艺术美学等方面对台湾玉成矿的过程进行探讨。除此之外，作者认为从台湾玉产品之样态来看，古今玉器不外乎路线演化、传承、师承，即先仿古、再创新。因此台湾玉未来产业方向仍应朝以人为本、匠心独运、蔚为风潮之方向发展⁴⁷⁴。

谷娴子根据文字记载以及传世实物，梳理了痕都斯坦玉器入传中国及发展仿制的过程。又根据前人研究，对其地域特征进行了分类总结。此外，结合对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三件痕都斯坦玉器的纹理分析，发现痕都斯坦玉器常镶嵌玻璃代替宝石。元素组成测试可以确定玻璃的来源，亦可以辅助指示玉器的加工地。研究方法为嵌有玻璃的痕都斯坦玉器的来源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⁴⁷⁵。

汪久文在《中国玉器时代与玉文化》中力求以一个较为广阔的视角，从人类自身发展演变及影响人类的环境变化，去探求中国玉器时代出现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全书分为八个章节，分别是：导论、玉器时代的自然环境演变及特征、玉器时代的社会发展与时代特征、玉石分离与玉器时代的形成、玉器时代的分期与前玉器时代、玉器时代的发展期及其特征、玉器时代的繁盛期及其特征、后玉器时代发展概述⁴⁷⁶。

《丝绸之路与玉文化研究》中收录相关玉文化论文 22 篇，涉及的时代范围较长，不仅有战国时期就已经被开采的马鬃山玉矿，亦包括乾隆宫廷玉器的研究。除此之外，所收文章在研究的方式与方法上也较为多样，不少新兴的科学技术也被应用于玉器的研究之上⁴⁷⁷。

三 展览及图录

⁴⁷¹ 黄小娟等：《陕西米脂汉墓出土玉覆面和玉鞋的科学分析与研究》，《考古与文物》2016年5期。

⁴⁷² 曹楠：《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明义士藏中国古代玉器》，《文物》2016年11期。

⁴⁷³ 张忠培：《中国玉器与玉文化研究之道的思考》，《江汉考古》2016年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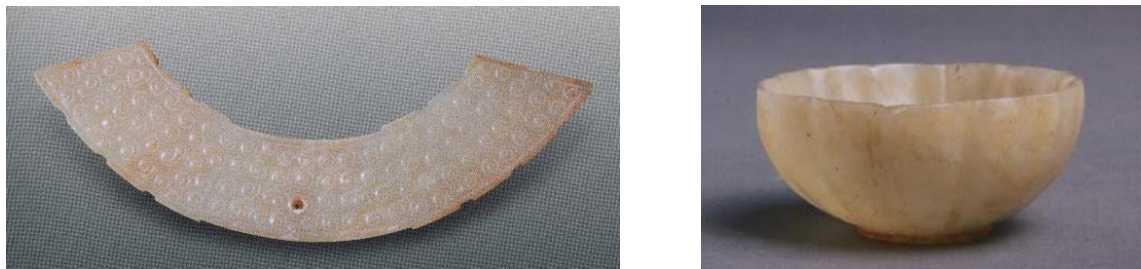
⁴⁷⁴ 张郁生等：《闪玉学研究在台湾》，《台湾矿业》2016年3期。

⁴⁷⁵ 谷娴子：《略论痕都斯坦玉器的地域来源特征——兼馆藏痕都斯坦玉器述例》，《文博》2016年6期。

⁴⁷⁶ 汪久文：《中国玉器时代与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6年。

⁴⁷⁷ 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丝绸之路与玉文化研究》，故宫出版社，2016年。

《天水文物精华》一书分为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瓷器、金银器等9个部分对天水馆藏珍贵文物资料进行了展示。在描述中采取图片、文字描述等手法，力求真实、客观、准确反映文物，融艺术性、鉴赏性、可读性为一体（图七）⁴⁷⁸。



图七 《天水文物精华》中收录的秦谷纹玉璜和宋青玉盏

为迎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展示河南省在南水北调工程中的文物保护成果，河南省文物局、河南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安阳博物馆举办“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段文物保护成果展”，集中展示南水北调发现的文物精品。此次展览选取各类文物3800余件，种类包括骨器、石器、蚌器、角器、陶器、瓷器、金银器、玉器、铜镜、墓志等。器形多种多样，年代序列完整，包含了从旧石器时代至清代的各类文物。本次展览的图录按照地区分为8个部分，分别是南阳、平顶山、许昌、郑州、新乡、焦作、鹤壁、安阳。在介绍上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方便阅读⁴⁷⁹。

张家港位于江苏省南部，北临长江入海口黄金水道，南依太湖流域广袤平原，地处沿海和长江两大经济带的交汇处。张家港博物馆编写的《文明溯源——张家港文物精粹》一书对张家港博物馆馆藏文物及本地重要历史遗迹进行了一次集中记录与介绍。全书依据地方文物特色，分为图版和文字两部分。图版部分分为玉石器、陶瓷器、金属器、碑刻、建筑构件、书画等6个栏目，以高清图片配以解说的形式展现出土文物形态与功能；文字部分以论文的形式深入浅出地解读张家港特色文物背后的故事，内容包括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图八）⁴⁸⁰。



图八 张家港博物馆馆藏勾云形玉饰和带齿玉饰

2016年11月，北京艺术博物馆与徐州博物馆联合推出《龙飞凤舞——汉代诸侯王墓出土玉器展》，为延展展览内容、推动相关研究，特编辑出版《龙飞凤舞——徐州汉代楚王墓出土玉器》一书。全书

⁴⁷⁸ 天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天水文物精华》，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

⁴⁷⁹ 河南省文物局：《流过往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段文物保护成果展》，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

⁴⁸⁰ 张家港博物馆：《文明溯源——张家港文物精粹》，西泠印社出版社，2016年。

分为三大部分：赏析篇、论述篇和文献篇。赏析篇内收录了狮子山、北洞山、东洞山等楚王墓出土的部分精美玉器，还收录了若干高等级陪葬墓出土的玉器。玉器种类涉及礼仪用玉、装饰用玉、葬玉、生活用玉等多个种类（图九）⁴⁸¹。



图九 徐州博物馆藏玉面罩和青玉龙形佩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中国古代玉器》一书是以全面整理和发表现存于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将近 1400 件中国古代玉器为目的，除了若干雷同残件、服装饰品、屏风家具插件外，全部藏品均出版发表，其中 361 件玉器编为 1-291 号刊于“馆藏中国古代玉器选粹”部分以图版展示，其他 991 件玉器则以 696 幅缩略图形式刊于“馆藏中国古代玉器概览”部分作为参考。本书依据时间顺序，以纯描述形式撰写，从而使读者能欣赏到最齐全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中国玉器收藏⁴⁸²。

湖北是楚国故地，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在此地区发掘的大量楚墓中，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珍贵文物，除青铜器、玉器、漆器外，还有大量工艺精湛的丝织品、皮革制品，揭示了楚国在冶铸、建筑、文字



图一〇 三人踏豕玉坠饰

等方面的成就。发掘于 2002 年的枣阳九连墩 1、2 号墓是战国中晚期墓葬，共出土文物 5000 余件（套），涵盖了战国时期礼乐、军事、生活、丧葬等多个方面被誉为“楚国贵族的地下宫殿”。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联合湖北省博物馆举办“九连墩的故事——湖北九连墩楚墓精品文物特展”，展出九连墩 1、2 号墓出土的青铜礼器、兵器、漆木器和玉器共 142 件精美文物，展览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我们是谁？”、“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此次展览的图录亦按照这四个部分进行编写，并附

相关论文 5 篇。玉器主要展出于第三部分“我们的生活中”，如三人踏豕玉坠饰（图一〇）、云纹龙凤玉佩⁴⁸³。

秦代是中国历史朝代中的里程碑，为了展现秦人从小国发展壮大直至统一天下的历史轨迹，分享学界关于历史上秦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两岸相关单位共同协商，最

⁴⁸¹ 北京艺术博物馆等：《龙飞凤舞：徐州汉代楚王墓出土玉器》，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6 年。

⁴⁸² 沈辰等：《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中国古代玉器》，文物出版社，2016 年。

⁴⁸³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等：《九连墩的故事：湖北九连墩楚墓精品文物特展》，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 年。

终选出陕西、甘肃两省的 19 家文物博物馆单位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的文物精品 189 件（组），力求完整铺陈秦人自西周初期至秦帝国七百年历史的发展脉络，及对汉代及后世的重大影响。

“秦·俑——秦文化与兵马俑特展”分为秦与周戎、东进称霸、变法革新、秦始皇帝、汉承秦制等 5 单元 15 小节，文物类别包括铜器、金银器、玉石器、陶器、陶俑、车马器、兵器等。由于展件众多，图录依据展览铺陈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嬴秦溯源》，下册《秦业流风》，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依照顺序介绍秦国的发展及秦文化的辉煌成就。本次展览中玉器数量较多。比如在“东进称霸”单元中，展出的玉器包括玉琮、玉戈、玉佩等（图一一）⁴⁸⁴。



图一一 “秦文化与兵马俑特展”展出的玉戈和玉鞋底

⁴⁸⁴ 蔡庆良、张志良主编：《嬴秦溯源：秦文化特展》、《秦业流风：秦文化特展》，国立故宫博物院，2016 年。